



Chinese A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Relations

An Exploration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hen Zhuo Wei Haimo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中国援助、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

对中非合作的一项探索

To 701D Mafia

陈卓 魏海墨*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3 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陈卓主要负责第二、三、四章，魏海墨主要负责第一、五、六章，作者的贡献是平等的。

摘要

〔目的/意义〕本研究旨在研究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建立的新型南南关系对非洲经济发展、族群关系的影响，着重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策略与实践，以及援助对非洲经济增长和族群关系的潜在影响。〔方法/过程〕本研究利用多个大型公开数据库的数据和网络爬取数据，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描述性统计，深入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战略、目标和执行方式。其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地理信息可视化以及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援助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本研究还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和案例分析来探究中国对不同非洲国家援助的策略选择。〔结果/结论〕综合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尤其在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中国对非援助仍然存在一些质疑声音，主要涉及援助可能导致的长期社会资本损失和不平等分配。对于族群关系，研究表明援助有助于减缓经济不平等，但对于具体的族群冲突和地区影响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总体而言，要深入理解中非合作，需要将其“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叙事中去理解”。

关键词：中国援助；非洲发展；族群关系；族群冲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目 录

一、引言.....	1
1.1.问题提出.....	1
1.2.文献回顾.....	2
1.3.研究框架.....	4
1.4.研究方法.....	6
二、中国对非援助的策略与实践.....	9
2.1 中国对非援助的描述性分析.....	9
2.2 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文本分析.....	22
2.3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30
2.4 非洲国家的社会网络分析.....	35
2.5 本章小结.....	39
三、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40
3.1 中国对非援助的分布情况.....	40
3.2 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	42
3.3 本章小结.....	45
四、非洲族群关系及其变化.....	47
4.1 中国援助与非洲地区的族群分布状况.....	47
4.2 族群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国别分析.....	49
4.3 中国援助对非洲族群冲突影响的实证.....	50
4.4 本章小结.....	55
五、案例研究与国别比较.....	56
5.1 “非洲的自由铁路”.....	56
5.2 “安哥拉模式”及其调整.....	62
5.3 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兴起.....	66
5.4 本章小结.....	73
六、研究结论.....	76
参考文献.....	78
致 谢.....	82

一、引言

1.1 问题提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非洲国家获得相对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形成了以共同发展为特征的互利互惠的新型南南关系。国际社会的各项研究表明,中非合作是推进非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外部动力。^①非洲大陆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最重要的区域,其所接受的援助占到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从机制上看,自2000年开始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将中国对非援助纳入机制化的轨道,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进一步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标志着中国对非援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模式上看,中国对非援助从以双边援助为主发展到了双边、区域和多边多种形式,从官方援助为主逐渐发展到了官方与民间多元化的对非援助新格局。^②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发展体现出了明显的促进作用。^③随着中国对非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④,中国援助的效果也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受到世界广大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赞。^⑤然而,中国对非援助也受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质疑,“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论”、“破坏环境论”、“漠视人权论”等不绝于耳。^⑥尤其是有这样一种观点:学者 Abreham Adera 认为,中国的援助项目一般都由中国承包商直接控制,此举使得非洲人无法参与当地的发展活动^⑦,可能会破坏非洲当地的社会资本而导致长期上对经济造成破坏。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援助能确实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并且这样的就业效应在项目建设期与项目完成后都存在。援助项目还有助于为当地吸引移民进入^⑧,这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经济持续增长的。

对于中国的援助,西方学者还有更多的质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流氓捐助者”(rogue doner),中国没有按照西方国家设立的既定规则进行援助,支持的都是非洲的非民主的“流氓国家”^⑨,并且学者 Axel Dreher 等人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的援助是不带有附加条件的所以更容易被受援国捕获。受援国的威权领导人会将中国的援助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享有政治特权的地区与种族。但与大多数现有的文献的观点相反,也有新的研究发现越

^① 刘鸿武.非洲发展大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3(02):72-87.

^②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11):117-135+159.

^③ 许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J].经济学(季刊),2021,21(05):1499-1520.

^④ 学者许志成与张宇的研究还说明,国际媒体往往使用“aid”一词笼统指代所有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而中文对应的“援助”一词给人以无偿的印象,但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中无偿援助所占的规模和比例并不大,更多是通过优惠贷款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和生产型项目。

^⑤ 韩冬临,黄臻尔.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6):134-154+159-160.

^⑥ 陈雪飞.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J].国外理论动态,2014(03):68-72.

^⑦ Abreham Adera (2023) Chinese aid and social ties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sub-national aid projects,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11:1, 2196843.

^⑧ Guo, Shiqi and An, Jiafu and Jiang, Haicheng, Chinese Aid and Local Employment in Africa (November 20, 202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71857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718578>.

^⑨ 李安山.中国的援非故事: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27(05):12-19.

“民主”的非洲政权，现任领导人所属的种族地区获得发展资金的可能性就越大^①，因为尽管非洲很多国家都拥有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制度，但仍缺乏民主问责制的有效性与基础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看似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需要讨好的选民集团在数量上要比那些所谓的“威权领导人”广泛得多。所以是西方传统捐助国家与他们在非洲的“民主客户”们——而非中国——正在创造更大的经济不平等与更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援助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并且带来了实在的经济发展。上述种种学术论争，为本就不甚清晰的非洲援助问题又披上了重重的迷雾。

本研究将关注以上的问题，试图探究中国的援助是否真的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增长，又是否改善了非洲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我们希望通过独立的、客观的实证研究展示更真实的、更复杂的中国对非援助的图景，以求获得更准确的与更整全的理解。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大量援助活动正是非洲人民所需要的，并且为非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通过帮助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式，中国的援助会弥合非洲当地的族群矛盾，会提高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

1.2 文献回顾

（1）中国援助与非洲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于受援国来说，其经济增长始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从狭义的角度评价援助的有效性，主要就是关注其是否促进了受援国经济增长。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多集中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还是认为外部援助对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比如学者 Dreher 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时，将中国的钢铁产量与受援国接受中国援助的概率相结合构造工具变量，在固定国家与时间效应后发现，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显著地促进了受援国经济增长。^②此外考虑到经济增长问题中可能存在动态效应，即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可能会影响当期经济增长，因此朱玮玮等学者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援助非洲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该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③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援助对于受援国有负面影响，比如前文所述的 Abreham Adera 关于中国援助降低社会资本的研究以及 Brazys 关于中国的援助项目增加了腐败的研究^④，都认为中国的援助长期

^① Keyi Tang. 2021. Development Finance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Comparing Chinese and World Bank Fin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No. 2021/45.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另外，学者 Posner 等人的研究也证明非洲的民主化有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参见 Eric Kramon and Daniel N. Posner, “Ethnic Favoritism in Education in Kenya,”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no. 1 (2016): 1–58.

^② Dreher A, Fuchs A, Parks B,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R]. AidData Working Paper No.46, 2017.

^③ 朱玮玮,徐康宁,王美昌.中国援助是否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 [J].国际贸易问题,2018(07):108-120.

^④ Brazys, S., Elkins, J. A., & Kelly, G. (2017). Bad neighbors? How co-located Chinese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jects impact local corruption in Tanzania.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2(2), 227–253.

来看是不利于当地经济的。上述两面的观点都在实证层面得到了相应的数据支撑。但是,本研究认为援助是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受援国经济增长也不仅仅反映在宏观经济数据的增长上,更应关注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比如经济不平等问题改善。我们可以发现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不平等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而改善受援国的减贫效果,达到经济不平等水平的降低;其二是政府间合作发展的项目援助具有较轻的偿还压力,使得受援国不容易陷入债务陷阱,因此更有助于减贫与改善经济不平等;其三是援助可以作为重要的稳定因素降低受援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①,缓解经济不稳定对经济不平等水平的加剧。

(2) 经济发展、经济不平等与族群间矛盾的关系

非洲的种族不平等是影响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过程中的一大障碍。种族不平等突出体现在经济不平等上,经济水平的差异也是族群冲突的一大原因。但经济发展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众说纷纭。在大量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文献中,逻辑论证和证据支持了相互矛盾的主张^②,目前并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说法。例如,霍洛维茨称,一个民族及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助长了分离主义,低水平的发展是危险的。而学者 Jean LaPonce 认为,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是,经济发达和落后的族群和地区都可能寻求独立^③。但当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降低时,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族群间的矛盾会被弱化,经济不平等的改善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也会有所增加。毕竟在多元族群国家,政府必须站在全体国民的立场上,兼顾各族群利益,实施惠及各族群的政策,赋予各族群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平等对待各族群,使得各族群平等共享国家资源,才能增强各族群对国家的归属感依附感,才能最终实现族群关系和谐融洽、国民团结及国家繁荣昌盛的目标。^④如果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能够使得非洲国家的族群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也算是中国对非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更何况弥合族群间的矛盾只是一方面,中国为非洲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总体来说,就像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的影响一样,关于外部援助与经济不平等的文献较少,得到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增加受援国不同区域间的连通性,这既会产生使经济空间分布更加均匀的离心力,也会产生相反的向心力;最终效果取决于二者间的净效应。**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中国对非援助的一大特色**,有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中,超过一半是通过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证明了中国对外援助能够显著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增长^⑤。并且考虑到大部分非洲受援国经济的空间分布是高度

^① 冯凯. 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D].南开大学,2023.

^② Monica D.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 Interests, 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erri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Notes to Chapters 1, pp. 168.

^③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Ethnic Conflict*, chap. 6 与 LaPonce, *Languag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pp. 137-149.

^④ 刘莹. 新马族群政策及其对族群关系影响的比较研究[D].云南大学,2011.

^⑤ 严兵,谢心荻,文博.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兼论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J].世界经济研

集中在核心城市的，同时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普遍缺乏，因此中国对非的交通基础设施类援助可能会改善受援国内部族群间人口的流动性，分散单一族群内部的经济活动，减缓族群与地理的经济不平等现象。

但是，中国援助对非洲受援国经济不平等和族群间矛盾的改善终归是一个需要实证验证的问题，需要研究者用客观真实的数据审慎地去度量，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3）文献小结

本节梳理了有关中国对非援助的效果研究，讨论了正反的不同观点。本节还将经济不平等纳入研究视角，主要考察受援国族群与地理因素上经济不平等，并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通过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从研究主体看，国际上的大多数研究都在关注发达国家主导的官方发展援助，对中国等新兴援助国的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看，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关于减贫与区域族群经济不平等研究相对较少^①。并且在多个关键问题上都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数据获取问题，现有大部分关于区域经济不平等研究仅限于特定国家样本，且普遍使用中高收入经济体数据。而且一方面，中国官方并未公开对外援助数据，另一方面，大部分非洲受援国的区域经济数据缺失严重，难以组成有效的研究样本。本研究不仅试图提供中国的援助影响受援国社会福利的证据，并尝试解决数据瓶颈，进而客观地呈现分析结果，争取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做出边际贡献。

1.3 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如下图所示，分别是中国对非援助策略与实践分析、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影响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影响。（1）**中国对非援助策略与实践分析部分**旨在深入分析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策略和实际操作。研究将关注中国援助的目标、范围、执行方式以及与受援国的合作模式。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方面，我们将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对非洲提供援助的动机和实际影响。（2）**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影响分析部分**旨在评估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影响。我们预期通过栅格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灯光数据、中国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非洲族群分布等进行微观层面的、更加精确的研究。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与时间限制，在援助项目的经济效果，主要是探讨对于国家 GDP 总量以及人均 GDP 的变化影响；在族群关系与冲突状况层面，主要是通过族群结构和冲突评级来衡量。（3）**中国对非援助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影响部分**将通过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援助行为进行比较，深入探讨中国对非援助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我们将分析中国援助模式与传统西方援助的异同，

究,2021,(02):3-18+134.

^① 冯凯. 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D].南开大学,2023.

并评估这种影响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结构的潜在影响。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部分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多层面影响，并且思考中国对非援助对于国家建设、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可能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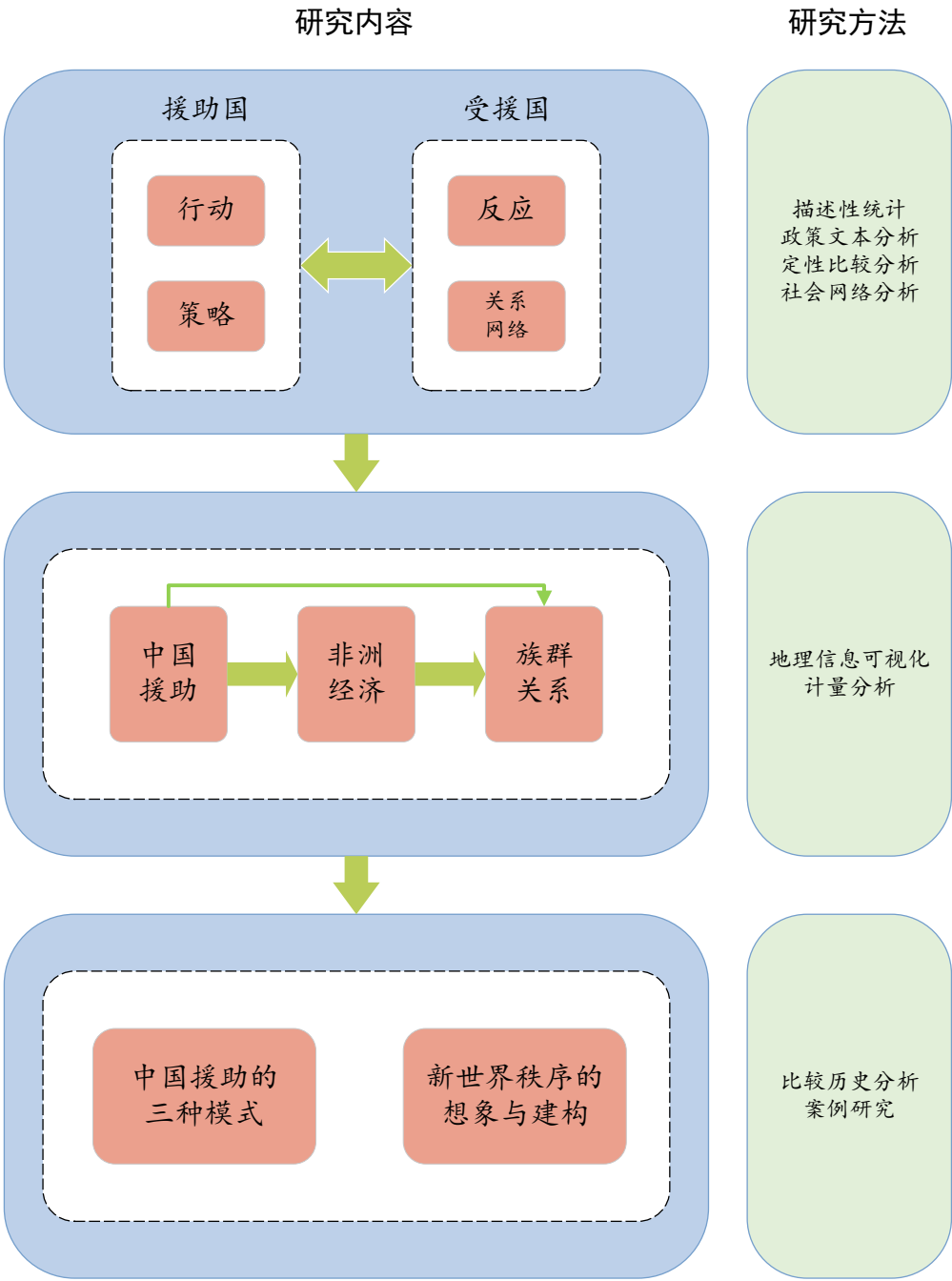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1.4 研究方法

1.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两个渠道：

第一，爬取网络公开数据。本研究中爬取的数据主要是文本型数据，其中包括：“外交部—非洲国家介绍文本”“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重要文件”等。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外交部关于非洲国家介绍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的政策和立场，有助于挖掘与中国对非援助相关的政策动向、合作框架等关键方面的深层次信息。下文将呈现详细 R 语言的爬取代码，以展示整个数据获取过程的透明性和可复现性。

第二，申请获取大型公开数据库数据和相关论文公开数据。其中主要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CARI）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库、威廉和玛丽全球研究院援助数据库（主要是 AidData-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族群关系数据库（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非洲晴雨表数据库（Afrobarometer）、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Foreign Aid Shocks as a Cause of Violent Armed Conflict（Nielsen et al, 2011）。

所有数据分析来源在文中对应位置均有注明。

外交部网站中非合作论坛重要文件文本爬取—R 代码

```
# 加载 R 包
library(rvest)

# 定义目标网页链接
url <-
"http://ne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fzs_673445/dqzzhzjz_673449/zfhzlt_673563/zyw
j_673575/"

# 抓取网页内容
page <- read_html(url)

# 选择并点击链接
links <- page %>%
  html_nodes(".list1 li a, li:nth-child(7) a, li:nth-child(6) a, li:nth-child(5) a, li:nth-
child(3) a, .list1:nth-child(1) li:nth-child(1) a") %>%
  html_attr("href")

for (link in links) {
  # 构建完整的链接
  full_url <- ifelse(startsWith(link, "http"), link, paste0(url, link))

  # 访问链接
  sub_page <- read_html(full_url)

  # 抓取文本内容
  news_details <- sub_page %>% html_node(".news-details")
  news_text <- news_details %>% html_text()

  # 提取文件名
  file_name <- gsub("/", "", gsub(" ", "_", basename(full_url)))

  # 输出到 txt 文件
  cat(news_text, file = paste0(file_name, ".txt"), sep = "\n")
}
```

外交部网站非洲国家介绍文本爬取—R 代码

```
# 加载 R 包
library(rvest)
library(RSelenium)

# 启动 Selenium 服务器
rD <- rsDriver(browser = c("firefox"))
remDr <- rD[["client"]]

# 定义目标网页链接
url <-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

# 访问网页
remDr$navigate(url)

# 抓取并点击链接
links <- remDr$findElements(using = 'css', value = 'li a')
for (link in links) {
  link_text <- link$getElementText()
  cat("正在处理链接: ", link_text, "\n")

  # 点击链接
  link$clickElement()

  # 等待加载
  Sys.sleep(5)

  # 抓取文本内容
  news_details <- remDr$findElement(using = 'css', value = '.news-details')
  news_text <- news_details$getElementText()

  # 输出到 txt 文件
  file_name <- gsub("/", "", gsub(" ", "_", link_text))
  cat(news_text, file = paste0(file_name, ".txt"), sep = "\n")

  # 返回上一页
  remDr$back()

  # 等待加载
  Sys.sleep(5)
}

# 关闭浏览器
remDr$close()
rD[["server"]]$stop()
```

1.4.2 方法使用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其中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政策文本分析、定性比较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地理信息可视化、计量分析、比较历史分析、案例研究。

(1) 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对收集的定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国援助的类型、额度、基本分布、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整体背景。

(2) 政策文本分析。对政府或机构发布的官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包括文件、声明和政策文件等。通过政策文本分析,获取关于中国对非援助战略、政策目标以及执行手段的详细信息。

(3) 定性比较分析 (QCA)。通过定性比较分析中国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援助实施情况，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模式，揭示中国对非援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4) 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构建和分析援助方和受援方的社会网络结构，揭示在中国对非援助中各个参与方之间的关系、合作模式和信息流动。

(5) 地理信息可视化。利用地理信息数据，运用 R 语言将援助、族群等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可视化，以展示中国对非援助的地域分布、影响范围和空间关联等。

(6) 计量分析。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收集到的定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7) 比较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通过对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受援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识别出中国对非援助在不同时间点的演变、发展趋势和重要转折点，以详细了解中国对非援助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运作和影响。

二、中国对非援助的策略与实践

2.1 中国对非援助的描述性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的描述分析主要包括中国对非援助的类型、额度、地理分布三个方面。在援助类型分析部分，主要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CARI）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类型进行描述性分析；在援助额度分析部分，聚焦于中国对非援助的规模和额度，考察不同时间段内、不同的国家所接收的援助金额、项目规模，以及可能存在的变化趋势；在地理分布分析部分，分析援助项目在非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以揭示中国对不同地区的关注程度和战略重心。

2.1.1 中国对非援助的类型

在 2013-2021 年期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FDI）援助项目前 5 位分别是工程建设（Construction）、采矿（Mining）、制造业（Manufacturing）、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tion）、科研服务（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或者租赁和商业服务（Leasing and Commercial Service），如下表所示。具体来看，在项目类型分布上，2015 年，工程建设和制造业是投资最多的项目类型，分别为 95.10 和 46.30；2021 年，工程建设和制造业仍然是两个最大的行业，分别为 163.4 和 59.3。这表明这两个行业在这个特定领域中的投资或产值在这段时间内持续增长。租赁和商业服务在 2015 年到 2021 年之间经历了明显的增长，从 61.42 增长到 57.0。这表明这个行业在这个特定领域中的投资或产值稳步增长。科研服务在 2015 年到 2021 年之间有所下降，从 14.60 下降到 20.4。总体而言，大多数项目类型的投资或产值呈上升趋势。

表 1 中国 2013-2021 年对非 FDI 援助金额前 5 位类型（100mn US\$）

Year	Construction	Mining	Manufacturing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Leasing and Commercial Service	Other
20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5	95.10	95.40	46.30	34.20	14.60		61.42
2016	113	104.1	50.9	45.6	19.1		66.22
2017	128.8	97.6	60.8	57.1		23.1	65.85
2018	147.6	104.8	59.7	50.7		29.7	68.72
2019	135.9	110.2	55.9	52.4		24.9	64.85
2020	151.5	89.4	61.3	41.4		23.5	66.82
2021	163.4	99.9	59.3	42.0		20.4	57.0

注：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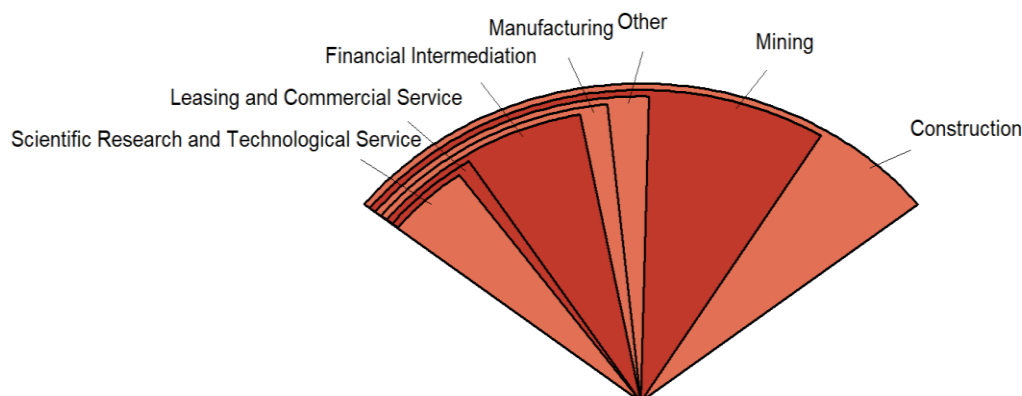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对非援助的类型平均占比 (100mn US\$)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从中国对非援助的类型平均占比来看，占比最大的工程建设、其次是采矿、处于末位的两位是科研服务或者租赁和商业服务。工程建设在援助占比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在援助项目中注重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采矿占比居于次要位置，这可能涉及到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服务的低占比可能反映出科技合作方面的一些限制，而租赁和商业服务的低占比可能受第三产业发展限制，也表明在这方面的援助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援助占比的这种分布也间接反映了非洲国家的整体产业结构，以及在发展中的阶段，对第一和第二产业的重点支持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域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迅速的影响。

2.1.2 中国对非援助的额度

(1) 中国对非援助的存量和流量分析

中国对非投资存量在国别方面，如下图所示，最高是南非、刚果共和国、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南非作为非洲最发达国家之一，其相对较高的经济水平可能吸引了更多的援助。刚果共和国、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等国家在地区内也属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因此可能受到更多援助的支持，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援助还可能因为地缘政治因素、战略地理位置而成为援助的优先对象。一些援助还可能与目标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能源需求相关。例如，刚果共和国和安哥拉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的援助可能与资源开发和能源合作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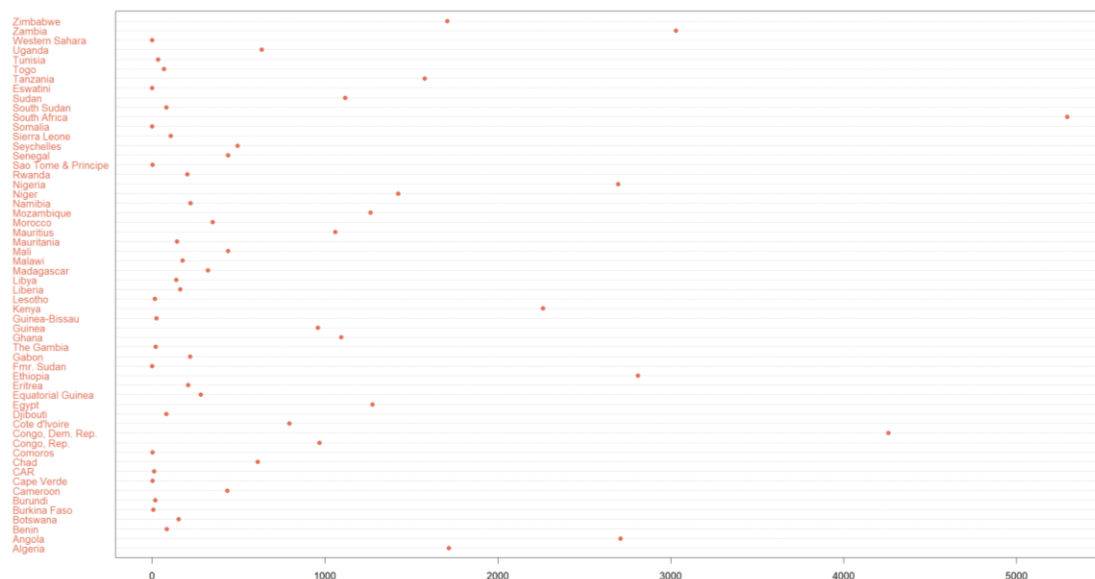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2021 年在非洲各国的投资存量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援助投资情况，本研究还将中国与美国的援助投资流量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 2010 年之前，美国对非援助投资流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并且一直高于中国。然而，自 2010 年之后，美国援助投资流量出现下降，甚至出现负数（撤资）的情况。相比之下，中国在同一时期的援助投资流量相对稳定，没有经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的援助投资流量在 2012 年之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健的状态，并且一直高于美国。这可能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投资的持续性和可靠性，与美国的波动和下降形成对比。在 2012 年之后，中国的援助投资流量明显超过了美国。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在非洲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持续关注。美国援助投资流量的下降和出现负数的情况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策变化、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关系的调整。这对比中国稳健的援助投资流量显示出了不同的国家战略和政策路径。下图将展示中国与美国援助投资流量的详细可视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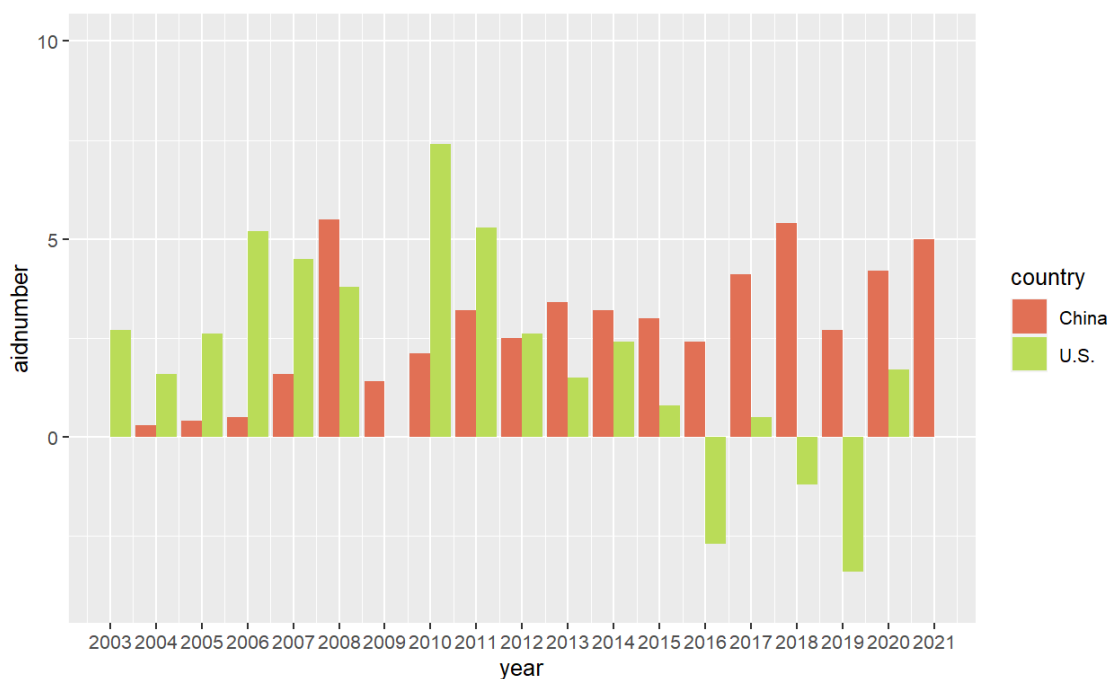


图 4 2003-2021 年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逐年投资流量对比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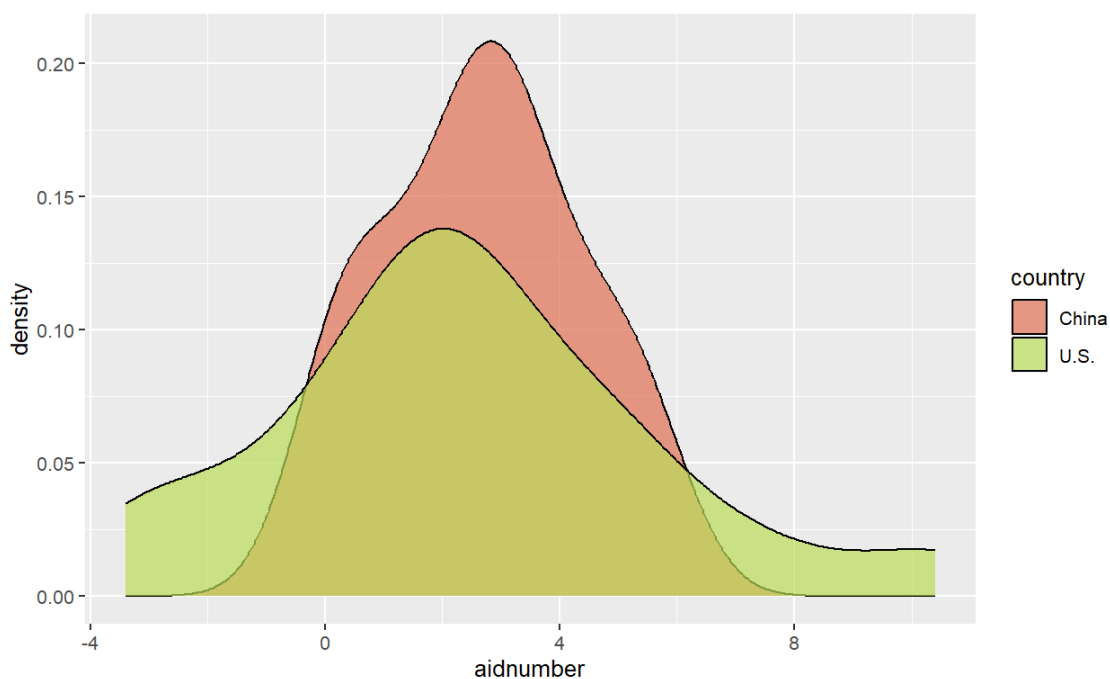


图 5 2003-2021 年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逐年投资流量密度对比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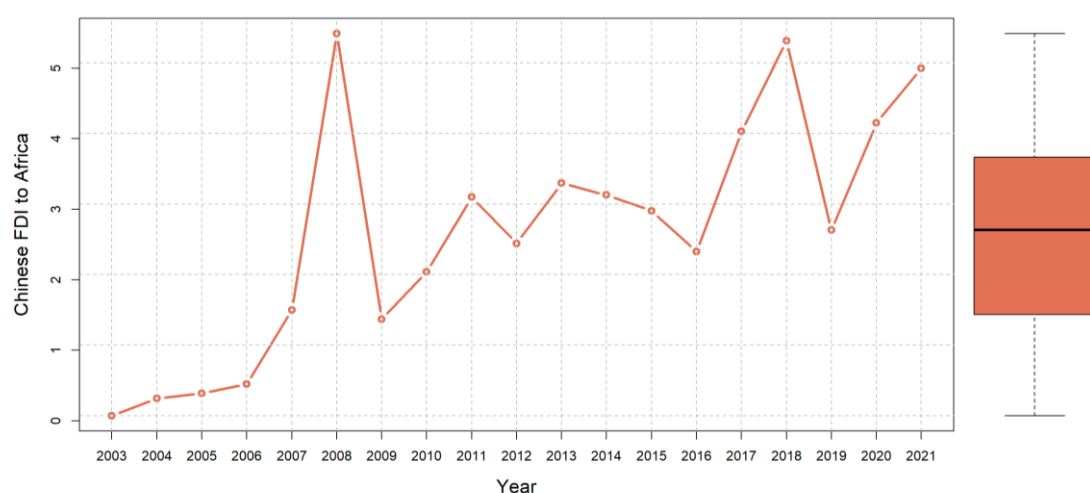


图 6 2003 年至 2021 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流量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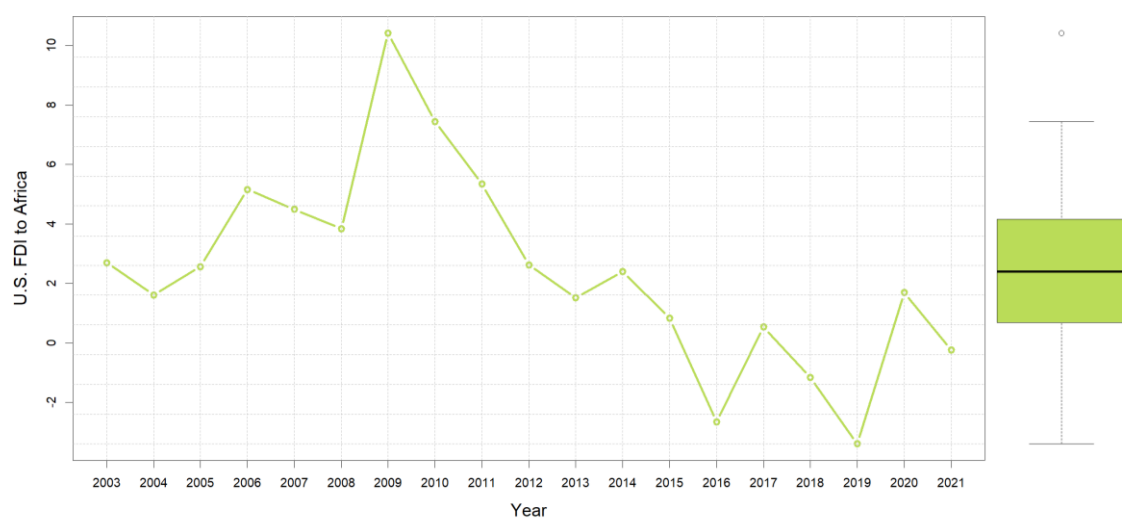


图 7 2003 年至 2021 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流量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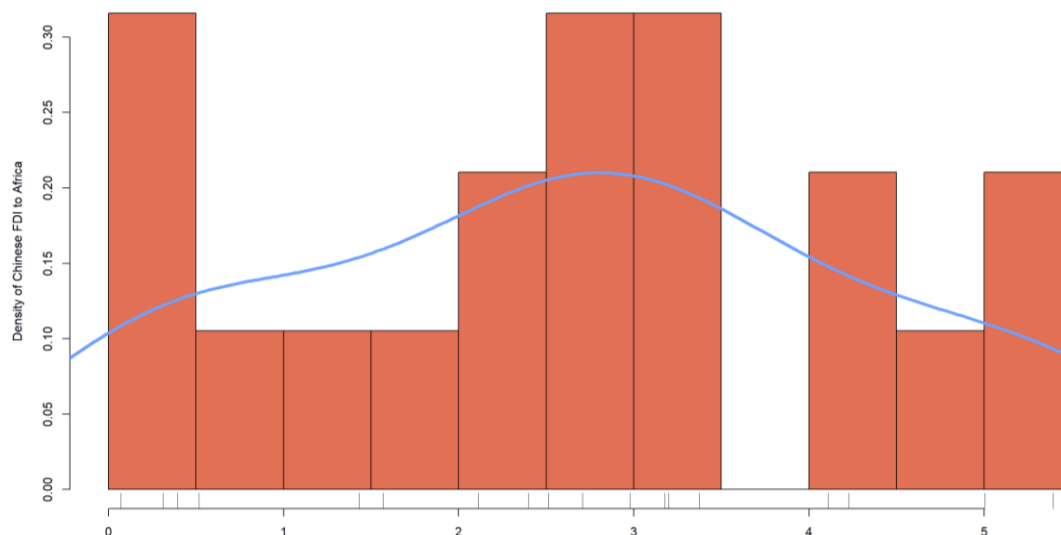


图 8 2003 年至 2021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流量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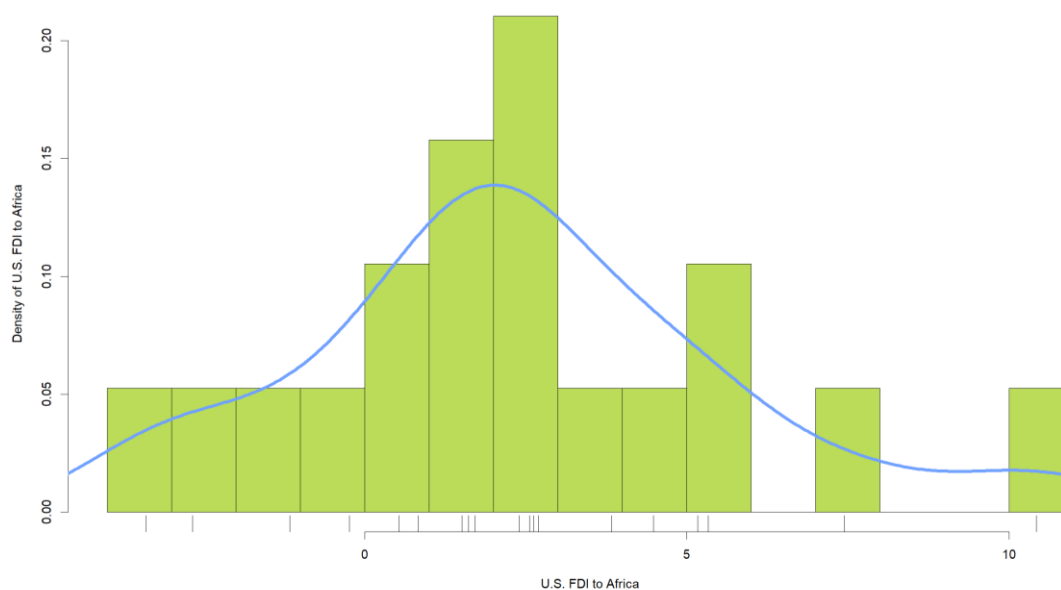


图 9 2003 年至 2021 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流量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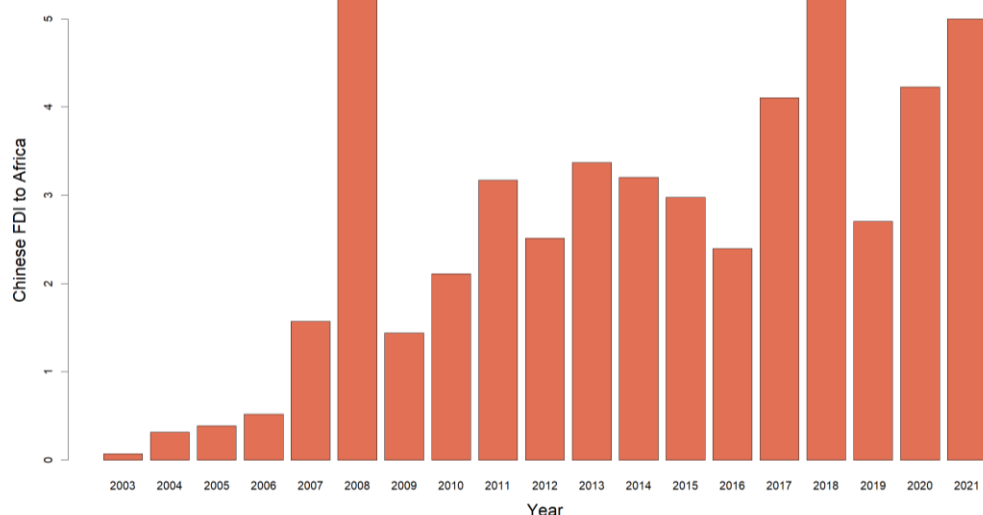


图 10 2003-2021 年中国在非洲的逐年投资流量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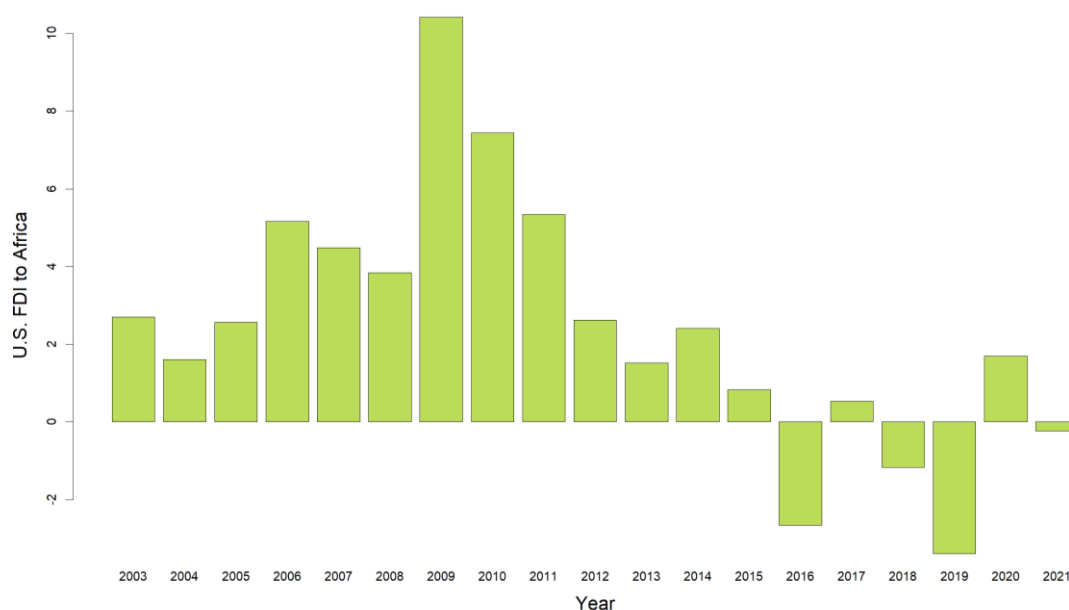


图 11 2003-2021 年美国在非洲的逐年投资流量 (US\$ b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 中国对非援助的收益分析

在 1998-2021 年间，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收益基本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发展。这种长期的投资表明了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直接带来社会福利的提

升，包括改善交通流动性、提供更可靠的能源供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这对于提升非洲居民生活水平和支撑可持续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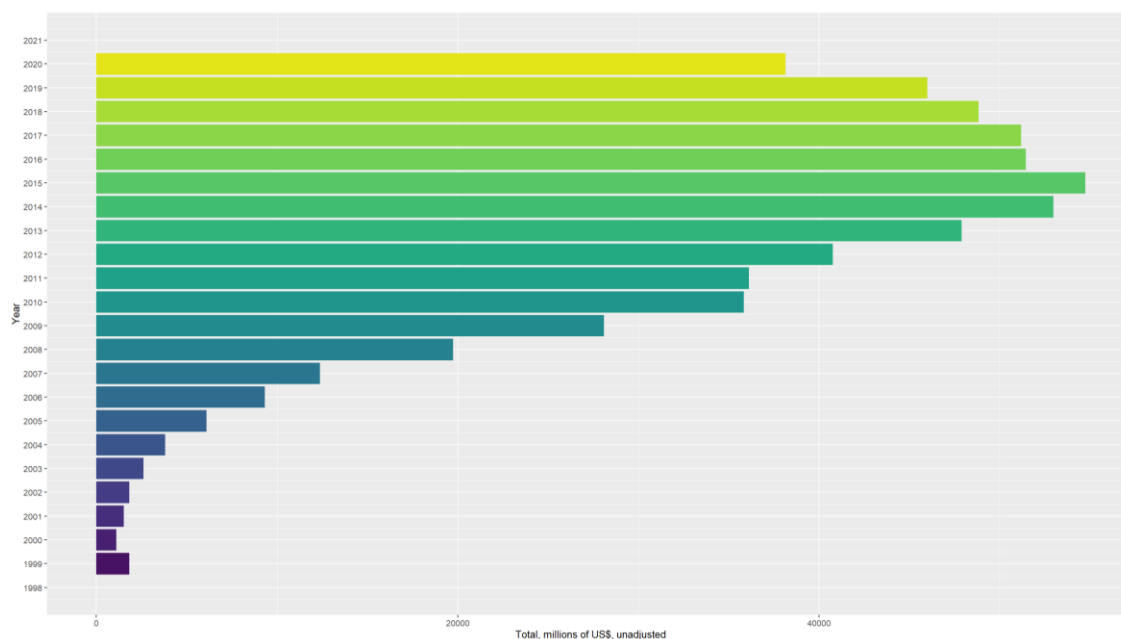


图 12 1998-2021 年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收益条形图 (US\$ m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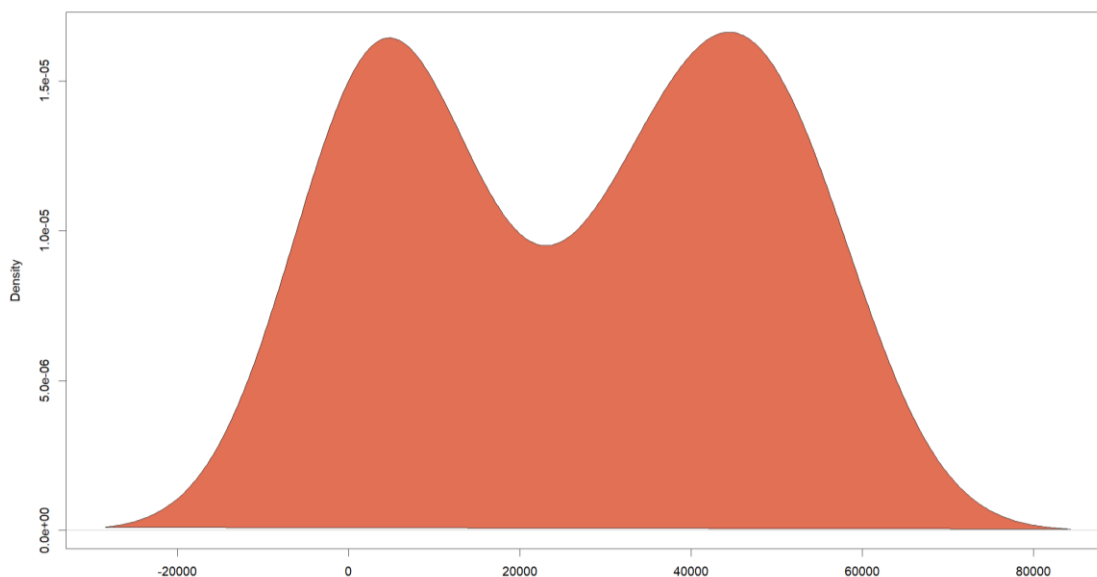


图 13 1998-2021 年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收益核密度 (US\$ m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然而，在 1998-2021 年间，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平均收益在撒哈拉南北国家间形成差异，在撒哈拉以北国家的平均收益高于在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平均收益。在撒哈拉以北的国家，

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平均收益较高。这可能受益于这些国家相对较为发达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基础，使得投资更容易取得回报。高平均收益也可能与这些国家更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关。在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平均收益相对较低。这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经济相对不发达、政治环境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这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投资的显著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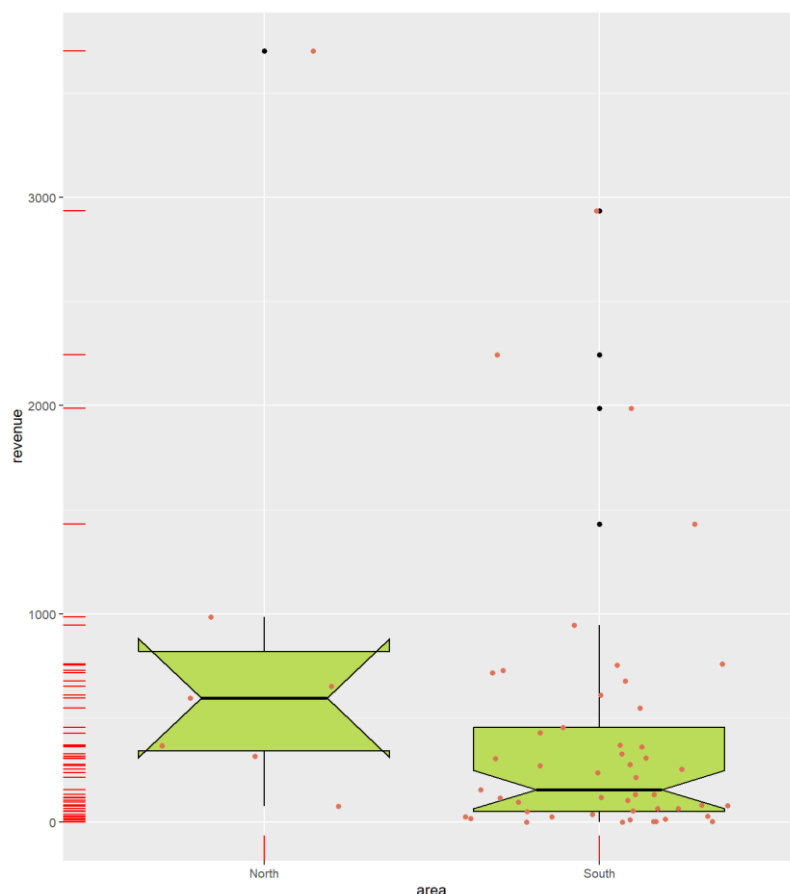


图 14 1998-2021 年撒哈拉南北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平均收益 (US\$ m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在撒哈拉南北国家的投资存量和收益的相关性分析中，撒哈拉以北的投资存量和收益呈现正相关。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投资存量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开始阶段，它们呈现正相关，即投资存量的增加伴随着收益的增加，然而当投资存量达到一定水平（约为 2000 US\$ bn）之后，它们的关系开始变为负相关，即投资增加反而可能导致收益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自身的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投资效益的递减等。在一些撒哈拉以南国家，可能存在一定的投资效益递减，即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相应的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出现收益下降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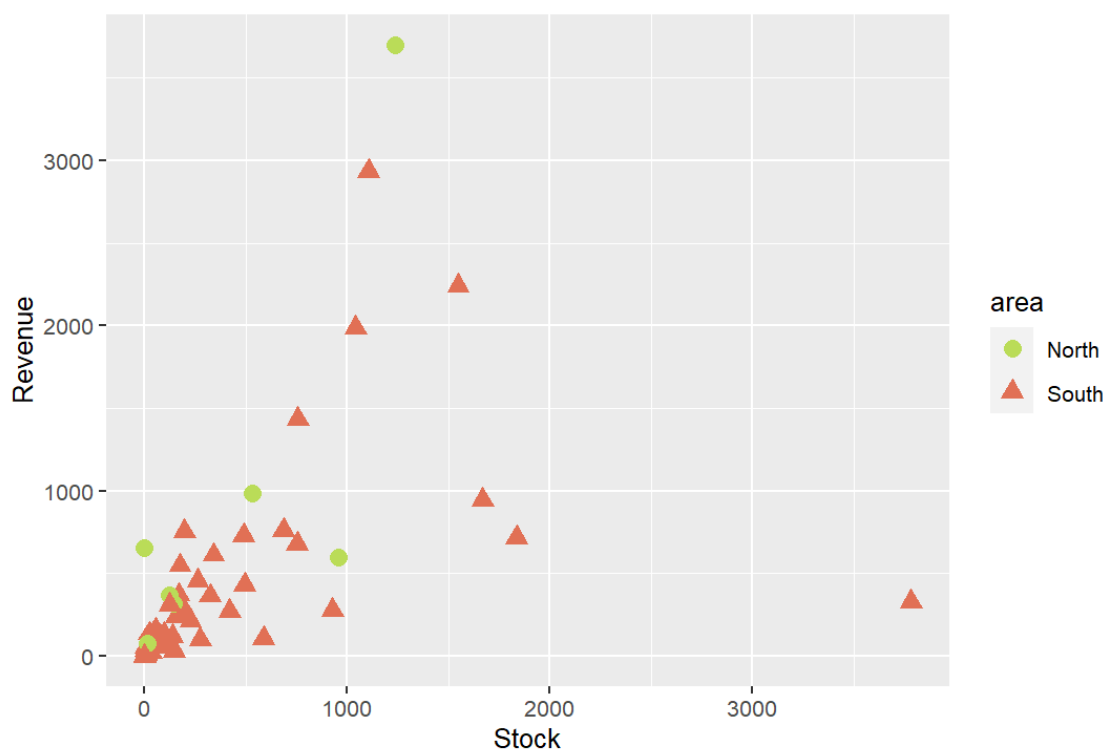


图 15 1998-2021 年撒哈拉南北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平均收益和存量散点图 (US\$ bn mn)
 注: 图形自制 (R),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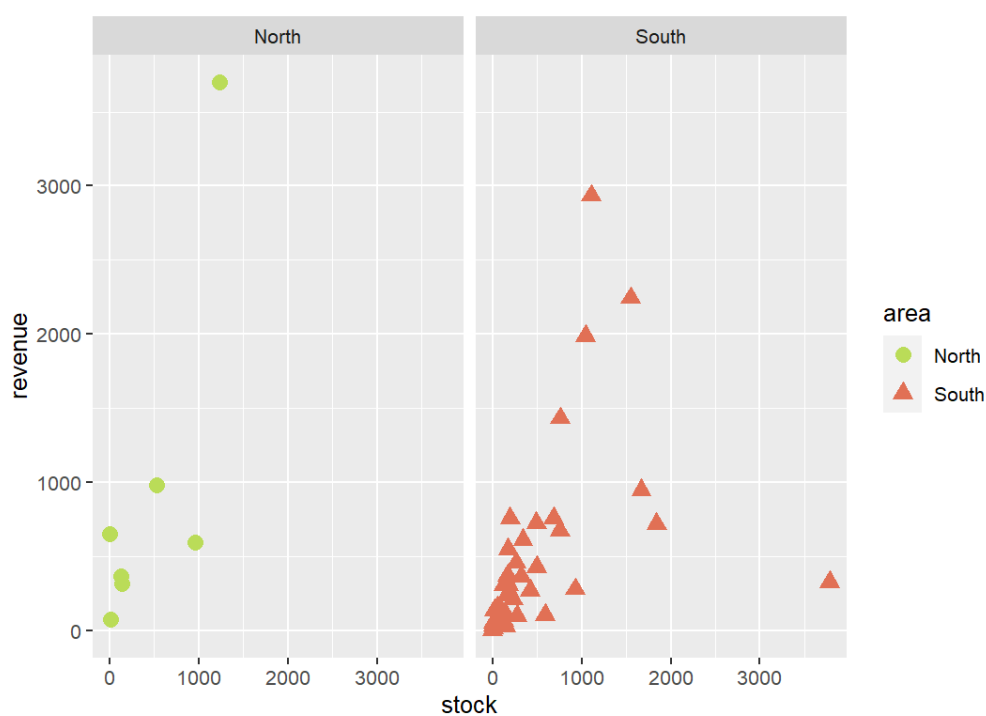


图 16 1998-2021 年撒哈拉南北中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平均收益和存量散点图 (US\$ mn)
 注: 图形自制 (R),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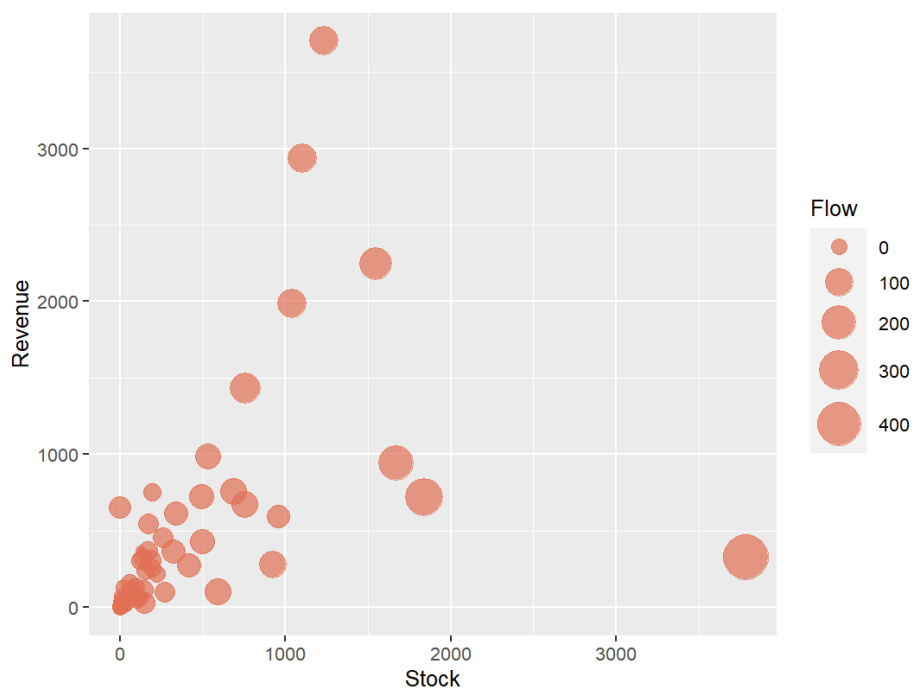


图 17 按流量划分的收益和存量散点图 (US\$ bn m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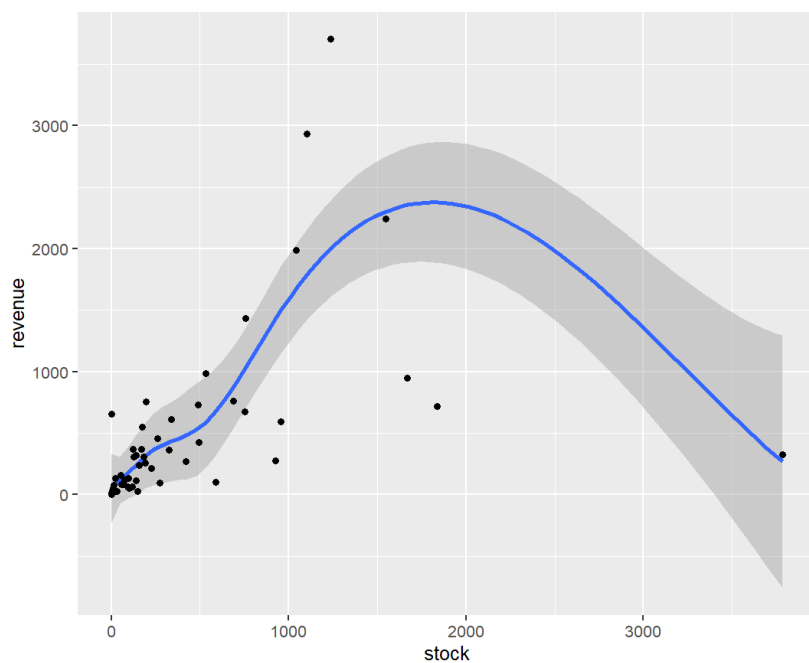


图 18 收益和存量之间的关系 (US\$ bn mn)

注：图形自制 (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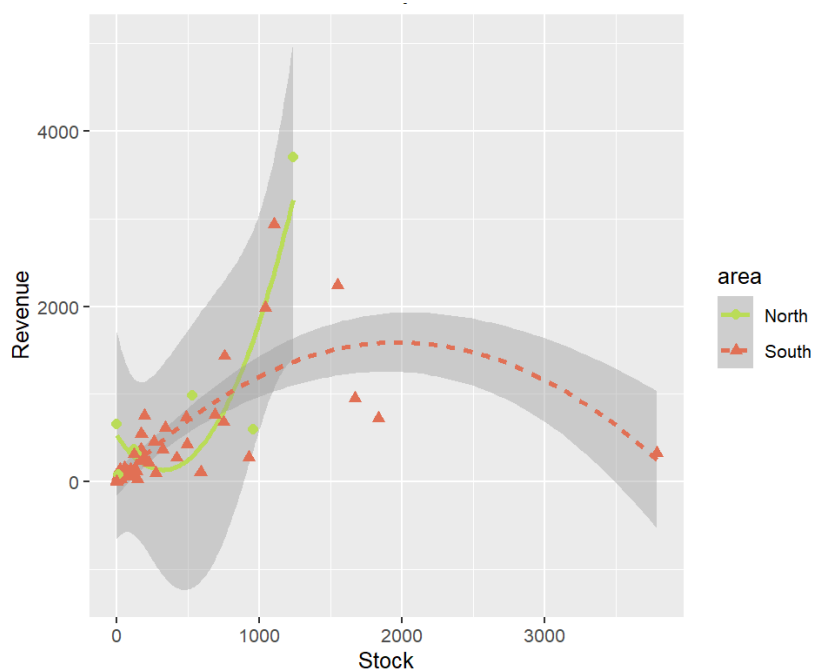


图 19 撒哈拉南北中国援助（投资）平均收益和存量之间的关系（US\$ bn mn）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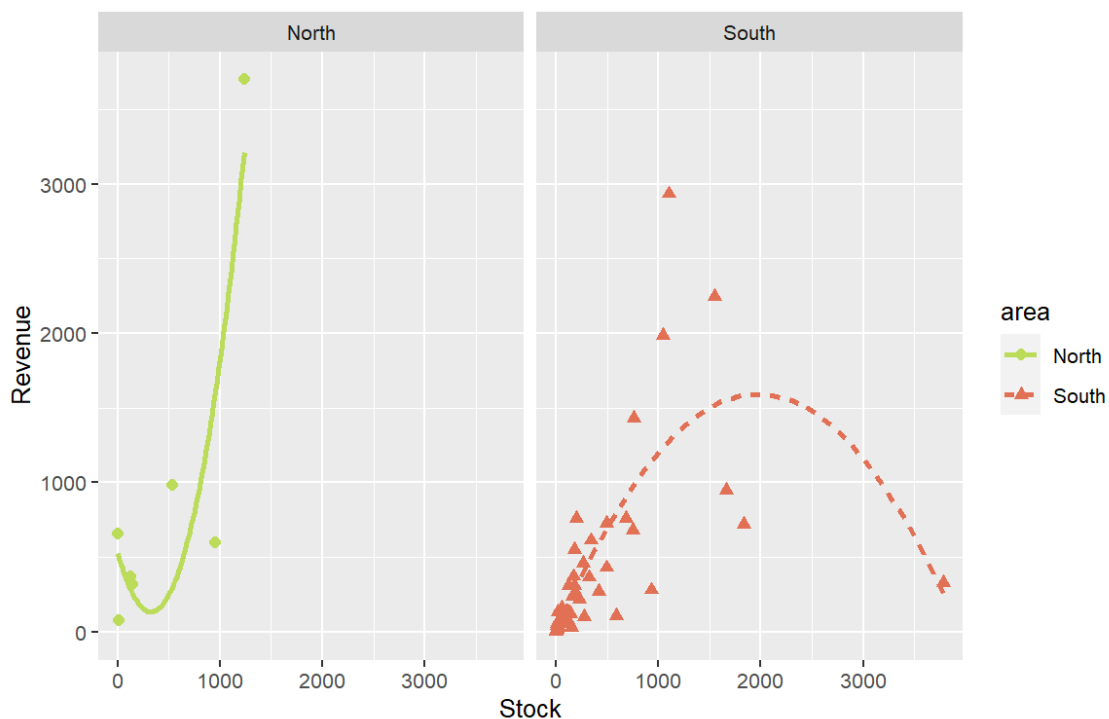


图 20 撒哈拉南北中国援助（投资）平均收益和存量之间的关系切片（US\$ bn mn）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和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总体上看，研究发现 2013-2021 年中国对非援助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采矿、制造业等领域，南非、刚果、赞比亚等国获得高额援助。工程建设一直占主导地位，且呈增长趋势。援助分布反映中国战略考虑，工程建设占比最高，采矿次之。总体援助呈上升趋势，撒哈拉以北国家平均收益高于南方，或因地缘因素，或因政治因素。

2.1.3 中国对非援助的分布

本研究根据威廉和玛丽全球研究院（William & Mary's 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的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数据集所提供的中国从 2000 年—2014 年对外援助的项目地理信息，进行了援助分布的热力图绘制，如下图所示，其中颜色越深代表援助数量越多。在无偿性援助方面，坦桑尼亚获得援助最多，赞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加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援助也较多。在包括援助在内的投资方面，坦桑尼亚、安哥拉、赞比亚、肯尼亚、肯尼亚、津巴布韦、加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数额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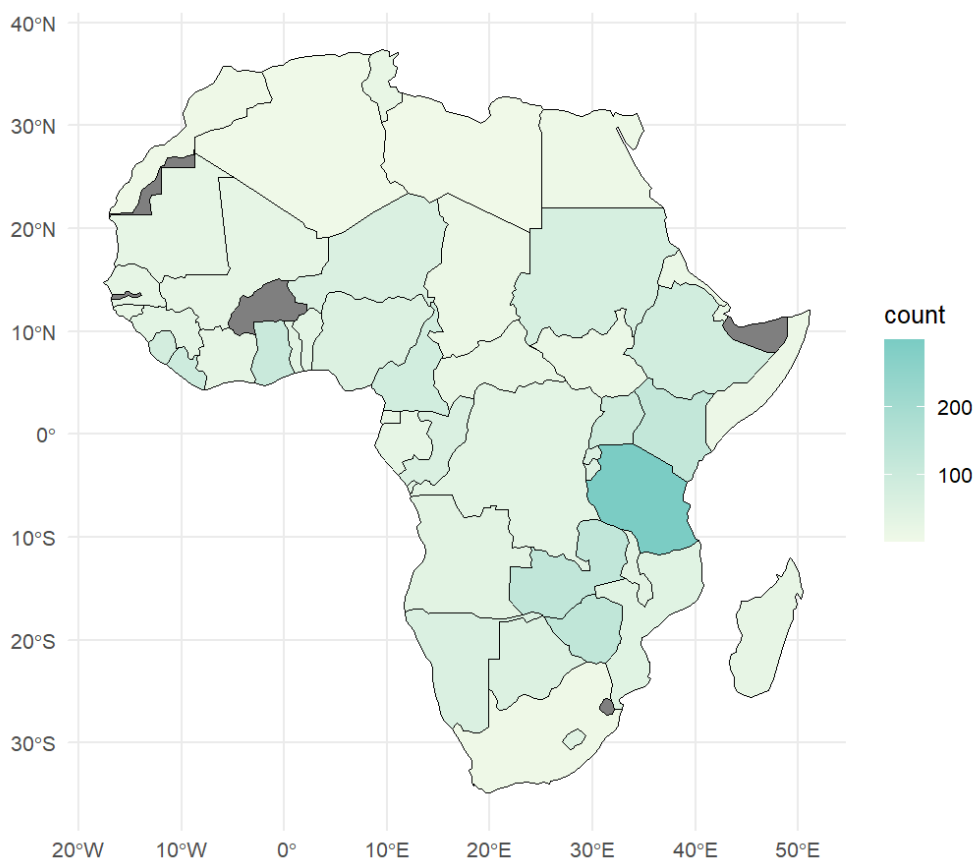


图 21 中国在 2000 年-2014 年间对非洲国家援助（Aid）的总数热力分布图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2000-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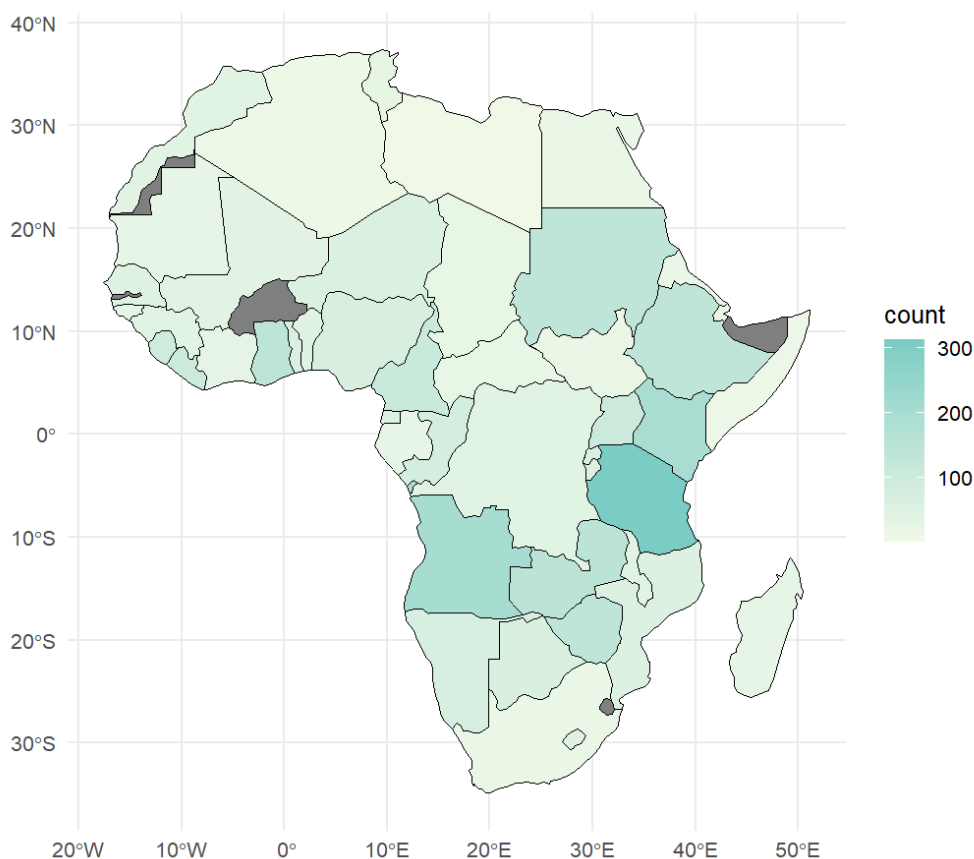


图 22 中国在 2000 年-2014 年间对非洲国家投资项目（不限于援助）的总数热力分布图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2000-2014)。

从无偿性援助和包括援助在内的投资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坦桑尼亚在这两个领域都获得了中国的较多支持，这可能反映了坦桑尼亚在中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赞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加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家也在无偿援助和投资方面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这种重合现象可能是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包括地缘政治关系、经济潜力、资源需求以及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历史等。因此，这些国家在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2 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文本分析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集体对话、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它的成立标志着中非关系开始由政治主导型或经济主导型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务实、理性合作关系的转变。^①中非合作论坛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点是**强调合作与务实**。尽管在上世纪各个时期中非合作原则的表述有所区别，但是核心思想并没有改变，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以及在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这些

^① 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J].探索与争鸣,2008(12):83-85.

原则是中非关系能够经受住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基础,也是中非关系与其他国家对非关系最大的区别所在,因此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另外,同西方国家落实与非洲制定的合作计划时表现出来的“雷声大、雨点小”相比,中国在落实此类行动计划时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在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后,中非合作论坛就设有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至今每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都会提出具体的合作纲领或行动计划,并且自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始,还会在一年后额外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并发布联合声明以继续深化落实中非合作的成果。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探究如此重要的中非合作论坛所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究竟体现了中非合作中的哪些特点?每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宣言与行动纲领具体聚焦于哪些领域?本节将采用词频分析的方法一探究竟。词频分析是文本分析的重要测量指标工具。^①中非合作论坛所发布的官方文件中的词频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非双方对某个合作领域或某种合作方式的重视程度。并且,中非合作论坛所发布文本词频分析的结果可以与中国对非援助的比较案例分析的结果相互印证,勾勒出更完整的中国对非援助的图景。

中非合作论坛 2000 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 2003 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回顾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后续行动落实情况,并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 2006 年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年)》;**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于 2009 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会议审议了中方关于论坛北京峰会后续行动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 年)》两个文件;**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2 年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 年)》两个文件;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5 年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 年)》两个文件,并在 2016 年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声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8 年举行,峰会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两个重要成果文件,并在 2019 年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审议通过《联合声明》;**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会议通过《达喀尔宣言》、《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 年)》、《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和《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4 份成果文件,并在 2022 年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审

^① 陈天祥;杨蕊.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测量--基于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1981—2015)[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101-112+190-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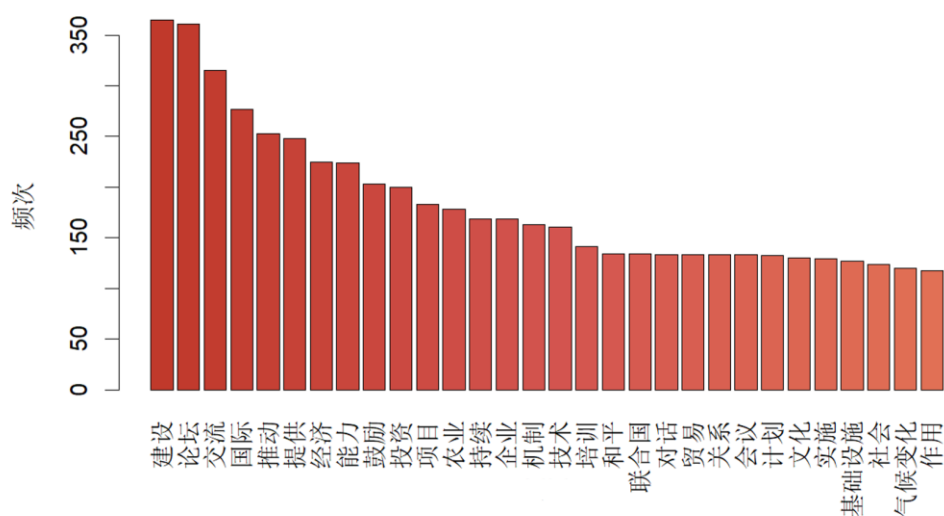


图 24 “中非合作论坛”的宣言、行动计划与联合声明文件词频数最高的 30 词条形图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外交部一中非合作论坛重要文件（2000-2021）。

在上述所有二十份文件中排名前三十的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组分别解读。

第一组词汇表明了中国在对非援助上的一贯的**原则与态度**。这组词汇有：**建设、交流、推动、持续、作用**等，分别出现了 365、315、253、168 以及 118 次。从这组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更多地是将重点放在**推动**受援国的自主经济建设上^①，使**建设**成为了文件中排名第一的热词。周恩来总理在 60 年代初就在接受非洲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基础。^②在“八项原则”中，中国强调：“（中国）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因此援助的实际**作用**要作为最终目的去考察。另外，平等与相互**交流**也一直是**中国**所坚持的原则，在“八项原则”中，还讲到：“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按国际市场议价，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由此可见，从上世纪 60 年代周总理提出的原则到如今的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文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态度是**持续**的、一以贯之的。这点受到了非洲人民的广泛欢迎。相比来说，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依靠官方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的结合，会组织庞大的学术评论与会议来定期评估与讨论对非援助。这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对于学者们重新发明援助的“配方”有很强的激励效果。但是来回转移的援助重点与复杂的援助方

① 陈雨露.新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研究[D].吉林大学,2023.

②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J],西亚非洲,2006,(08):11-20+79.

式对于非洲的减贫并没有产生很大贡献。^①而中国的援助在内容上要单纯得多,而且变化的频率要小得多;不仅是向非洲介绍自身发展的经验,更是主要考虑受援国的实际要求。最后,对比来看,这一组表示原则与态度的词汇相比于其他两组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也体现了中非合作论坛中凝聚的原则共识以及在此指导下的中非合作实践为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②。

第二组词汇相当具体地反映出中国与非洲合作的**主要领域**。这组词汇有**农业、企业、和平、贸易、文化、基础设施、社会、气候变化**等,分别出现了 178、168、134、133、130、127、123、120 次。我们可以发现,中非间的交流合作领域非常广泛,并且直接反映在文本中占很大比例。首先,中非**农业**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已经开展了六十余年,是中非最早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非农业合作是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进行的,集中于纯粹的农业领域,非洲的受援国单方面受益。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试行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把单向援助转变为双方合作:包括技术合作、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等等形式。随着中国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特别鼓励大型骨干企业在非洲进行资源开发型投资开发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收益。^③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非合作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农业作为中非合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点,也在论坛框架下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取得诸多新进展:合作方式从无偿援助转向援助、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合作主体从政府为主发展为多主体、多渠道共同参与;合作内容从粮食作物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扩展;合作形式从碎片化项目合作走向机制化合作^④。其次,中非间的**企业**与**贸易**合作也有着广泛且长足的发展。仅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期间的“中非企业家大会”中,就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中非企业家出席,讨论贸易投资和发展的问题,并进行了认真务实的六百多场洽谈,涉及农业、投资、工程建设、电子通信、医疗医药、纺织和化工等行业的二百九十六个项目。共签订了二十一项合作协议,总金额达十亿美元,这创下当年中非经贸合作的最高纪录,极大地促进了中非企业合作的热情和信心。^⑤第三,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中非交往更加频繁,互访的艺术团数量达到新高,新签订几十项文化合作协定;中非文化领域交往的规模与影响逐渐扩大,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不断加强;文化交流的渠道也不断拓宽,有一半左右的非洲艺术团是来应邀参与民间活动;中非文化交流内容也更加丰富,在公共传媒和考古方面的合作都有很大进展。^⑥第四,非洲**和平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很大程度上需要创新国际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才能有效应对。综合而言,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上的发展优先、可持续与当地化理念与平等对待、联动式治

^①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UP, 2009, pp.10-12.

^② 周玉渊.中非合作论坛 15 年:成就、挑战与展望[J].西亚非洲,2016,(01):4-21.

^③ 唐正平.前景广阔的中非农业合作[J].西亚非洲,2002,(06):13-17.

^④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J].西亚非洲,2020(05):3-20.

^⑤ 李军.中非合作论坛提速企业合作[J].中国中小企业,2009(12):44-46.

^⑥ 解飞.中国同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J].西亚非洲,2006,(06):59-61+80.

理、机制化治理等方式和举措对探索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式也有重要意义。^①第五，**气候变化的**议题也在中非合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一向高度重视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重要角色和合理诉求，始终在加强同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上走在前列。推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路径首先要立足现实需求，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能级、其次要着眼长远发展，强化非洲自主能力、最后要实现多方共赢，坚持绿色发展道路。^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非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相比于本组中的其他的词汇，基础设施这一词表述的是更具体更现实的合作领域。能够和更抽象的诸如企业与贸易、文化与社会等概念同时提起，更能说明中非合作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视。在 2001 年的非洲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就计划投以重资支持非洲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希望通过多种方式招商引资，通过外资合资等方式解决资金缺口。^③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是首届莫·易卜拉辛（Mo Ibrahim）卓越非洲领导力奖得主，他就曾在牛津大学组织的一场关于非洲援助的会议上指责西方的捐助者“系统性地驳斥”了非洲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而中国援助的特点正是集中于基础设施、生产能力与奖学金。^④基础设施落后是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瓶颈，中国通过提供援助和发展融资等方式大力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工程承包业务。在项目的实施上，中国强调南南合作与互惠互利，更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始终由非洲国家掌握完整所有权而不采取“捐赠-交付”模式，中国较少替非洲国家进行整体规划或设定复杂的前提条件，将项目的整体效益留给受援国衡量，自身更关注修建成本及按时交付。^⑤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开辟了对非援助新模式。^⑥

第三组词汇可以让我们管窥中国与非洲合作的形式与措施。这组词汇有**论坛、提供、鼓励、投资、技术、培训、会议、对话、计划**等，分别出现了 361、248、203、200、160、141、133、133、132 次；尤其重要的是，报告中还提到了 134 次联合国。首先，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继续为此提供优惠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并愿与非洲国家探讨促进投资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⑦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和活跃，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格局。尤其是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体现了中非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⑧其次，中方也很重视**技术**的**培训**。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趋势是技术合作日益提升到中非合作的战略层面并成为合作的优先领域。尤其是在贸易与投资、农业、环保、交通与医药技术领域，中非技术合作已从单纯的政府间合作方式向多层次、多领域、全

^① 张春.新时期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J].当代世界,2018(10):4-8.

^② 王珩.开启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新征程[J].当代世界,2023(03):52-58.

^③ 高馨宇.新时代中非合作[D].华东师范大学,2021.

^④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UP, 2009, pp.11.

^⑤ Tewodaj M. Mengistu, "Emerg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Mechanisms in Sub-Saharan Africa", RAND, 2013: 32-34.

^⑥ 王振.中国在东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D].南京大学,2019.

^⑦ 李军.中非合作论坛提速企业合作[J].中国中小企业,2009(12):44-46.

^⑧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方位合作发展。不光“授之以鱼”，也注重“授之以渔”，不断推动中非的共同可持续发展。^①中国的援非培训也一直坚持中非合作的原则：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展开，强调共同发展；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与非洲国家平等相待，真诚相助；重信守诺，与时俱进，符合非洲国家的需求；有完善的机制保障，项目落实有保障，可持续性强。中国援非培训多年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我们工作中坚持的原则深受非洲各国好评。^②第三是**论坛、会议与对话**。中国与非洲之间向来重视交流与对话。中非合作论坛在二十三年间已经举行了八届部长级会议以及三届领导人峰会；此外，中非经贸博览会也已经办到第三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非洲经济社会理事会联盟已经举行了三次圆桌会议；中非企业家大会也已经办了七届；此外还有中非版权合作论坛、中非经贸论坛、中非文化和旅游合作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等等对话交流活动数不胜数，中非间的沟通渠道从未如此畅通。最后，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中，**联合国**的存在也非常重要。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非洲各国人民曾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官方文件中，也强调了中国援非的工作要非常注意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等机构的通力合作；中国与非洲合作也要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等重大战略与条约相对接。这不仅仅是中非合作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更体现了中国是与非洲国家一道，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安理会承担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搞集团对立和分裂对抗。

表 3 TF-IDF 分析排名前 10 位的词语

关键词	百分比
建设	15.84%
交流	14.06%
国际	12.02%
经济	9.77%
能力	9.72%
投资	8.68%
项目	7.94%
非方	7.38%
持续	7.29%
企业	7.29%

注：分析工具为 Python。

根据 TF-IDF 分析，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建设、交流、国际、经济、能力、投

^① 刘青海,刘鸿武.中非技术合作的回顾与反思[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01):1-6.

^② 张振霞.中非关系中的援非培训[D].外交学院,2014.

资、项目、非方、持续、企业，反映出中国对非援助主要关注。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对非援助的相关文本中，“建设”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可能指向在援助项目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别关注。同时，“交流”和“国际”的高排名表明着中国在援助中注重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其他关键词如“经济”、“投资”和“项目”等则反映了在经济领域的援助和投资方面的关切。

TF-IDF – Python code

```
import jieba
from sklearn.feature_extraction.text import TfidfVectorizer
import pandas as pd

# 读取文本文件
def read_text_file(file_path):
    with open(file_path, 'r', encoding='utf-8') as file:
        return file.read()

# 读取停用词文件
def read_stopwords(file_path):
    with open(file_path, 'r', encoding='utf-8') as file:
        return [line.strip() for line in file.readlines()]

# 分词并移除停用词
def tokenize_chinese_text(text, stopwords):
    words = jieba.cut(text)
    return ' '.join(word for word in words if word not in stopwords)

# 加载数据和停用词
file_path = 'your_file_path.txt'
stopwords_path = 'your_stopwords_path.txt'
data = read_text_file(file_path)
stopwords = read_stopwords(stopwords_path)
# 对整个文档进行分词，同时应用停用词表
tokenized_data = tokenize_chinese_text(data, stopwords)

# 创建 TF-IDF 模型
vectorizer = TfidfVectorizer()
tfidf_matrix = vectorizer.fit_transform([tokenized_data])
# 提取关键词及其 TF-IDF 值
def extract_keywords_and_scores(tfidf_matrix, feature_names, n=10):
    row = tfidf_matrix.toarray()[0]
    top_indices = row.argsort()[-n:][::-1]
    top_keywords = [(feature_names[i], row[i]) for i in top_indices]
    return top_keywords

# 提取特征名（词汇）
feature_names = vectorizer.get_feature_names_out()
# 提取文档的关键词及其 TF-IDF 值
keywords_with_scores = extract_keywords_and_scores(tfidf_matrix, feature_names)
# 计算总 TF-IDF 值
total_score = sum([score for _, score in keywords_with_scores])
# 计算每个关键词的百分比
keywords_percentages = [(word, (score / total_score) * 100) for word, score in keywords_with_scores]

# 打印结果
print("关键词及其百分比: ")
for word, percentage in keywords_percentages:
    print(f"{word}: {percentage:.2f}%")
```

2.3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定性比较分析选择非洲 54 个国家进行研究，本案例主要关注“中国援助的实际值与平均值比较”这一结果，符合定类变量的基本特征，采用二分变量的赋值方法更能直观本质地呈现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此，研究最终选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分析中国对非援助路径。

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变量为中国援助和条件变量为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冲突。每个变量都为 2 分变量，分别表示高于平均值和低于平均值，对应赋值 1 和 0。其中，结果变量（中国援助）有四个子变量，包括 FDI、金融贷款、无偿援助和商业投资。每个子变量都有两个水平，表示对应类型的援助是否高于平均值（1）或低于平均值（0），最后综合根据平均值对比来赋值 1 或者 0；条件变量中，自然资源包括农业资源、矿产资源；经济发展包括 GDP 和人均 GDP；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里程数和铁路里程数；冲突包括种族冲突、军政冲突、国际冲突。

表 4 变量与赋值的设定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数据统计	赋值
结果变量	中国援助 Chinese aid	FDI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金融贷款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无偿援助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商业投资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条件变量	自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	农业资源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矿产资源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经济发展 GDP	GDP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人均 GDP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基础设施	公路里程数	高于平均值	1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数据统计	赋值
	infrastructure		低于平均值	0
		铁路里程数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冲突 conflict	种族冲突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军政冲突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国际冲突	高于平均值	1
			低于平均值	0

表 5 案例的赋值情况

State Name	Chinese Aid	Natural Resource	GDP per capita	Infrastructure	Conflict
Algeria	1	1	1	1	1
Angola	1	1	1	0	1
Benin	0	0	0	0	1
Botswana	0	0	0	0	1
Burkina Faso	0	1	0	0	0
Burundi	0	1	0	0	1
Cameroon	0	0	1	0	0
Cape Verde	0	0	0	0	1
CAR	0	0	0	0	0
Chad	0	1	0	0	0
Comoros	0	0	0	0	1
Congo, Rep.	0	1	0	0	1
Congo, Dem. Rep.	0	1	0	0	0
Cote d'Ivoire	0	0	0	0	1
Djibouti	0	0	0	0	1
Egypt	1	0	1	1	1
Equatorial Guinea	0	1	0	0	1
Eritrea	0	0	0	0	1
Ethiopia	1	1	1	0	0
Fmr. Sudan	0	0	0	0	1
Gabon	0	1	0	0	1
The Gambia	0	0	0	0	1
Ghana	1	1	1	0	1
Guinea	1	1	1	0	1
Guinea-Bissau	0	1	0	0	1
Kenya	1	0	1	0	1
Lesotho	0	0	0	0	1
Liberia	0	1	0	0	1

State Name	Chinese Aid	Natural Resource	GDP per capita	Infrastructure	Conflict
Libya	0	1	0	0	1
Madagascar	0	0	0	0	1
Malawi	0	1	0	0	1
Mali	0	0	0	0	0
Mauritania	0	1	0	0	1
Mauritius	1	0	1	0	1
Morocco	1	0	1	1	1
Mozambique	1	1	0	1	0
Namibia	0	0	0	0	1
Niger	0	0	0	0	0
Nigeria	1	1	1	1	0
Rwanda	0	1	0	0	0
Sao Tome & Principe	0	0	0	0	1
Senegal	0	0	0	0	1
Seychelles	0	0	0	0	1
Sierra Leone	0	1	0	0	1
Somalia	0	1	0	0	0
South Africa	1	0	1	1	1
South Sudan	0	1	0	0	0
Sudan	1	0	1	1	0
Eswatini	0	0	0	0	1
Tanzania	1	1	1	1	1
Togo	0	1	0	0	1
Tunisia	0	0	1	0	0
Uganda	1	1	1	0	0
Western Sahara	0	0	0	0	1
Zambia	1	1	1	1	1
Zimbabwe	1	0	0	1	1

表 6 csQCA 分析真值表

Natural Resource	GDP	Infrastructure	Conflict	Chinese Aid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1
0	1	0	0	0
0	1	0	1	1
0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0	0
1	0	0	1	0
1	0	1	0	1
1	1	0	0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表 7 条件组合的分析结果

条件组合	原覆盖率 raw coverage	净覆盖率 unique coverage	一致性 consistency
naturalresource*GDP 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好	0.529412	0.117647	1
GDP*infrastructure 经济发展好*基础设施条件好	0.470588	0.0588235	1
GDP*conflict 经济发展好*冲突少	0.647059	0.117647	1
naturalresource*infrastructure*~conflict 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条件好*冲突多	0.117647	0.0588235	1
~naturalresource*infrastructure*conflict 自然资源贫乏*基础社会条件好*冲突少	0.235294	0.0588235	1
solution coverage 结果覆盖率	1		
solution consistency 结果一致性	1		

Result=naturalresource*GDP+GDP*infrastructure+GDP*conflict+naturalresource*infrastructure*~conflict+~naturalresource*infrastructure*conflict

由以上分析数据可知:

以下事件覆盖比例最高的三种组合是中国援助最典型的组合

naturalresource*GDP (0.529412)

+GDP*infrastructure (0.470588)

+GDP*conflict (0.647059)

=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好

+经济发展好*基础设施条件好

+经济发展好*冲突少

表 8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结果

条件组态	组态一	组态二	组态三	组态四	组态五
自然资源	●			●	⊗
经济发展	●	●	●		
基础设施		●		●	●
冲突			●	⊗	●
一致性	1	1	1	1	1
原始覆盖度	0.529412	0.470588	0.647059	0.117647	0.235294
唯一覆盖度	0.117647	0.0588235	0.117647	0.0588235	0.0588235
代表案例	南非	摩洛哥	埃及	埃塞俄比亚	毛里求斯
解的一致性	1				
解的覆盖度	1				

研究采取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等提出的结果呈现方式，表述多个条件组态的基本特征。其中，实心圆（图例为“●”）指条件变量出现，其大小分别表征核心条件（图例为“\$”）与边缘条件（图例为“●”）；空心圆（图例为“⊗”）指条件变量未出现；空格表示条件变量的存在对结果而言意义不大。通过 fsQCA3.0 软件进行标准化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前三组条件组态的原始覆盖度较高、解释力较强，第四、五组条件组态的原始覆盖度较低、解释力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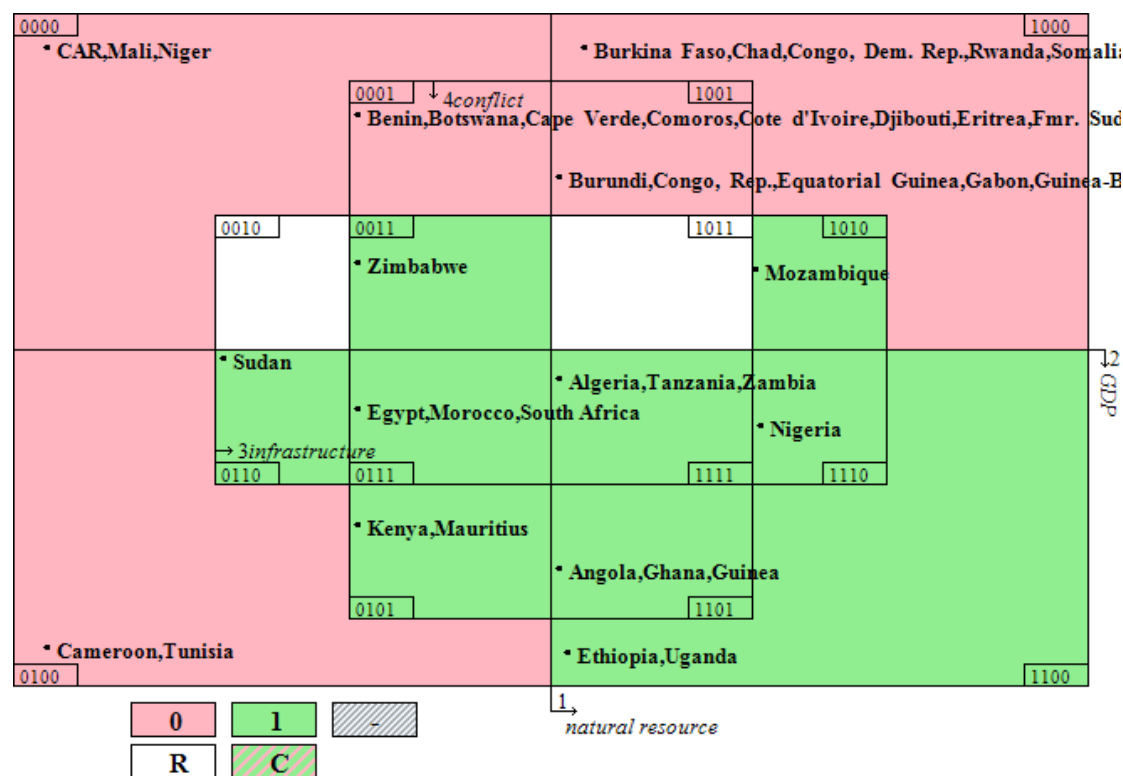


图 25 中国援助选择的原因条件组合的集合图示

注：图形自制（Tosmana）。

“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好”组合指示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中国援助的覆盖比例高。中国可能更倾向于向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以获取资源、扩大市场或推动双边经济合作。“经济发展好*基础设施条件好”组合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较好且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国家，中国援助的覆盖比例高。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对于能够支持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更为关注，以确保援助的有效实施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好*冲突少”组合表明在经济发展较好、冲突较少的国家，中国援助的覆盖比例最高。中国可能更愿意在相对稳定、冲突较少的国家进行援助，以确保援助项目的顺利进行，并减少不稳定因素对合作的影响。这些结果部分反映了中国援助决策的一些模式和偏好。中国的援助可能更倾向于与经济因素、资源条件、以及国家内部稳定性等因素相结合，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援助策略。这也强调了中国援助的多元化，因为覆盖比例最高的组合不

仅仅关注资源，还着重于经济、基础设施和冲突等多个方面。

2.4 非洲国家的社会网络分析

本研究的社会网络分析首先爬取外交部网站所公开的非洲国家介绍文本，对于文本中的国家情况进行分词统计。同一文档且同一段落中的关键词会建立相应联系，此后根据连接频次创建共词矩阵分析关键词之间的中心性，并绘制中心性图。

表 9 非洲国家的社会网络文本分析选词结果

序号	标签词	词频	文档频率
1	联合国	409	246
2	美国	400	155
3	苏丹	331	102
4	南非	285	142
5	欧盟	239	106
6	中非	214	74
7	马里	212	112
8	非盟	198	86
9	几内亚	172	78
10	安哥拉	162	73
11	中国	161	119
12	利比亚	158	43
13	南苏丹	149	46
14	阿拉伯	146	109
15	加纳	132	63
16	尼日利亚	118	68
17	乌干达	117	64
18	贝宁	117	49
19	阿尔及利亚	112	36
20	卢旺达	112	60
21	埃及	109	52
22	乍得	105	55
23	加蓬	102	49
24	肯尼亚	102	69
25	埃塞俄比亚	101	63
26	摩洛哥	98	46
27	日本	94	57
28	尼日尔	92	51
29	科特迪瓦	92	56
30	莫桑比克	87	56

序号	标签词	词频	文档频率
31	赞比亚	81	51
32	喀麦隆	76	46
33	塞内加尔	74	46
34	津巴布韦	72	41
35	突尼斯	71	35
36	布基纳法索	69	45
37	坦桑尼亚	63	53
38	索马里	59	36
39	几内亚比绍	56	26
40	佛得角	55	31
41	布隆迪	54	34
42	马拉维	50	33
43	塞舌尔	48	25
44	科摩罗	47	24
45	莱索托	43	27
46	赤道几内亚	42	24
47	毛里塔尼亚	41	23
48	博茨瓦纳	41	28
49	利比里亚	40	24
50	纳米比亚	38	32
51	毛里求斯	38	25
52	马达加斯加	37	25
53	吉布提	35	25
54	塞拉利昂	33	25
55	斯威士兰	33	20
56	冈比亚	27	20
5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2	9
58	多哥厄立特里亚	0	0
59	刚果(布)	0	0
60	刚果(金)	0	0

注：分析工具为八爪鱼和 Goosecker，数据来源为中国外交部官网。

表 10 非洲国家关系网络中心性分析

序号	节点 Nodes	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介数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1	南非	114	0.00621118	0
2	埃及	114	0.008474576	3.301007342
3	非盟	114	0.006993007	0

序号	节点 Nodes	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介数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4	几内亚	114	0.008264463	3.292442524
5	肯尼亚	114	0.00877193	4.789752678
6	几内亚比绍	112	0.008695652	6.434153383
7	埃塞俄比亚	112	0.007751938	0.388927252
8	联合国	112	0.006756757	0
9	乌干达	110	0.00952381	9.269669796
10	安哥拉	110	0.009345794	13.28485994
11	卢旺达	110	0.008928571	5.565058623
12	纳米比亚	110	0.009433962	32.01649824
13	加纳	110	0.008695652	3.101797398
14	莫桑比克	110	0.009174312	13.17689583
15	赤道几内亚	110	0.009259259	7.036402943
16	塞内加尔	108	0.008130081	2.033164054
17	津巴布韦	108	0.009345794	8.995302344
18	苏丹	108	0.007751938	0.200828157
19	乍得	106	0.008064516	1.597113887
20	中非	106	0.008849558	3.15382816
21	摩洛哥	106	0.008403361	1.055024365
22	加蓬	106	0.00862069	4.122147036
23	毛里塔尼亚	106	0.009615385	16.44490684
24	美国	106	0.007575758	1.071727561
25	佛得角	106	0.00952381	6.930580916
26	马里	104	0.008196721	2.648520338
27	贝宁	104	0.008403361	3.317716389
28	尼日尔	102	0.008264463	0.611694678
29	日本	102	0.009803922	33.35326969
30	博茨瓦纳	102	0.01010101	67.77175284
31	南苏丹	102	0.010204082	59.95227618
32	科特迪瓦	102	0.008695652	4.000896861
33	布基纳法索	102	0.008403361	0.754551821
34	布隆迪	102	0.009345794	22.20543666
35	尼日利亚	102	0.00862069	3.463058502
36	赞比亚	102	0.009009009	6.37067053
37	欧盟	100	0.009708738	17.51664833
38	马达加斯加	96	0.009708738	73.08053135
39	阿尔及利亚	96	0.008928571	21.29287815
40	利比里亚	96	0.008928571	5.363489756

序号	节点 Nodes	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介数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41	利比亚	94	0.008547009	7.931315749
42	科摩罗	94	0.010869565	139.3308293
43	坦桑尼亚	94	0.00952381	30.48486413
44	塞拉利昂	92	0.00877193	15.02269084
45	斯威士兰	92	0.01	43.94673567
46	冈比亚	90	0.009174312	17.13514132
47	突尼斯	90	0.009803922	39.76270737
48	阿拉伯	90	0.00877193	12.91854466
49	吉布提	90	0.009433962	50.15261271
50	中国	88	0.008928571	11.56662112
5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86	0.010526316	76.45370357
52	喀麦隆	74	0.00877193	32.84936142
53	莱索托	72	0.010989011	182.0969523
54	马拉维	70	0.009259259	12.48349065
55	毛里求斯	62	0.010526316	126.178009
56	索马里	60	0.009259259	37.79673968
57	塞舌尔	52	0.010638298	138.0388706

注：分析工具为 R，数据来源为中国外交部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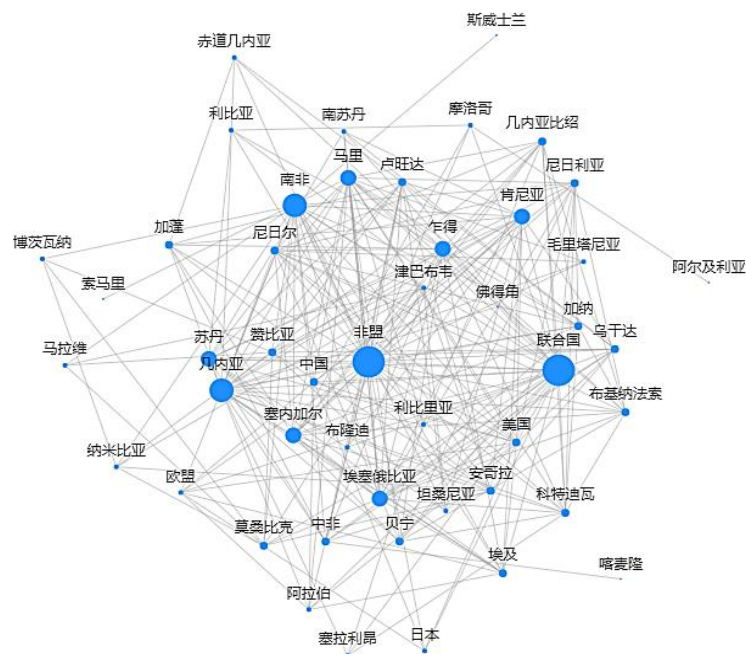


图 26 非洲国家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度图

注：图形自制（Ucinet 和 netdraw），数据来源为中国外交部官网。

南非、埃及、非盟、几内亚和肯尼亚是度中心性最高的节点，它们在网络中具有最多的连接。除了上述节点外，还有一些其他节点，如埃塞俄比亚、联合国、乌干达、安哥拉、卢旺达等，它们的度中心性也相对较高，表明它们在网络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连接角色。一些节点，如塞舌尔、索马里、毛里求斯等，具有相对较低的度中心性，说明它们在整个网络中的直接连接相对较少。

南非和埃及在度中心性上居于领先地位，可能反映了它们在非洲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方面的重要性。这两个国家在非洲经济和地缘政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非盟和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其在网络中的高度度中心性可能反映了它们在国际援助、合作和政治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一些国家如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在区域内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影响力较大，因此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度中心性。一些节点如索马里、塞拉利昂等可能由于冲突或政治不稳定性导致度中心性较低。总体而言，节点的度中心性反映了它们在中国对非援助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些高度中心化的节点也可能是中国战略合作和援助的关键伙伴。

2.5 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了描述性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定性比较分析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额度、政策、路径等方面。在描述性分析部分，通过对 2013 年至 2021 年的中国对非援助的详细描述，分析了援助类型、额度和地理分布。工程建设和制造业等行业在援助中占据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南非、刚果共和国等国获得了较高援助额度，可能与其较大的经济规模和地缘政治因素相关。在政策文本分析部分，主要对中国对非援助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了解援助的类型和关注重心。文本分析揭示了中国援助项目的主要关注领域和目标国家，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战略重心和政策取向。在定性比较分析部分（QCA），考察了中国援助与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冲突等条件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好、基础设施条件好、冲突较少是中国援助的典型组合，这为深入理解中国援助的动因提供了线索。在社会网络分析部分，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网络中各节点的度中心性。南非、埃及、非盟等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度中心性，反映了它们在中国对非援助中的关键地位。中国、美国、日本等全球经济大国也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度中心性。通过这些方法，更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多个方面，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揭示了援助的特点、影响因素和关键节点。这一综合分析为深化对中国对非援助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对非援助在帮助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以及援助效果的异质性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3.1 中国对非援助的分布情况

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中趋势，如下图所示，其中东非国家、几内亚湾国家援助项目较多。东非地区的一些国家可能面临相对较高的贫困水平，援助需求较为紧迫。中国可能选择在这些国家开展援助项目，以帮助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东非国家可能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通过在该地区实施项目，中国有望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几内亚湾地区的援助较多可能与该地区存在较多的疾病和政治动荡有一定的关联，并且几内亚湾地区由于能源等地缘政治位置对国际社会具有战略重要性，中国的援助项目也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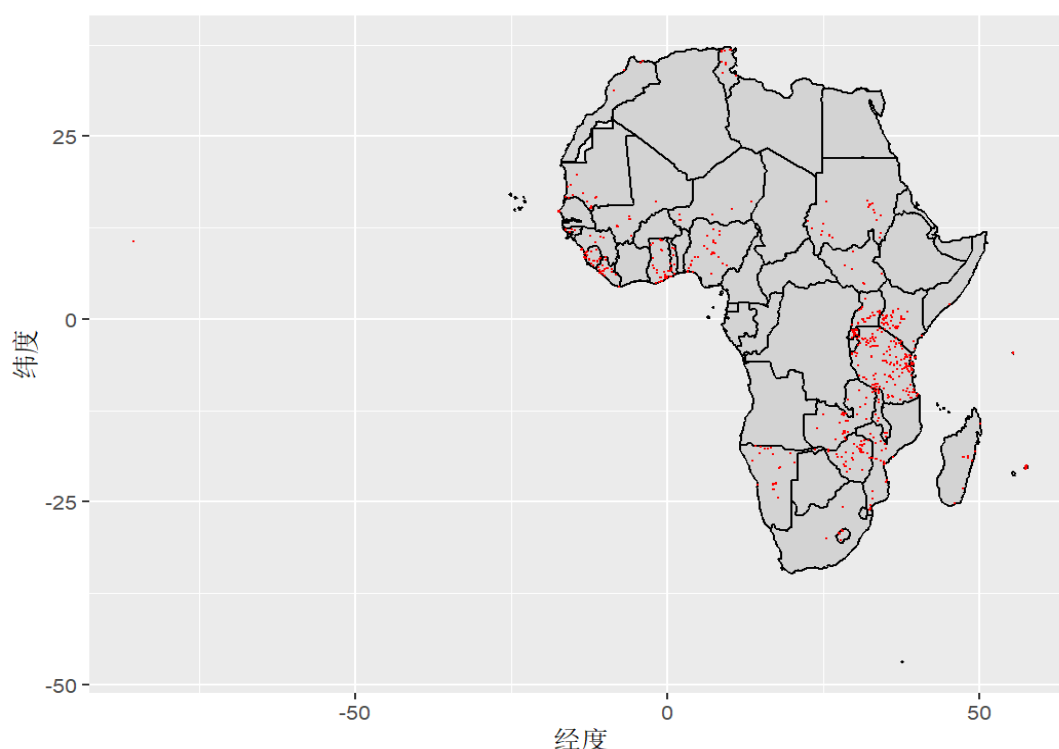


图 27 中国在 2000 年-2014 年间对非洲国家援助项目 (Aid) 的散点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 (2000-2014)*。

在包括援助项目的投资项目分布上，相对于援助项目的分布要分散化并且覆盖面更广，东非国家、几内亚国家仍然较多分布，地中海沿岸北非国家也存在较多的分布。东非国家在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可能与该地区相对较好的经济潜力、政治稳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有关。中国可能将援助和投资项目集中在这一地区，以支持其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地区合作。几内亚湾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

天然气，可能成为中国投资和援助的重点区域。中国可能通过在该地区开展项目来确保对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国家可能因其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而成为中国援助和投资的热点。这一地区可能受益于地中海沿岸的战略位置，为中国提供了更便捷的贸易和合作机会。同时，北非国家可能有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吸引中国在这一地区进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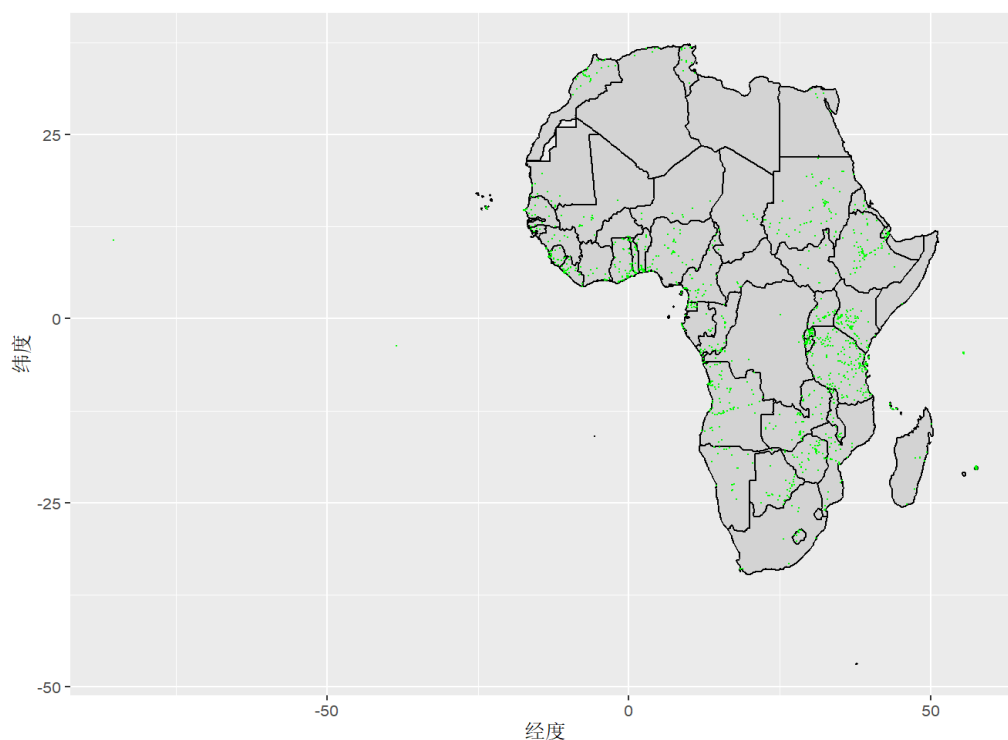


图 28 中国在 2000 年-2014 年间对非洲国家投资项目（不限于援助）的散点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 (2000-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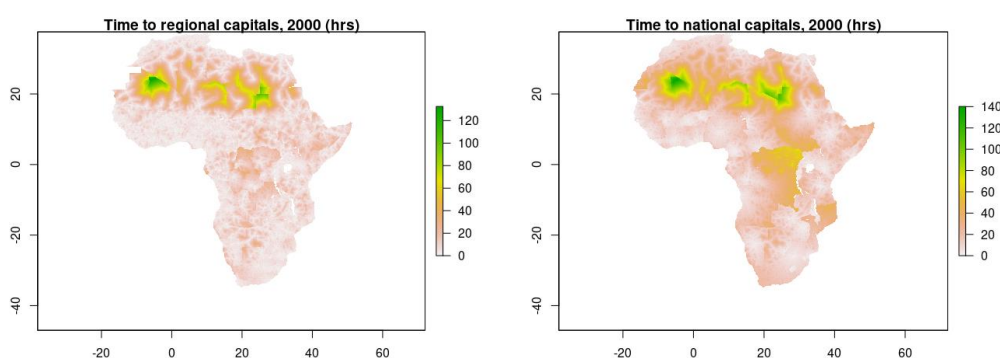


图 29 非洲市场通达度热力图

注：资料来源于 (Donaldson and Dave, 2018)。

图中颜色越偏向白色表明市场通达状况较好，距离主要市场中心较近，交通条件较好；颜色越偏向绿色表明市场通达状况较不好，距离主要市场中心较远，交通条件较差。综合来

看，投资和援助项目的分布往往受市场通达度的影响，通常来说，离首都或地区经济中心较近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援助。离首都或地区经济中心较近的地区通常具有更好的交通便利性，这使得投资和援助的实施更为便捷。交通便利有助于降低项目的运输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靠近首都或地区经济中心的地区更容易接触到更大规模的市场。这使得投资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商机，同时援助项目也能更广泛地造福当地居民，实现更为全面的经济社会效益。靠近行政中心的地区可能受到政府管理和监管的更为密切，这也有助于项目的有序进行，同时在政府层面也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协助。

3.2 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

根据研究回顾与前文的分析，国外援助可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的援助作为世界援助的一部分也具有促进经济增加的积极作用。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力量来源，相较于发达国家的援助可能会存在潜在的经济促进差异。基于此，本研究利用 AidData 数据库和 *Foreign Aid Shocks as a Cause of Violent Armed Conflict* 公开数据，并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国外援助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

假设 2：中国援助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

假设 3：发达国家（OECD）援助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

在回归分析的变量选取方面： $\ln_chinese_aid$ 为中国援助的金额取对数， \ln_OECD_aid 为 OECD 国家援助的金额取对数， $banks_combined$ 为冲突的发生等级， \ln_rgdpc 为人均 GDP 取对数， $\ln_population$ 为人口数量取对数， $infant$ 为婴儿出生率， $polity2$ 为政体的民主程度评分， $instability$ 为社会不稳定程度。具体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表 11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ln_gdp	261	120.0218	16.64726	74.10339	160.3248
$\ln_chinese_aid$	261	16.05653	3.857918	1.215878	27.40793
\ln_OECD_aid	261	19.67659	1.253856	15.90456	23.09351
$banks_combined$	261	.3141762	.9810464	0	6
\ln_rgdpc	261	7.534031	1.035136	4.577187	10.9824
$\ln_population$	261	15.98879	1.419159	12.82547	20.37492
$infant$	261	.5863277	.4351143	-.7711742	1.648857
$polity2$	261	.7471264	5.564762	-9	10
$instability$	261	.1877395	.3912542	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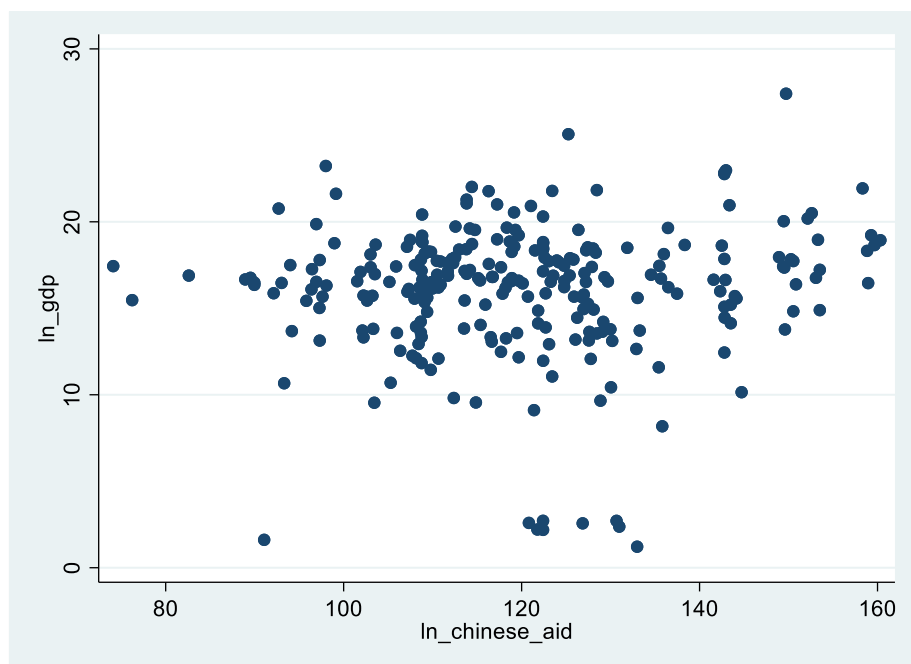


图 30 中国援助的对受援国 GDP 的影响

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数据为面板数据，在模型选择方面选择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 \ln_gdp_{it} = & \beta_0 + \beta_1 \ln_chinese_aid_{it} + \beta_2 \ln_OECD_aid_{it} \\ & + \beta_3 \ln_chinese_aid_{it} \times \ln_OECD_aid_{it} + \dots + \beta_k other_variables_{it} \\ & + \sum_{y=1}^t \gamma_y \times year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其中， \ln_gdp_{it} 表示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对数实际 GDP。独立变量包括中国援助 ($\ln_chinese_aid_{it}$)、OECD 国家援助 ($\ln_OECD_aid_{it}$)、中国援助与 OECD 国家援助的交互项 ($\ln_chinese_aid_{it} \times \ln_OECD_aid_{it}$)、人口规模 ($\ln_population_{it}$)、婴儿死亡率 ($infant_{it}$)、冲突的发生等级 ($banks_combined_{it}$)、政治体制民主评分 ($polity2_{it}$)、政治不稳定性 ($instability_{it}$)。模型还包括了 2000 年至 2006 年的时间趋势 ($\sum_1^t \gamma_y \times year_{it}$)。 μ_i 是固定效应， ε_{it} 是误差项。该模型用于研究中国援助和其他因素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 12 援助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固定效应面板回归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ln_chinese_aid$.0477336 (.1694802)		.0495791 (.1595372)	-1.418366 (2.843971)
\ln_OECD_aid			3.560652*** (1.10425)	3.561729*** (1.103163)	2.340061 (2.373747)
$\ln_chinese_aid * \ln_OECD_aid$.0748685 (.1424363)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ln_population	.6898877 (1.536461)	.6832051 (1.541283)	.4283748 (1.423865)	.4213547 (1.430986)	.3962244 (1.455463)
Infant	-11.41131** (3.596002)	-11.36339*** (3.605277)	-11.63666*** (3.723708)	-11.58695*** (3.725968)	-11.72416*** (3.726266)
banks_combined	.8076795 (.6916828)	.8197607 (.6941893)	.4877583 (.6071804)	.5002098 (.6113304)	.5252402 (.6344405)
polity2	.5766232 (.3608196)	.5775353 (.3640581)	.5032321 (.3125652)	.5041573 (.3155117)	.4980336 (.3191593)
Instability	1.194189 (2.730405)	1.205618 (2.748925)	.9423377 (2.7182)	.9541333 (2.736032)	.9985833 (2.728687)
<i>year</i>					
2001	.3404913 (.3940306)	.2732318 (.4542785)	.9319929 (.5451701)	.862312 (.5753947)	.8895441 (.573038)
2002	.9631562* (.5472797)	.9182603 (.6104596)	1.756138*** (.6431931)	1.709747** (.693221)	1.709424** (.6924372)
2003	1.593193 (.7573134)	1.528288** (.8441946)	1.121757 (.7972535)	1.0542 (.9061277)	1.110139 (.9060344)
2004	1.582609 (.7695394)	1.605391** (.7401494)	1.257188 (.9436383)	1.280753 (.9061277)	1.37804 (.89211)
2005	3.029561 (2.40083)	2.977201 (2.450146)	2.944836 (2.16921)	2.890426 (2.231466)	2.825033 (2.193005)
2006	.7959244 (2.691933)	.7502294 (2.731249)	.4176534 (2.721873)	.3700772 (2.750676)	.4527596 (2.757467)
Constant	113.275*** (24.08196)	112.6046*** (23.87321)	47.97631 (32.05747)	47.26017 (31.3641)	71.61845 (53.33197)
R ²	0.3436	0.3432	0.4493	0.4488	0.4575
Observation	219	219	219	219	219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数据来源：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of AidData 和 Foreign Aid Shocks as a Cause of Violent Armed Conflict (Nielsen et al,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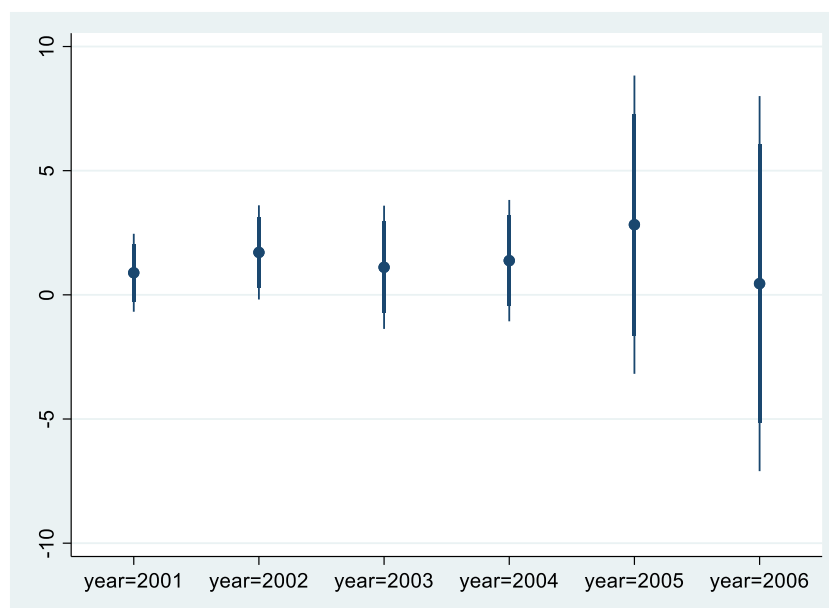


图 31 年份的回归系数及其 95%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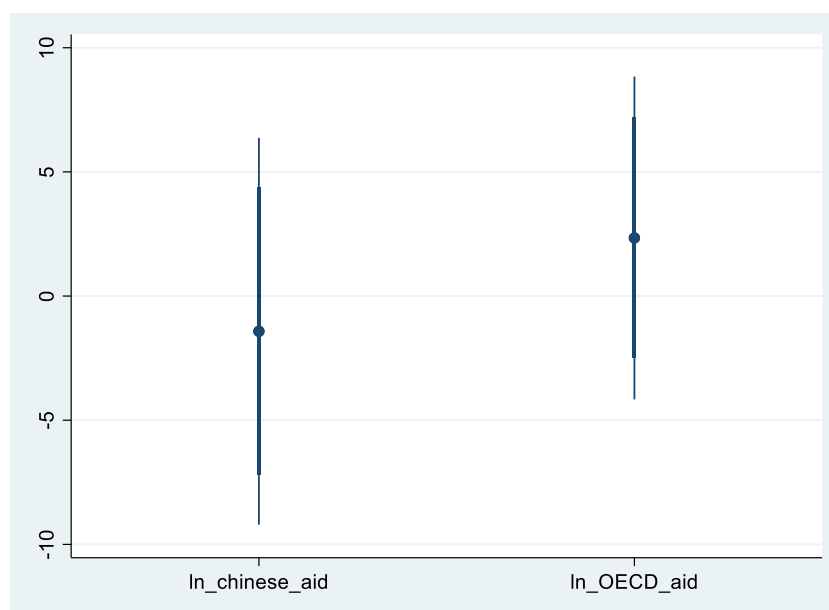


图 32 中国援助和 OECD 国家援助的回归系数及其 95%置信区间

从回归结果来看，很遗憾没有看到中国的援助对于非洲国家的 GDP 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但是 OECD 国家的援助对于非洲国家的 GDP 增长有着显著影响。在模型 2 中，中国援助的系数（0.0477）表明对 GDP 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但这也可能存在数据测量和模型设定问题。在模型 3 中，OECD 国家的援助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3.5607），表明对受援国的 GDP 有显著贡献。在模型 5 中，交互项（ $\ln_chinese_aid * \ln_OECD_aid$ ）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中国援助和 OECD 援助的联合效应与它们的个体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另外，人口规模（ $\ln_population$ ）对 GDP 增长有正向影响，表明较大的人口规模与更高的经济产出相关。婴儿死亡率的负系数意味着更高的婴儿死亡率与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关。总的来说，回归结果强调了 OECD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中国援助的影响较为复杂。人口规模、婴儿死亡率、冲突等级、政治体制和不稳定性等因素也在塑造经济结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3.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探讨了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地理分布及投资项目的情况，并对于援助项目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在地理分布趋势方面，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特别是在东非国家和几内亚湾地区。这反映了中国在选择援助地点时可能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包括贫困水平、发展潜力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性。东非国家可能因为历史关系、相对较高的贫困水平和较好的发展潜力成为援助的首要目标。通过在该地区实施项目，中国有望改善当地生活状况，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双赢合作。几内亚湾地区的援助或许与该地区存在的疾病、政治动荡以及战略地缘政治位置有关。中国的援助项目在这一地区更为广泛，

可能涉及多个领域。在包括援助项目的投资项目分布上，相对于援助项目，更为分散化且广泛覆盖。东非国家和几内亚国家仍占据较多份额，表明这些地区在中国的对非援助和投资中具有重要地位。此外，投资和援助项目的分布受市场通达度的影响，靠近首都或地区经济中心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援助，这与交通便利性和更大市场接触的可能性相关。最后，在援助对于经济影响的计量分析上，尽管中国援助在回归模型中对非洲国家的 GDP 增长影响不显著，但 OECD 国家的援助呈显著正向影响，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援助对于经济发展是存在显著影响的。其他因素如人口规模、婴儿死亡率、冲突等级、政治体制和不稳定性在经济结果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援助在回归模型中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援助项目的测量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包括对援助金额、项目范围和实施细节的准确捕捉。如果数据质量不高或存在不完整性，就可能影响了援助变量的解释力。（2）援助项目的效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而回归模型的时间跨度可能不足以捕捉到这些效果。如果援助项目的长期影响未能在短期内体现，就会导致在回归中看不到显著的效果。（3）中国的援助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农业、医疗等。这些项目的效果可能因项目类型的多样性而有所不同，使得在整体回归中难以捕捉到明确的影响。（4）不同地区可能对援助的反应不同，而回归模型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地区差异。一些地区可能更容易受到援助的影响，而另一些地区可能相对不敏感。（5）援助项目的成功也可能与受援国的政府管理和执行能力相关。如果受援国政府的不同因素影响了援助项目的实施和效果，这可能在回归模型中产生混淆。（6）回归模型可能未考虑到一些潜在的干扰因素，如社会文化因素、国际经济变化等，这些因素可能对援助效果产生影响。本研究还需要通过扩大数据时间跨度、深入了解援助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过程、考虑地区差异性、以及细化对政府因素的分析，以更准确地评估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的影响。

四、非洲族群关系及其变化

4.1 中国援助与非洲地区的族群分布状况

通过叠加非洲晴雨表聚落分布和中国援助项目分布数据，可以观察到中国的援助项目与非洲地区的族群分布存在许多重合，尤其是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以及几内亚湾沿岸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几内亚等。这种联系体现出中国的援助项目不仅涉及地理位置，还涉及历史、文化和经济因素。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在这些国家展开的援助项目通常旨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和经济合作，而这些项目会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族群关系。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改善交通、水源和能源，提高生活质量，但也可能导致土地使用变化，影响土著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另外，中国在这里推动的援助项目通常涉及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这些项目可能引发族群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资源分配和受益方面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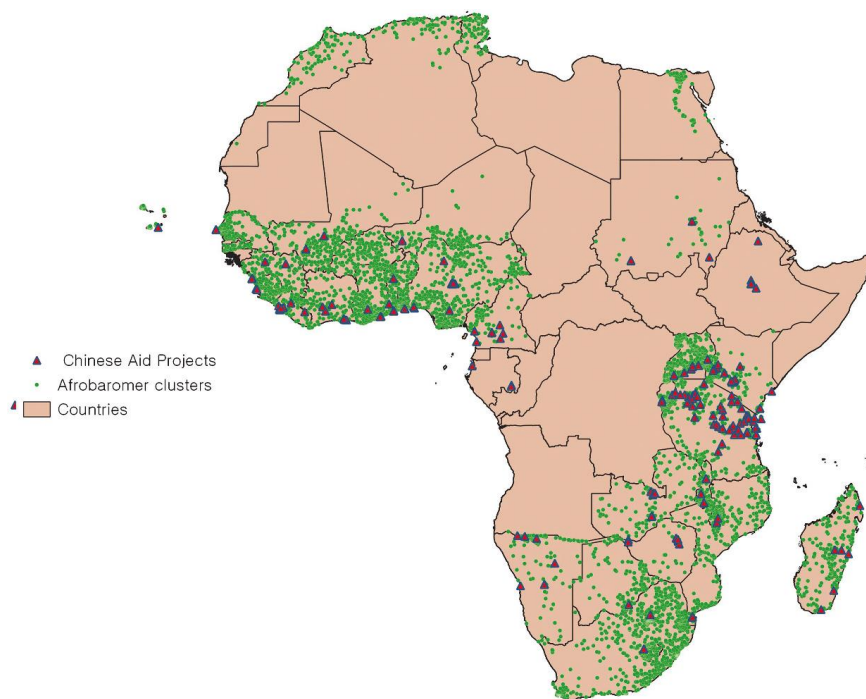


图 33 中国援助项目和非洲晴雨表聚落分布图

注：资料来源于 *Ethnic Power Relations (EPR) Dataset* 和 *Afrobarometer*。

本研究根据 ACLED 数据提供的 1997 年—2023 年的非洲冲突数据中的族群冲突部分进行抽样绘制，如下图所示。种族冲突多发生在国家的边境地区，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等国的边境地区；几内亚湾沿岸国家也是种族冲突频发的地区，例如尼日利亚、塞拉利昂。族群冲突的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暗示着边境地区的资源争夺、领土纷争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而几内亚湾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战略重要的区

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成为各个族群之间发生冲突的导火索，同时国家边境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为冲突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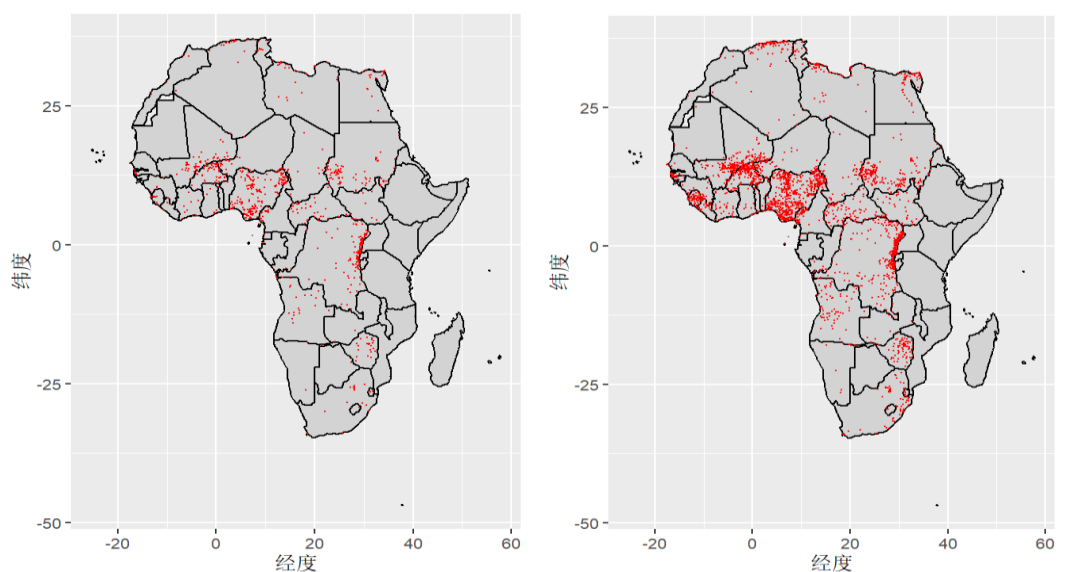


图 34 非洲冲突散点分布地图（左图为随机抽样 1000，右图为随机抽样 5000）

注：图形自制（R），资料来源于 ALCED。

当聚焦于特定年份的冲突状况时（本研究选定 2021 年的冲突数据），具体地理分布状况如下图所示。中国在东非地区集中援助的国家的冲突状况相对较少，西非地区的几内亚湾沿岸国家的冲突也相对较少，但是尼日利亚、布基内法索、马里等受援较多的国家冲突数量也相对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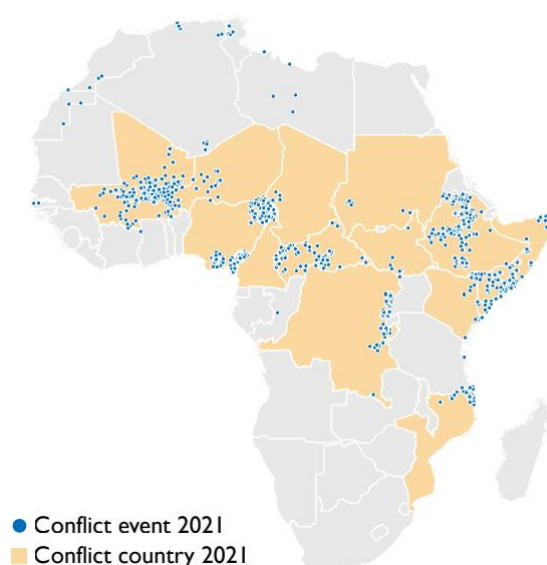


图 35 非洲 2021 年冲突分布

注：资料来源于 *Conflict Trends in Africa, 1989–2021*。

上述分析发现，中国援助项目与非洲族群分布存在紧密联系，尤其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几内亚湾沿岸国家。族群分布密集很可能出现族群冲突，ACLED 数据也表明这一点。中国援助项目与非洲族群分布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的，下文将进行实证检验。

4.2 族群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国别分析

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族群分布和族群冲突之间关系，本研究选择乌干达作为案例，通过 *Spatially Interpolated Data on Ethnicity – SIDE* 数据对于乌干达的族群分布和宗教信仰分布的微观层面观察，直观性地分析族群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关系。

如下图中乌干达的民族分布情况，乌干达不同族群分布的集中程度较为明显，几乎呈显著明显的点块状分布，这反映出乌干达境内的族群异质性和相互独立性较大。根据上文的冲突分布图可知，在乌干达西侧边境地区，冲突发生的数量较高。而乌干达西部的族群的异质性程度较高，直观上看，乌干达的族群异质性对于冲突的发生存在潜在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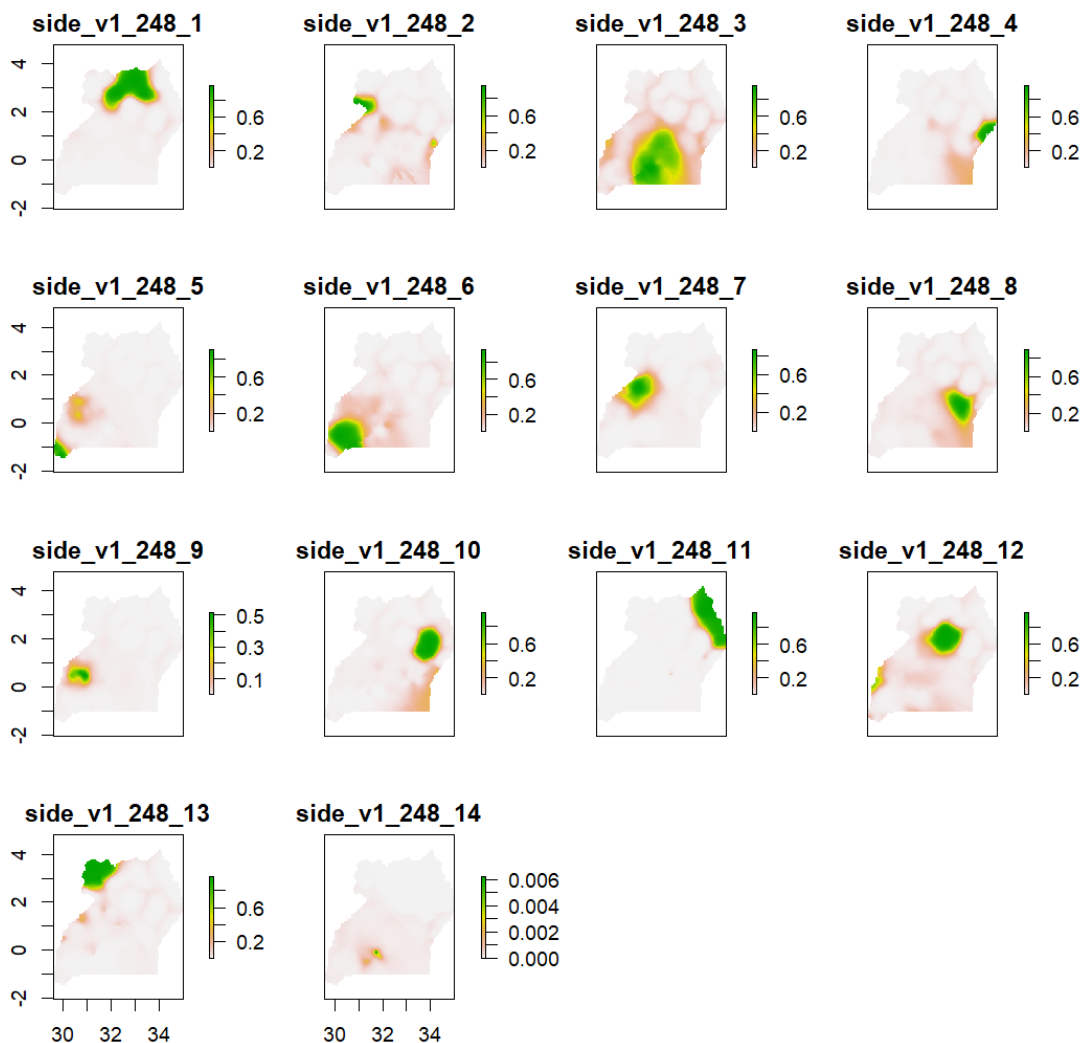


图 36 乌干达民族 (ethnic) 分布

注：图片自制 (R)，数据来源为 *Spatially Interpolated Data on Ethnicity – SIDE*。

乌干达地区主要是天主教、清教、伊斯兰教和其它宗教 4 种宗教类型分布。天主教主要分布在乌干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伊斯兰教分布范围较少，主要是在西北角非常小的区域，新教徒主要在乌干达的南部地区，其它宗教主要在乌干达的西南角。总的来看，乌干达宗教异质性程度不高，但是乌干达的边境族群冲突程度很高。因此，仅从地理分布来看，并没有明显反映出乌干达是由于宗教的分裂性导致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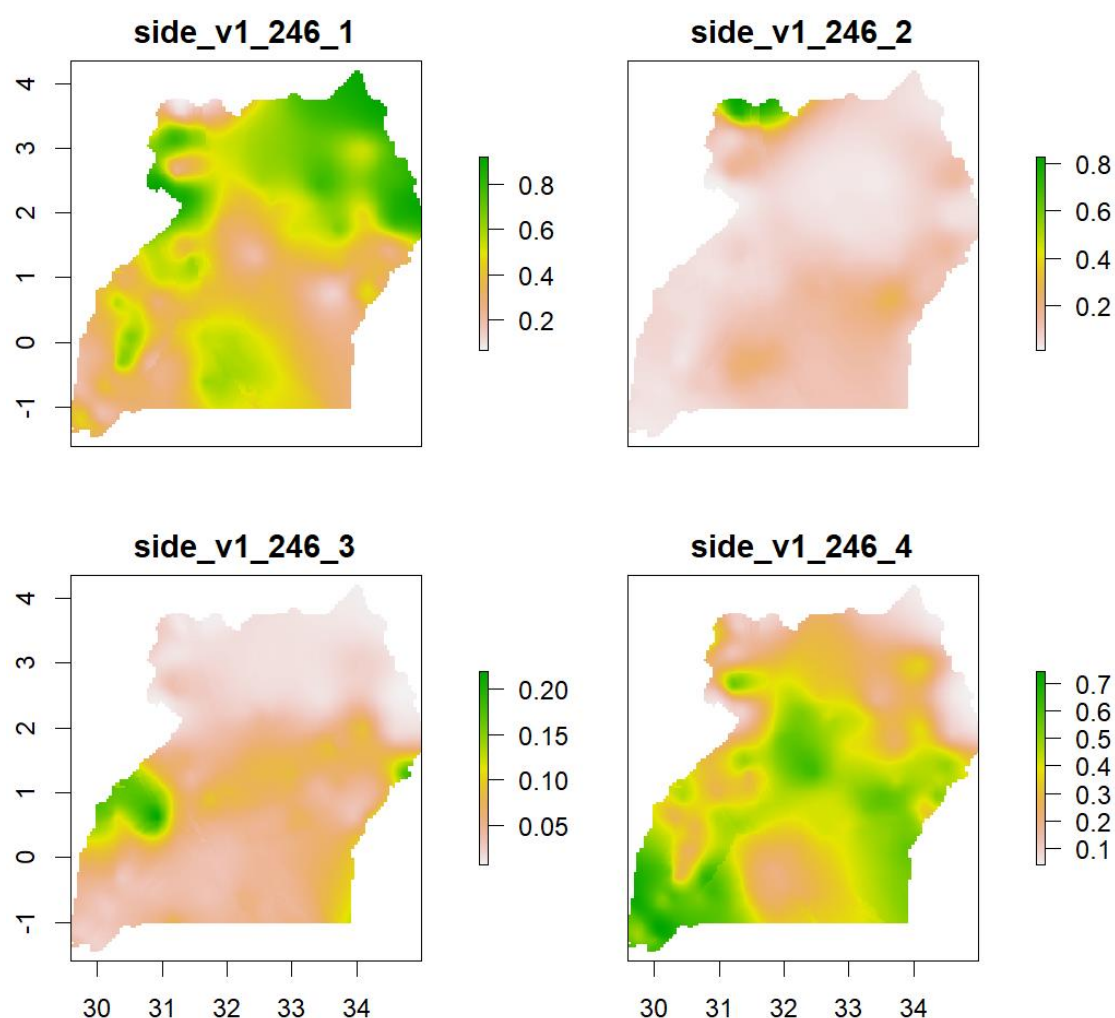


图 37 乌干达宗教 (religion) 分布

注：图片自制 (R)，数据来源为 *Spatially Interpolated Data on Ethnicity – SIDE*，图 1 为天主教 (catholic)，图 2 为穆斯林 (muslim)，图 3 为其它 (other)，图四为新教徒 (protestant)。

4.3 中国援助对非洲族群冲突影响的实证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开放程度的提高。基础设施援助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进不同地区的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发展，外来援助可能会改善族群关系，减少族群之间的冲突状况。同样，本研究利用 AidData 数据库、ACLED 数据库和 *Foreign*

Aid Shocks as a Cause of Violent Armed Conflict 公开数据，并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国外援助减少了族群冲突状况。

假设 2：中国援助减少了族群冲突状况。

假设 3：发达国家（OECD）援助减少了族群冲突状况。

在回归分析的变量选取方面：*banks_combined* 表示非洲国家的族群冲突程度预告表示相对越稳定，*ln_chinese_aid* 为中国援助的金额取对数，*ln_OECD_aid* 为 OECD 国家援助的金额取对数，*ln_rgdp* 为人均 GDP 取对数，*ln_population* 为人口数量取对数，*infant* 为婴儿出生率，*polity2* 为政体的民主程度评分，*instability* 为社会不稳定程度，*ethnic_frac* 为族群状况随年份的变化，数值越大表示族群派系构成越复杂。具体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表 1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banks_combined	261	.3141762	.9810464	0	6
ln_chinese_aid	261	16.05653	3.857918	1.215878	27.40793
ln_OECD_aid	261	19.67659	1.253856	15.90456	23.09351
ln_rgdp	261	7.534031	1.035136	4.577187	10.9824
ln_populat_aid	261	15.98879	1.419159	12.82547	20.37492
infant	261	.5863277	.4351143	-.7711742	1.648857
polity2	261	.7471264	5.564762	-9	10
instability	261	.1877395	.3912542	0	1
ethic_frac00	261	.0879476	.2349075	0	.8994653
ethic_frac01	261	.0878116	.2349483	0	.8994653
ethic_frac02	261	.0916098	.238706	0	.8994653
ethic_frac03	261	.08843	.2343206	0	.8994653
ethic_frac04	261	.08843	.2343206	0	.8994653
ethic_frac05	261	.0868984	.2333493	0	.8994653
ethic_frac06	261	.0917458	.2386637	0	.8994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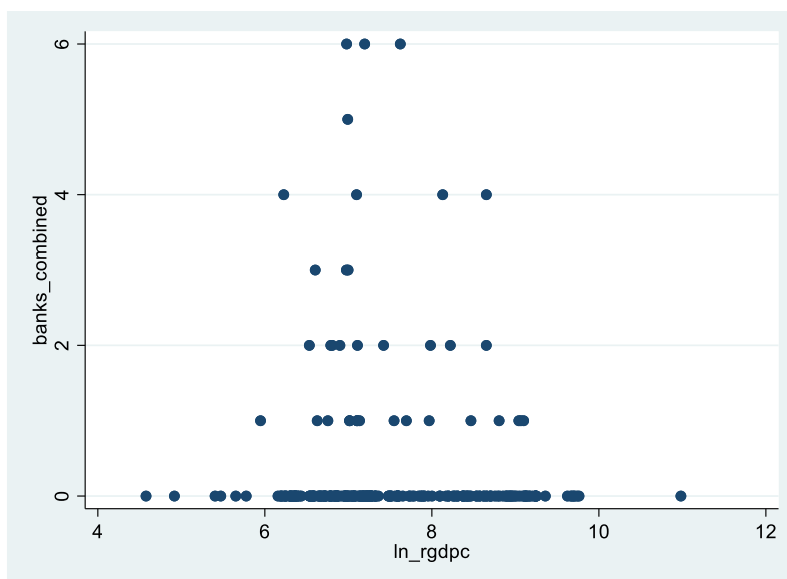


图 38 人均 GDP 与族群冲突/关系的散点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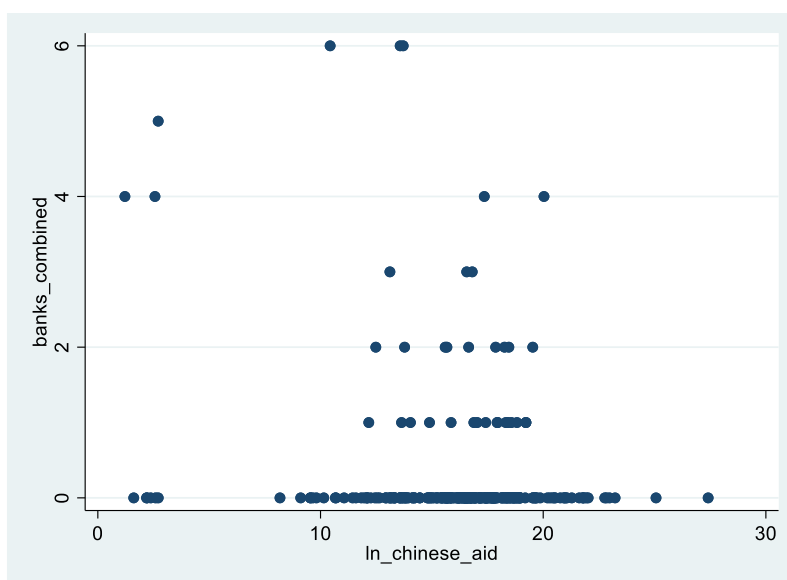


图 39 中国援助与族群冲突/关系的散点分布

援助对非洲族群冲突的影响数据上，族群冲突的衡量是定序变量，因此模型选择上是有序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Pr(Y_i \leq j) = F(\beta_0 + \beta_1 \ln_chinese_aid_i + \beta_2 \ln_OECD_aid_i + \beta_3 \ln_chinese_aid_i \times \ln_rgdpc_i + \beta_4 \ln_OECD_aid_i \times \ln_OECD_aid_i + \dots + \beta_k \times other_variables_i)$$

其中， $\ln_chinese_aid_i$ 表示中国援助金额的对数，测度中国对 i 国家的援助水平， $\ln_OECD_aid_i$ 表示 OECD 国家援助金额的对数，测度 OECD 国家对 i 国家的援助水平， $\ln_chinese_aid_i \times \ln_rgdpc_i$ 表示中国在 i 国的援助金额对数与 i 国人均 GDP 对数的交互项，考察中国援助在 i 国的不同经济水平下的影响， $\ln_OECD_aid_i \times \ln_rgdpc_i$ 表示 OECD 国家在 i 国的援助金额对数与 i 国人均 GDP 对数的交互项，考察 OECD 国家援助在 i 国的不同经济水平下的影响， $other_variables_i$ 表示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

表 14 援助对于非洲族群关系/冲突状况的影响: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ln_chinese_aid	-.0776437 (.0716102)		-.0839266 (.0744994)	.4831736 (.6595068)	-.0755484 (.0735514)	.1314753 (.715516)
ln_OECD_aid		.5741143 (.4905983)	.5801462 (.4835635)	.5620641 (.4634561)	3.447312 (2.835142)	3.255679 (3.18861)
ln_rgdp	.8622449*** (.3361992)	.6646731** (.3395321)	.701767** (.3263942)	2.012116 (1.550843)	7.965137 (6.583673)	7.954341 (6.663463)
ln_chinese_aid*ln_rgdp				-.0773216 (.088578)		-.0281215 (.0952262)
ln_OECD_aid*ln_rgdp					-.356676 (.3137133)	-.3328037 (.3579252)
ln_population	1.26049*** (.3453024)	.8560101** (.3381543)	.8959201*** (.3321432)	.9426006*** (.3623012)	.9306509*** (.3349775)	.942705*** (.3481056)
infant	1.892947** (1.019207)	1.746361* (1.031825)	1.763396*** (1.058939)	1.642974 (1.074635)	2.053274 (1.31418)	1.995166 (1.393068)
polity2	-.0210678 (.0490749)	-.0228862 (.0513978)	-.012108 (.05168)	-.0085735 (.0527247)	-.0166765 (.0467609)	-.0150166 (.0489959)
instability	.0821616 (.8832213)	.0130945 (.879209)	-.0744867 (.8860409)	-.0890712 (.8888759)	.0037619 (.8414091)	-.0096913 (.8366064)
ethic_frac00	.1486737 (1.755105)	.3197645 (1.737912)	-.1268399 (1.726576)	-.0276538 (1.672988)	-.2557103 (1.724)	-.212805 (1.717255)
ethic_frac01	2.669283 (2.916939)	3.189776 (2.800287)	2.897431 (3.013692)	2.543033 (3.088519)	3.008185 (3.128942)	2.879601 (3.27912)
ethic_frac02	3.116268 (2.031928)	3.30166 (2.112989)	3.422535 (2.123208)	3.720585** (2.114501)	3.446975 (2.22372)	3.545822* (2.156202)
ethic_frac03	-1.294856 (1.472102)	-1.53041 (1.381224)	-1.341685 (1.496937)	-1.030568 (1.527863)	-1.826125 (1.611903)	-1.702788 (1.750976)
ethic_frac04	7.08688** (3.379495)	6.728939 (3.512801)	6.974661** (3.295843)	7.660276** (3.889807)	6.976973** (3.018077)	7.160693** (3.458208)
ethic_frac05	-.4001737 (1.326205)	-.4320918* (1.333696)	-.5838089 (1.225808)	-.7128944 (1.248338)	-.5817883 (1.164769)	-.6203023 (1.194631)
ethic_frac06	3.869032* (2.120273)	4.117567* (2.162089)	3.852352** (2.132825)	3.831353** (2.16992)	3.840693** (2.221581)	3.83335* (2.225821)
<i>year</i>						
2001	-.307566 (2.780549)	-.549751 (2.737559)	-.5625617 (2.867608)	-.3406303 (2.888173)	-.6298986 (2.928478)	-.5500694 (2.987713)
2002	-.2887258 (2.145296)	-.245046 (2.197481)	-.517881 (2.154755)	-.7926423 (2.218593)	-.5301334 (2.198824)	-.6237232 (2.204578)
2003	2.024749 (1.899068)	2.121863 (1.882894)	1.824183 (1.87186)	1.531989 (1.937398)	1.996403 (1.908743)	1.895094 (2.019414)
2004	-3.818685 (3.106785)	-3.545609 (3.328984)	-4.109127 (3.066425)	-4.684105 (3.564443)	-4.361122 (2.862773)	-4.494945 (3.160639)
2005	2.643902 (2.02697)	2.612072 (2.082753)	2.530638 (2.006859)	2.573387 (1.918157)	2.424976 (1.991343)	2.438537 (1.95847)
2006	-2.001233 (1.982922)	-2.161095 (2.073894)	-2.257655 (2.056749)	-2.3493 (2.029031)	-2.389835 (2.081371)	-2.414618 (2.070151)
cut1	30.58693 (7.734395)	35.23392 (11.5213)	34.68881 (11.38594)	44.57134 (17.20134)	93.86191 (62.03335)	93.60679 (62.85318)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cut2	31.5675 (7.866585)	36.21205 (11.63675)	35.68113 (11.51915)	45.56968 (17.3097)	94.87262 (62.14673)	94.61794 (62.96163)
cut3	32.52101 (7.951328)	37.15814 (11.68218)	36.64164 (11.5767)	46.53958 (17.45928)	95.85491 (62.25711)	95.60157 (63.06715)
cut4	32.80833 (8.037194)	37.43954 (11.81234)	36.92852 (11.71067)	46.83053 (17.5054)	96.14647 (62.42109)	95.89423 (63.23299)
cut5	33.62215 (8.377179)	38.24068 (12.06478)	37.74395 (11.97761)	47.65487 (17.89709)	96.96805 (62.57599)	96.71848 (63.37794)
Pseudo R ²	0.2061	0.2083	0.2133	0.2154	0.2215	0.2218
Observation	219	219	219	219	219	219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数据来源: *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of AidData* 和 *Foreign Aid Shocks as a Cause of Violent Armed Conflict* (Nielsen et al,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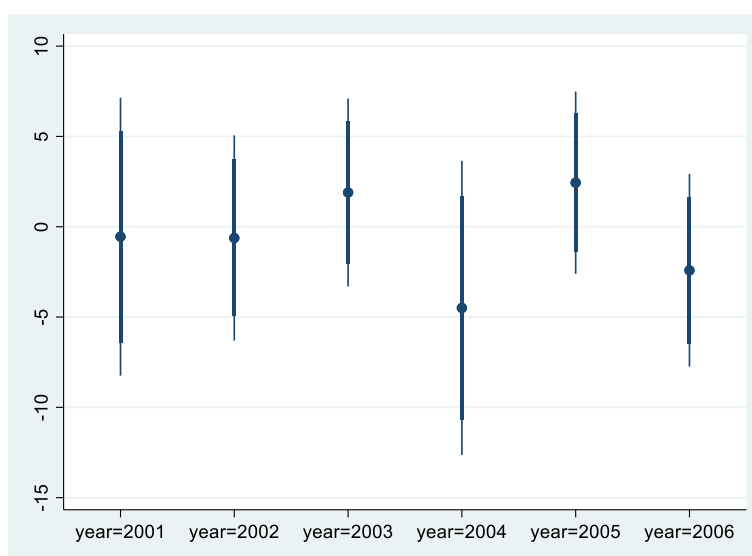


图 40 年份的回归系数及其 95%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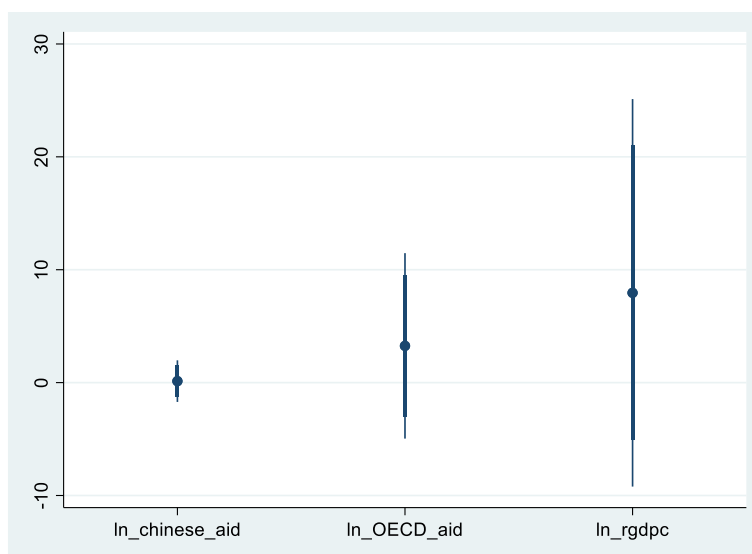


图 41 中国援助、OECD 国家援助、人均 GDP 的回归系数及其 95%置信区间

本部分的有序逻辑回归采用了 6 个模型：模型 1 加入中国援助，模型 2 加入了 OECD 国家援助，模型 3 加入两种援助类型；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中国援助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探讨中国援助对于人均 GDP 影响族群冲突的调节效应；模型 5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 OECD 国家援助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探讨 OECD 国家援助对于人均 GDP 影响族群冲突的调节效应。

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中国援助还是 OECD 国家的援助对于非洲国家的族群冲突影响都不显著。在没有加入交互项的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中，非洲国家的人均 GDP 对于非洲族群冲突的改善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但是系数较小表明影响的程度较小。并且，在这三个模型中，婴儿的出生率对于族群冲突也具有正向影响。另外，在所有模型中，人口增长数量对于族群冲突情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也间接反映出人口与社会稳定程度之间的影响，不过这里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和因果倒置的风险。*ethnic_frac*（民族比例）变量在不同的模型中表现为正向或负向关系，具体效应因模型而异。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通过对中国对非洲援助/投资项目地理分布与非洲族群分布和冲突数据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援助项目与非洲地区的关系，并探讨援助对族群冲突的可能影响。首先，通过对援助项目的地理分布进行观察，发现中国的援助在东非国家、几内亚湾沿岸国家较为集中。接着，将中国的援助项目地理分布与非洲族群分布和冲突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援助项目与非洲地区的族群分布存在较多重合，尤其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几内亚湾沿岸国家等地。援助项目可能引发族群之间的竞争，尤其在资源分配和受益方面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然而援助项目也可能带来溢出效应，促进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通过对乌干达的个案研究发现，地区族群的异质性程度越高与族群冲突发生的密集程度也具有越大的相关性。但是有序逻辑回归中，发现中国援助和 OECD 国家援助对非洲族群冲突影响改善不显著。非洲族群冲突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问题，援助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族群冲突可能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的影响，援助在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在回归模型中援助的效应不显著。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族群构成情况对于冲突的发生有着影响，在本研究的模型中，没有具体化不同国家内的族群类型分布，这也可能造成不显著的影响。此外，不同的援助类型会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基础设施型援助或者投资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对于族群之间的交流可能有着促进作用，进而改善族群冲突状况，但在此次研究中没有能够具体化和精确化。

五、案例研究与国别比较

5.1 “非洲的自由铁路”

坦赞铁路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标志性工程。坦赞铁路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助工程项目，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非洲修筑的最长铁路，是迄今非洲大陆上最大的工程之一。^①这项规模巨大的计划几乎占到中国对非经济援助的五分之一和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经济援助的十分之一。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中国对非援助的规模都是巨大的。^②如此巨大的援助项目背后，也有着曲折的故事与艰辛的历程。

早在德国人在东非殖民时，就曾选择达累斯萨拉姆作为殖民地首府。坚信坦赞两国交界处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的德国人已经修建成了一条从达累斯萨拉姆至坦噶尼喀湖的铁路，全长约 700 英里。在 1919 年，英国获得了国际联盟的正式授权，接收了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地，提出要修建一条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铁路。曾有许多考察团花费大量时间与金钱多次深入实地考察，但结论基本上一致，即“除非对铁路沿线地区采取必要发展的措施，否则将没有修建价值”，至于沿线丰富的矿藏，则“除非铁路运输网能够被建立起来，否则对这些重要的资源将无能为力”。殖民主义者修建铁路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二战后，坦桑尼亚与赞比亚先后于 1961 年 12 月与 1964 年 10 月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赞比亚一经独立，就已经勾画出了修建一条连接坦赞两国铁路的草图。对于周围有八个邻国的赞比亚来说，之所以如此看重坦桑尼亚与 60 年代中期南部非洲的地缘政治有很大关系：首先，赞比亚的经济过分依赖单一铜产品的出口，而对于铜矿出口最必不可少的出海口则由敌视新独立的赞比亚的殖民主义者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罗德西亚”所把持。赞比亚亟需稳定安全的出海口以维护经济安全，而坦桑尼亚正好可以提供出海口。坦赞两国领导人卡翁达与尼雷尔友好的私人关系也由来已久，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坦赞两国政府也有许多共同相似之处。例如，两国领导人都倾向于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因此在 1963 年初，尼雷尔就开始同卡翁达在达累斯萨拉姆商谈修建跨国铁路的问题。在 1965 年召开的会议上，两国总统向世界宣布他们达成的修建铁路的共识将不会做任何改变。^③此时，修建坦赞铁路的主要问题便是寻求援助方问题了。

坦赞两国最先是向世界银行与西方国家请求援助的，请求由两国分头进行间或也有联合行动。世界银行最早曾参与这一项目，但又认为“现有的铁路足够满足目前需求，而新建铁路的花费过高了。”自 1964 年，坦赞两国首先向前宗主国英国求助，但因实力不济，英国迟

^① 薛琳.坦赞铁路的决策与建设历程研究——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J].非洲研究,2015,7(02):199-214+271-272.

^② 于子桥,沈浦娜.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C].北大非洲研究丛书——中国与非洲,2000:28.

^③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09.

迟不愿采取实际行动。同时，坦赞两国向美国寻求帮助。在1964年，尼雷尔就向美国驻坦大使寻求帮助，美国认为（这条铁路）“从经济角度考察是不值得修建的。至于从政治方面的考虑，同经济方面相似，也是没有必要的”，回绝了请求。在1966年8月，赞比亚也曾向美国求援，但美国由于“没有充分的经济和技术理由支持修建这一项目”，又一次拒绝了。既为了向西方施压，也为了寻求可能的帮助，坦赞两国把目光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于1964年8月向苏联寻求援助，转年尼雷尔亲赴苏联，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坦赞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但是，苏联因阿斯旺水坝分散了自身太多资源也拒绝了他们。^①屡屡求助无果之后，为了本国和南部非洲国家的未来，尼雷尔把目光转向了更远的东方，他将修建铁路的希望转到了中国身上。

在尼雷尔总统访华前，坦桑尼亚商业和合作部部长巴布同中国驻坦大使何英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巴布以“非官方”形式第一次向中国提出了援建铁路的问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同外交部部长陈毅、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讨论了坦赞铁路项目。对这条铁路的价值，周恩来作了明确说明：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②因此，在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想要中国援助修建坦赞铁路的想法。由于有了先行调研，刘少奇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刘少奇强调到：“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周恩来也表示：“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尼雷尔没想到中国领导人会给出如此肯定的答复，他自称“兴奋得不能喘气了”。在19日下午，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尼雷尔，当尼雷尔谈到希望中国援建铁路时，毛泽东表示：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③毛泽东还表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这样，中国主动承担了支援亚非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运动的国际道义，^④援建坦赞铁路的意向就初步达成了。

在坦赞铁路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周恩来总理表现出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破解了其中一道道难题，驱动着铁路建设的步伐。周总理对于《关于援建坦赞铁路若干问题的报告》亲自逐字逐句审阅并批示，为了加速坦赞铁路的修建，应尽量采用机械化施工，以减少我出国人员。并且，关于坦赞两国在列车所使用的制动装置的技术问题上一直拥有不一致的意见的问题上，周总理还提出可以设计一个“在坦桑尼亚境内使用空气式的，到了赞比亚境内换成真空式”的“特殊装置”。在当时，国际国内都没有过使用这种装置的先例。周总理强调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请他们帮助解决。果然，当课题交给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之后真的顺利解决了。^⑤周恩来总理还非常强调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人的业务和政治素质，对

^① 薛琳.坦赞铁路的决策与建设历程研究——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J].非洲研究,2015,7(02):199-214+271-272.

^②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J].党的文献,1993,4: 43.

^③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M].北京出版社,1998:717.

^④ 谢宜泽.中国工程“走出去”:从坦赞铁路到亚吉模式[J].非洲研究,2018,13(02):80-93+172.

^⑤ 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M].世界知识出版

中国对援外人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对尼雷尔总统说：“（中国人）不要求特殊待遇，我们的技术人员同当地专家、工人一起劳动，不能特殊化，这很重要。如果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特殊化要求或干涉你们的内政，请立即告诉我们使馆把他调回。”在铁路开工前，周恩来指示方毅：到了国外，首先要检查有没有“强加于人”的东西。各级干部要引导援外职工不去追求那些表面的、形式主义的宣传。此外，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使大家充分了解自己工作的重大意义，“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就等于出色地完成一项政治任务”。^①另外，通过列车制动装置的谈判风波，中方考虑到开工典礼也不只是仪式问题。最终三国协定开工典礼将打破常规举行两次。

在开工典礼上，尼雷尔与卡翁达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卡翁达总统亲自驾驶铲运机作业宣示坦赞铁路正式开工。尼雷尔总统则发现铲运机上配备了司机：一名是中国人，另一名则是当地人。在得知他们都是在参加了坦赞铁路的建设之后从中国师傅那里学会了铲运机的驾驶技术之后，尼雷尔总统兴奋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产业工人！我们有了自己的产业工人！”然后尼雷尔总统又转过身对中国政府的代表团团长，时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的方毅说：“你们与西方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援助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在于不只是把援助的项目建成后交给我们，而且还把这个项目建设、使用、管理的方法教给我们。”

②

就这样，坦赞铁路就在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开工了。首先是勘测工作。从1967年开始，勘测队员冒着被野兽袭击的危险，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泥泞的雨季也没有放弃岗位，最终使得完成收工的日期提前了三个月。中方施工团队从一开始便试图将加快速度与节约成本结合起来。铁路修建需要大量水泥，为节约时间和运输成本，铁路组决定在坦桑尼亚建设年产8万吨的水泥厂。为控制风险成本，负责这项工作的湖北鄂城水泥厂在国内完成建厂设计、设备配套和人员培训。铁路开工时，大量临时性工程设计被重新审查以降低成本。施工队临时房屋采取“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办法建造，建造标准一降再降。尽管如此节约，坦赞铁路的建设工作还是动员了国内绝大多数省市的力量参与，中国还先后选派了5万多人次的工程技术人员赴坦、赞两国与两国工人一起修筑铁路，并有70余人不幸牺牲。^③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是进行动员并保持高效工作的根本保证。从坦赞铁路勘测阶段开始，中国技术人员与工人就不断开展政治教育。坦赞铁路穿越的地区多数是荒无人烟的热带草原、山谷、山地乃至沼泽地区，远离城市和糟糕的交通加上紧张的工期，大家只能在沿线搭建的简陋工房中生活。起居条件艰苦且信息闭塞，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内几无与亲人团聚可能。在坦赞铁路工地上，最被中国人惦记的是写信日。来信是最高兴

社,2015:23-28.

① 薛琳.坦赞铁路的决策与建设历程研究——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J].非洲研究,2015,7(02):199-214+271-272.

② 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40-42.

③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09.

的事情，同时也是政工干部做思想工作的最好时机。因此，尽管交通极为不便，但铁路组还是想尽办将信件及时送到散布在 1000 多公里铁路线上的工人手中。^①

坦赞铁路开工建设的第一年就定下了完成 310 英里路轨的目标。在 1971 年 11 月，随着达累斯萨拉姆至姆林巴路段的完成，实现了这项目标。在 1972 年 10 月，最困难的姆林巴和马孔巴科之间的路段也告完成，在这里，铁路从基隆贝罗山谷爬上南部高地的陡坡。完成的路轨总长达到 400 英里。随着非洲鼓的敲击声，坦赞铁路于 1973 年 8 月 25 日进入赞比亚境内。从坦桑尼亚开始建设铁路的好处之一是，随着铁路的逐步完成，可以在该铁路自己的路轨上运送设备和材料。在坦桑尼亚境内完成进入赞比亚后，坦桑尼亚工人被解雇，赞比亚工人数量增加。^②终于，在 1975 年 6 月 7 日，铺轨机在凯歌声中到达新卡比里姆博希，胜利地完成了坦赞铁路全线铺轨任务。坦赞铁路的终点站——新卡比里姆博希车站早在半年前已经展现在宽阔平坦的广场上，机车检修库、站房和成片的住宅房屋已经建立起来。同年 10 月 23 日，在新卡比里姆博希车站隆重举行了坦赞铁路与赞比亚铁路接轨通车和开始试办运营的庆祝仪式。赞比亚政府把这一庆祝仪式作为独立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卡翁达总统在坦赞铁路铺轨结束的庆祝会上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与支持，我们不可能完成我们维护非洲人利益的国际主义义务。”^③在庆祝大会后，一列满载着赞比亚出口物资的列车离开站台向东飞驰而去。坦赞铁路经过 5 年 8 个月的艰苦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全线终于胜利通车了。

坦赞铁路的建成，不仅促进了坦赞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力地支援了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坦赞铁路加深了坦赞两国乃至整个非洲地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对框定中非关系走向至今仍具有标志性意义。^④坦赞铁路帮助非洲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摆脱欧洲殖民者的经济宰制，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民平等，被称作非洲的“自由之路”(Uhuru Railway)。^⑤具体来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

关于坦赞铁路，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对于沿线坦赞人民与坦赞两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中国在与坦赞领导人会晤决定援建坦赞铁路时，就提到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重要一点就是使援助真正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早在 1974 年底，坦赞铁路还没有全线完工之时，中国的援助专家就看到大片的土地完成开垦，正在作播种准备工作。一场兴建新农村的运动已悄然沿着铁路线拉开序幕。此后，越来越多的居民从周边地区移民到铁路沿线，开垦荒地，建造房屋，形成诸多村镇乃至中小城市，一条与铁路共生的新经济带在数十年间出现。尤其是当坦桑尼亚境内的铁路竣工后，大约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工人将不再继续参与赞比亚境内的铁路建设，他们中有不少人出于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而自愿选择在火车站台附近居住。随

^① 蒋华杰.坦赞铁路修建的中国经验[J].炎黄春秋,2020,(05):76-82.

^② 于子桥,沈浦娜.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C].北大非洲研究丛书——中国与非洲,2000:28.

^③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09.

^④ 张杨.美国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阻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19(03):65-71+126.

^⑤ 孙鲁瑶.坦赞铁路: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J].世界文化,2021,(10):50-53.

着铁路沿线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向坦赞铁路站台附近及铁路沿线适合农牧经营的地区移居。与坦桑尼亚的情况相似,坦赞铁路也促进了赞比亚农业与商业的发展。赞比亚在 21 世纪后新增加的可耕地面积有相当一部分比重是在坦赞铁路沿线地区。另外,有了铁路之后,洪泛区的居民不仅有了便捷的穿越通道,还可以乘坐火车外出打短工,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依靠火车进行的大量贸易活动更是不用提了,自 1976 年营运以来,坦赞铁路在五年时间内就运送了 2500 万吨的货物和 4000 万人次的旅客。^①坦赞铁路已经成为联结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的运输大动脉,促进了坦赞两国和中、东南部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坦赞铁路将分散的文化认同感凝结起来,为远离家乡的人们提供了心灵的寄托。对于较年轻或首次利用坦赞铁路进行商品交易的人来说,坦赞铁路为他们提供了与家乡联系的条件。^②另外,有研究表明,坦赞铁路的建设通过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塑造集体记忆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了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其中,铁路建设对国家认同的提升作用在居住在铁路沿线地区且亲历铁路建设过程的民众中尤为显著。通过对于坦赞两国的社会冲突进行分析,研究者还发现铁路建设带来的民众国家认同提升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带来的危害。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即铁路建设便利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社会冲突的处置从而降低了冲突烈度。但无论如何,这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坦赞铁路的建设与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③

第二,坦赞铁路在推动中国同坦赞两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非多边关系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坦赞铁路修建以前,坦赞两国与中国的关系仅仅是不冷不热。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坦承自己在访华之前对中国知之甚少,而且信息往往来源于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赞比亚甚至迟迟没有派遣驻华大使。坦赞铁路的动工兴建,在许多方面密切了中国同坦赞两国的关系。不仅仅是坦赞两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度增加了或三国的政府间联系更密切了,坦赞铁路为当地人民带来的集体记忆更是使当地人民心目中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好了。有研究表明:年过 60 的曾亲历坦赞铁路建设的当地受访者表示中国人是非常勤奋的,因而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中国人都是可以信任的。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很慷慨。中国赞助了坦赞铁路项目,因而是赞比亚人民真正的朋友。年龄段在 30-60 的当地受访者表示中国和赞比亚人民的关系应该加强,这样两国就可以继续享受坦赞铁路建设期间开始的友谊。他们说中国建设的项目是经久耐用的。而 30 岁以下的受访者曾听过中国援建的故事,他们觉得中国人民对工作有着极大的奉献精神,而且技术娴熟。他们说他们更喜欢在中国学习工程建设,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他们比在赞比亚学到的东西更多。^④还有研究可以说明,中方的援助项目在工程结束 40 年之后,仍然持续地影响了所在地人民对于中国的态度:离坦赞铁路

^① 蒋华杰.坦赞铁路修建的中国经验[J].炎黄春秋,2020,(05):76-82.

^② 崔树霞.坦赞铁路对沿线地区的影响[D].浙江师范大学,2019.

^③ 黄振乾.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基于坦赞铁路的实证考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08):29-59+164.

^④ 姬德强,杜学志,Maxwell Chipaso.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调查:代际分化及其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启示[J].对外传播,2017,(10):44-47.

越近的坦赞居民,更加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感知到的中国影响更大,也更将这种影响视为正面因素,对于中国基建等发展项目的评价更高,也更加给予中国援助好评。考虑到援助项目的现实作用逐渐减少,以上发现说明中国援助的影响可能与现实利益关系不大,而是纯粹的情感和认知影响。^①

最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对于中国自身也有很大影响。周恩来总理就比较看重对外援助在推动国内经济技术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提出的“抓援外,促国内”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从实际情况来看,对坦赞铁路这一巨型海外工程的援建,确实起到了提高国内机械设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的作用。^②坦赞铁路的援建不仅促进了我国铁路机车、轨道与通信设备生产的改进,还培养了大批国际工程承包队伍。现在的中土公司、中铁二局、中铁三局、中铁建工集团都成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公司或企业。

研究中非合作领域的著名学者于子桥强调坦赞铁路不仅具有上述经济、外交与社会文化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坦赞铁路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样一项庞大而艰巨的计划为新中国带来了国际性的声望,坦赞铁路成为中国能力和力量的象征。第二,铁路代表对非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真正和有形的承诺,因而增进了中国的信誉。确实如此,中国本身是个缺少资源的发展中社会这一事实意味着援助是一种经济牺牲,因而使此承诺更为真实可信。第三,它象征着对非洲彻底解放的支持。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是两个非洲国家,处在为非洲南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前线。通过坦赞铁路支持这两个前线国家的中国也帮助了非洲要求改变的更大的力量。第四,坦赞铁路代表对西方的胜利。非洲大部分铁路系统都是殖民主义时期建造的,部分是为了政治原因,部分是为了有利于矿物和农产品的出口。西方国家曾有机会建造坦赞铁路,但却拒绝了这个机会。现在,中国和非洲一起建成了这条铁路,体现了它们自己的技术能力和社会经济价值。最后,铁路说明了中国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或者用中国的话说,是在“友好合作关系”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政治。这种关系是中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楷模和中国的国际主义政治的永久性的特点。^③

在今天,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坦赞三国人民在建设坦赞铁路过程中共同铸就的伟大的坦赞铁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坦赞铁路精神首先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从决策阶段国家领导人的国际主义胸怀,到受人以渔的可持续援助原则,处处都有体现。其次,坦赞铁路精神是一种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信念坚定、攻坚克难,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如此庞大的工程。第三,坦赞铁路精神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平等精神,是友好的、互相帮助的关系。正是这种平等相处、亲如兄弟的亲密关系,促使三国人民一起努力把工程做成功了。^④

^① 贺崑崙.历史援助与中国形象——以坦赞铁路为例[J].中国外资,2021,(19):44-47.

^②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09.

^③ 于子桥,沈浦娜.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C].北大非洲研究丛书——中国与非洲,2000:28.

^④ 刘志明.弘扬坦赞铁路精神做中非友好使者[J].非洲研究,2017,10(01):19-31.

最后，中国对援建坦赞铁路的实践说明，对外援助要紧跟时代发展的需求，做到与时俱进。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是非洲各国的迫切要求，中国对坦赞铁路的援建，不仅迫使美、苏等国增大对非洲的援助规模，而且还因顺应了非洲诸多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强烈愿望，推动了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但是，援建坦赞铁路确实令当时的中国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负担。像这样规模的对外援助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也在摸索新的对外援助的模式。

5.2 “安哥拉模式”及其调整

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安哥拉人民也许对于安定与发展最为渴望。像苏丹的南北问题一样，安哥拉也曾长期陷于战争而难以自拔。历经过十四年独立战争的安哥拉又陷身在长达二十七年的内战泥潭之中^①。在 2002 年，安哥拉的和平“出其不意地到来了”。但在经济凋敝的安哥拉，原本作为优势产业的石油化工也遭受了重创。安哥拉先后向不同援助机构申请资金重建经济，但都因附带的政治条件而没有进展^②。尽管如此，安哥拉政府坚定地推行渐进式变革，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立场，拒绝被外部压力所主导。尽管国家重建急需大量资金，但安哥拉政府并未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的种种条件，期待之中的“捐助者会议”最终没有到来。

就像 60 年代为筹建坦赞铁路而四处碰壁的尼雷尔在犹疑之中来到中国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慷慨支持，在 2004 年，中安两国签订以主权担保、用石油偿还 20 亿美元基础设施贷款的巨额合同。而到 2007 年底，中国工程公司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该合同中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哥拉全国的几乎每个省份和城市都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③。这批贷款全部用于中国企业对安哥拉出口产品或承包工程项目。同时安哥拉政府与中国石油企业签署长期石油供应协议，以对华原油出口收入作为贷款担保。这种“以基础设施换资源”的援助模式既解决了以安哥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融资难的问题，又解决了中方作为援助国的贷款安全问题，中安合作自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④中国与安哥拉之间的经济合作引起了世界银行的关注，并在之后的报告中把这种合作方式称为“安哥拉模式”。^⑤

具体来说，“安哥拉模式”的流程可以被简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签订协议阶段。由安哥拉政府提出贷款申请，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商务部提交报告评估结果，经商务部核定后，与安哥拉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在这个框架协议下，安哥拉政府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项目贷款协议。然后由中国会选择一部分承包商去安哥拉进行招投标。最终

^① 刘大卫.“安哥拉模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6.

^② 刘海方.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02):38-50.

^③ Indira Campos & Alex Vines, Angola & 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④ 李昭洁.浅析中国对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D].外交学院,2016.

^⑤ 陈雨露.新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研究[D].吉林大学,2023.

由安哥拉业主方通过招投标选择实施项目的中国承包商，与其签订商务合同，并由中国承包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实施阶段。中标的中国承包商实施工程项目，在完成一定工程进度时，由第三方监理由上报告工程进度，安哥拉业主向安哥拉政府报告进度并提交请款单据，待安哥拉政府批准支付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请款申请，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直接拨付款项给中国承包商。

还款阶段。由安哥拉政府以每天一万桶原油按市场价格提供给中国石油公司，并给予中国石油公司优先开采权。中国石油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款。需要指出的是，石油交易本身不包括在框架协议之内，是在两国政府引导下以公司作为主体达成的石油商务合同，而后将石油销售与援助贷款协议相结合。

上述的“安哥拉模式”是目前中国在非洲投资中见效最快、短期利益最高的。中国和安哥拉的经济合作模式是在特定时期，两个国家同时具有合作需求、经过理性计算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选择的一种经济合作关系^①。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提供了大量具有优惠性质的贷款，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扩展，也可以满足能源需要。安哥拉为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生活水平，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则是巨大的。中国的建筑公司正以快速、高效、经济的方式满足这一发展要求，为安哥拉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基础设施。^②

从整体上而言，在安哥拉向西方传统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寻求贷款受挫的情况下，中国无附带条件的高额援助为安哥拉提供了新的机遇，传统援助国和援助组织不再是安哥拉获得援助的唯一途径。这种条件宽松、而且作为受援国具有极大自主权的援助首先为安哥拉的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具体来说，安哥拉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创纪录的高油价和大规模的国家重建工程。中国则成为了主要驱动力，从而为当地社会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机遇；“安哥拉模式”使上百个项目在安哥拉的战争废墟上同时开工，使当地人民切身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援助的存在；另外，中国的援助项目还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仅第一批开工的三十一个项目就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更不用说后续大量的项目以及需要参与其中的本地承包商了；中国企业在卫生保健、能源供给、电信与建筑等方面提高了安哥拉当地员工的技术水平。一方面，被雇用的安哥拉当地工人在项目实施中得到技术培训，并通过大量实践掌握了一定生产技能；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为安哥拉带来了大量的相对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并在项目建成交接后，按协议规定向安哥拉有关部门和人员转让技术。这有助于提高安哥拉当地行业的整体科技和理念水平。^④最后，如此大量的工程项目以及涌入当地寻找更多机会的中国企业也促进了当地市场的活力与繁荣。并且，“安哥拉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经验，还

^① 张宇炎.中国对“安哥拉模式”管理政策变化分析[J].国际观察,2012,(01):58-64.

^② 晶晶,马丁,宋捷.中国公司进入非洲建筑市场的分析:安哥拉案例[J].西亚非洲,2008,(04):59-63.

^③ 李昭洁.浅析中国对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D].外交学院,2016.

^④ 唐晓阳.评析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新模式[J].西亚非洲,2010,(07):55-60.

被引介到了刚果(金)^①和赤道几内亚^②以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这一时期中非合作的代表模式之一。在许多安哥拉人眼中,安哥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安经贸合作密切相关。^③安哥拉天主教大学科研和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莎曾在2011年2月通过媒体公开发表看法,称中国是第一个为安哥拉国家重建做出贡献的国家。

但是,“安哥拉模式”的勃兴也引起了大量的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指责与批评。西方学者甚至指责中国在非洲搞“外科手术式的殖民主义”,以低限度的破坏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甚至将中非间的合作与16世纪葡、西殖民美洲以及19世纪英、法、德等国瓜分非洲相提并论,认为中国只是在方式上更加温和而已。^④其实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这些看法。中国在非洲资源丰富的地区确实非常活跃,中国对这些资源的兴趣也非常真实。但无论认为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为了换取资源,还是认为中国人只对资源丰富的国家感兴趣,均忽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已经向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都提供了援助,甚至相对比较富裕的南非和毛里求斯也获得了中国的援助^⑤。这就是中国援助体系与国际援助体系的不同之处:中国倾向于通过直接增强经济活动的方式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而援助中的经济活动也要同时使援助国本身受益。西方传统援助国依然普遍坚持制度建设是经济发展基础,而中国则关注经济增长本身。^⑥西方的国际援助体系成为冷战后推进非洲“民主化”的工具^⑦,更容易青睐正在推行西式民主与价值观的、相对贫穷且处于国际舆论中心的非洲国家,而中国的援助也同样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语境,强调的是第三世界的团结与联合以及探索南南合作的双赢模式。另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安哥拉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易货贸易安排,与60年代中国修建坦赞铁路时将自己的产品与非洲国家直接进行交换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与非洲一直不乏以物易物的经验。另外,是日本50年代支持印度建设铁矿时最早使用了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此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借贷给中国时带来了这种模式。现在中国借鉴日本的做法,加上自己的经验开始把它带入非洲。^⑧

其次,中国似乎并没有向资源更多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国商务部的赠款与无息贷款被相当均匀地分配给了各国能够赢得政治荣誉的那类项目。根据中国援助非洲领域的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研究: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人民币贷款主要提供给那些信誉良好、有能力偿还的国家。中国进出口银行只是给了这些国家信贷额度,然后等着有能力的政府来推荐项目:如毛里求斯的排水项目或博茨瓦纳的公共住房项目等。在信誉不好的国

^① 余南平.一种新的国际援助混合模式?——以华刚公司在刚果金项目为分析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1):62-71+153.

^② 龚财君.中国公司在非洲建筑市场的发展:赤道几内亚案例[J].价值工程,2013,32(07):126-127.

^③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④ Albert J Bergsen, “The new surgical colonialism: China Africa and oil”,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oston, Vol.2, No.2, 2008.

^⑤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UP, 2009.

^⑥ 陈默.中国援助的非洲模式及其对非洲发展影响的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⑦ 胡美.论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民主援助——兼论非洲的民主化路径[J].非洲研究,2010,1(00):137-149+404-405.

^⑧ 刘海方.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02):38-50.

家，可以将优惠贷款提供给能够赚钱偿还贷款的项目：比如肯尼亚的水泥电线杆项目，厄立特里亚或塞拉利昂的移动电话网项目等。^①

尽管在安哥拉、加蓬、刚果（金）和赤道几内亚，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大量极具竞争力的商业贷款，并且这些贷款均以石油（或其他资源）为担保，主要用于资助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活动当然与资源有关系，但中国采取“互利共赢”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创造商机。非洲的资源肯定也是商机的一部分，但中国着眼的是更多其他方面的商机：通过中安框架合作协议，目前已有许多中国大型企业进入安哥拉。这无疑是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贯彻企业国际化经营方针、开辟西南非洲市场的重要一步。^②“安哥拉模式”的实施为非常多中国的大型企业（很多是国企，还有一些是大型的私营企业比如华为）提供了对外经贸与涉外工程的经验，锻炼了这些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能力。目前，这些企业的很大一部分的盈利额都来自于海外的项目。

又有西方的批评认为中国修建这些基础设施只是为了更高效地攫取自然资源。的确，很多大型的矿业发展都需要中国正在建设的基础设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安哥拉修建了医院、灌溉系统和公路——但安哥拉的石油均在离海岸线数里的深海。同样，中国在刚果（金）以资源为抵押的项目也包括了从学校到铁路等各个领域，并不只是集中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内或必经之路上。

最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即便在安哥拉，继续使用旧的“安哥拉模式”的条件也未必存在了。^③随着基础建设的燃眉之急逐渐被解除，安哥拉政府工程的数量会相应减少。管理方式也可能由中央政府临时设专项安排转为更通常的各地区相关部委分头管理。更重要的是，随着安哥拉经济实力的增强并还清大量外债，该国可以重新向巴黎俱乐部成员国正常融资，对于中国同样条件的贷款的需求并不强烈。^④这将给安方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取项目贷款再向国内国际招标。这意味着框架合作协议中完全由中国企业竞标的限制将不存在，中国企业将面临更激烈、更完全的市场竞争。^⑤

另外，安哥拉还受到了“资源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受到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满足于用自己的资源和能源换取外国的工业品，主张提高本国资源的附加值和利用率，资源民族主义在非洲变得越来越有市场。^⑥中国在非洲实施的“资源换基础设施”模式成为了安哥拉和非洲学者热议的话题。非洲学者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应对之策。自2007年之后，安哥拉在签订新的贷款协议时，不再用石油作为抵押；安哥拉政府制定的“2025政府愿景”也已不再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安哥拉经济发展的唯一要务。安哥拉已经将“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发展”列

^①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UP, 2009.

^② 唐晓阳. 评析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新模式[J]. 西亚非洲, 2010, (07): 55-60.

^③ 刘海方. 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 28(02): 38-50.

^④ 刘大卫. “安哥拉模式”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⑤ 唐晓阳. 评析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新模式[J]. 西亚非洲, 2010, (07): 55-60.

^⑥ 张忠祥. 试论当今非洲社会思潮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J]. 西亚非洲, 2014, (06): 33-49.

为了未来几年国家的发展重点，力求降低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①在帮助安哥拉完成大量战后重建工程后，中国还是会被安哥拉视作其国际战略地图中的伙伴之一，只不过就像安哥拉总统所说的：“你们（指中国）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哥拉开始拒绝与中国合作，而是在本国需要的基础上调整了合作模式。安哥拉的“经济多元化”与“农业发展”的目标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专访中，安哥拉经济和计划部长塞尔吉奥·德索萨·桑托斯就提到：“安哥拉政府希望能与中企在开发农业综合体方面加强合作。据数据显示，仅有不到 12 家中国企业在安哥拉从事农业经营，主要集中在农作物种植领域，影响力非常有限。安哥拉政府正在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的法规框架，目的是吸引更多投资商来安哥拉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经营。政府已经修改了私人投资立法，并准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商。安哥拉想在开发农业综合体方面探索更多的机遇，并实现农业及相关产业与旅游业、清洁能源等领域的联动发展。中国与安哥拉应秉持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合作模式创新，使两国在双边合作领域迈上新台阶！”^③

人们对中非关系普遍有刻板印象，即中国是一条“饥饿的龙”，而非洲则相对无能和脆弱，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安哥拉的中国故事都是一个收获的故事，即通过暂时性的“安哥拉模式”来抓住并利用中国带来的收益。从安哥拉政府的角度看，中国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对一个非洲国家来说，这可能是最及时、最易获取的机会，而它可以坚持自身愿景，利用这一机会，最终获取长远利益。^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安哥拉的平等合作其结果是可持续和共赢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认知总是相默契的：由于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当前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叠乃至紧张和冲突，这需要两国决策集团审慎制定出长期发展战略，并根据对方需要及时协商与动态调整。

其实，“安哥拉模式”作为两国政府间框架之下的协议，本身就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全球自由资本市场逻辑的对抗；无论是对于已经全球化体系中沦为“第四世界”的非洲，还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的中国，都应该秉持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合作理念，继续在合适的条件下推进这种互利的“南南合作”^⑤，以第三世界的团结作为武器，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努力发展自身。

5.3 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兴起

2023 年 6 月 30 日，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依照惯例在湖南长沙举办。在中非经博会非

^① 刘大卫.“安哥拉模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6.

^② 刘海方,马婕.“你们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安哥拉视角看“安哥拉模式”[C].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总第四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5:13.

^③ 张梅,齐晓彤.两国合作需要模式创新——专访安哥拉经济和计划部长塞尔吉奥·德索萨·桑托斯（Sérgio de Sousa dos Santos）[J].中国投资(中英文),2020,(Z7):88-93.

^④ 刘海方,马婕.“你们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安哥拉视角看“安哥拉模式”[C].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总第四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5:13.

^⑤ 刘海方.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02):38-50.

洲产业园区推介对接会上,湖南日报的记者获悉,中国已经成为参与非洲国家园区投建营数量最多、综合效益最显著的非洲大陆以外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在非洲投资、建设和运营各类产业园区。截至目前,纳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在非中资园区数量达25个,吸引了超过620家企业入园,累计投资73.5亿美元,雇佣当地员工4.2万人,累计上缴东道国各种税费14.8亿美元,初步形成矿产资源、装备制造、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多个产业集群。在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秘书长瓦姆凯莱·凯贝斯韦·梅内看来,中国在非投资建设运营的各类园区,有效稳定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运转,为园区所在国疫后经济恢复、提升工业化水平和出口创汇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非经贸合作区这一概念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吸引人们的目光,成为了中非经贸合作的越来越重要的新形式。中国在境外建设的经贸合作区是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具备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资格,为入园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投资环境。近年来,由于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产能合作构想战略需求,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蓬勃。^①尤其是在非洲,中非经贸合作区模式在推动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所认可。^②

尽管最近才被关注到,但是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也不是近期“从天而降”的。从1995年起,中非经贸合作开始由政府官方援助为主向企业贸易转移,援助方式多样化,开始视非洲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商业机会。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问中国时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帮助埃及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③在1998年,国家计委首次制定非洲投资规划,这标志着中非经贸合作从援助和贸易导向转变为以资源为基础的投资方式。2002年,河南国基集团开始与西非国家开展贸易,2004年开始与塞拉利昂贸工部于共同投资兴建塞拉利昂国基工贸园区,并于2005年开园营业。^④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在今后三年在非洲国家建立三到五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后,中非共建园区步入机制化发展阶段。涌现出了一批临港产业区、商贸物流园区、农产品加工合作区、机械制造和建材工业园等经贸合作区和经济开发区,如中非泰达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后,中非共建园区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刚果(布)黑角经济特区、肯尼亚埃尔多雷经济特区、中车南非高科技工业园区、中地海外塞内加尔综合工业园区等一批较大

^① 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一形式在新闻报道、官方文件与学术文献中的叫法并不统一,有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境外产业(或工业)园区、境外合作示范区等多个名称,本研究统一使用商务部下属的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网站的官方名称——境外经贸合作区。而且对于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商务部并无规范和统一名称,本选题研究中国在非洲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为简化并避免歧义,统一称为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简称中非经贸合作区。参见王子曼.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对中非贸易与投资的影响研究[D].新疆财经大学,2020.

^② 吴哲能,罗钟泉,杨钟.工业园区模式助推非洲经济发展[J].中国国情国力,2018,(02):34-37.

^③ 张忠祥.中非经贸合作区:中非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J].西亚非洲,2011,(02):59-65+80.

^④ 戚洪波.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D].南京大学,2020.

规模的园区启动建设。这些合作区的建立，不但能大量的引入中国的资金、技术、人才，更大的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深层次的进行双方的合作，为其培养人才、解决就业、实现管理和技术的提升。^①

创建中非经贸合作区的意愿来自中国和非洲两个方面。从非洲方面来看，虽然非洲国家也曾有过经济特区的实践，但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没有一个园区与东道国当地经济实现了有效融合，也无一促进了当地工业化的升级，更无一例起到了东道国经济改革催化剂的作用”。外界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它们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有限。非洲生产产品的低附加值现状依然没有改变，缺乏区域联系交流减少了贸易流量。另外，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匮乏，限制了非洲生产力的发展。^②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特区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成功，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颇受非洲国家青睐，很多非洲国家对于学习和仿效中国经济特区经验表示了特别强烈的兴趣，欢迎中国在他们国家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期望通过中国设立的经济特区，引入中国资本与园区开发和管理的成功经验。^③因此，中非经贸合作区是中国政府回应非洲国家学习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要求，并依据自身优势和经验在非洲建立经济特区的大胆尝试。可以发现，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潜力很大，非洲国家非常看重，并给出了多种相关优惠政策。^④有非洲学者指出：“如果这些经济特区（中非经贸合作区）如愿完成，它们就会像基础走廊一样，把支离破碎的非洲市场连接起来，而且会对区域性经济一体化产生积极影响。非洲大陆每设立一个经济特区，将成为非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⑤

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体来说，中非经贸合作区首先为其非洲东道国提供了许多良好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当地社会稳定。比如，毛里求斯天利经贸合作区摆脱传统经贸区“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把经贸合作区的项目和毛里求斯的国家战略有效对接，这个耗资五亿美元的贸易经济区将为毛里求斯创造大约七千五百多个工作机会，年出口额将达两亿多美元，增加了当地政府税收；其二，中国企业也带去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加快当地工业化进程，比如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已与 120 多家企业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其中既有中国的知名企业，也有法国道达尔、荷兰米塔尔钢铁、尼日利亚的 OBAT 石油公司等世界五百强及国际知名企业参与。尼日利亚可从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也可以获得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和向国际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机会；其三，中非经贸合作区的设立密切了中非经贸关系；最后，中非经贸合作区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我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的问题增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创造让国内企业向世界扩张是中国经济

^① 王燕妮.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初探[D].外交学院,2015.

^② 利库赞比卡-弗朗索.中非产能合作视角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模式及其风险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2.

^③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④ 舒剑超,黄大熹.从援助效应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04):21-25.

^⑤ 马丁·戴维斯,曹大松.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09):38-44+4.

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大型企业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对来说,中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而中非经贸合作区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贸合作区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把中小企业集中起来,并且企业之间也可以进行互帮互助。因此,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不仅可以减少由于无序投资而带来的资源浪费,而且有助于中小企业集中进行境外投资获得经济效益。^①

如上所述,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一种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境外投资行为。中非两国的领导人都很重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仅中方政府对“走出去”的企业给与支持和鼓励,而且非方政府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提供便利和优惠政策。这种在政府的扶持下、以大企业为依托、中小企业抱团的企业投资形式,具有“小企业、大群落”特点的“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不仅具备了大型企业的品牌实力,而且兼具有中小企业的灵活便利的优势。另外,每个合作区主体运营商所在的地方政府,如天津、广东、山西、张家港等都大力支持其招商引资工作。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开发运营商以中国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为主,比如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的运营商山西晋非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上是由太钢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山西天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组建而来;尤其是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运营商的中非泰达在国内本身就是专门经营开发区的企业。^②而从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就倾向于利用外资在内地投资设厂、建立三资企业。中国各大城市建设的园区中也有很多像中非经贸合作区一样的由政府为主导,以产业项目为依托,由企业带动,形成产业集聚的综合运作模式。^③但是二者主要不同在于开发主体和不同环节中政府力量占比差异。因为不同于境内园区,境外园区建设周期长、融资需求大,没有政府的支持项目将难以进行,且在投资、建设和运营环节都需要境外东道国政府力量的加持,否则难以维系。从上述材料可以充分看出,中国是将国内经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产业园区发展经验充分展现在了对非洲的援助工作之中。

但是,就如同在国内一样,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也面临着重重挑战。在非洲国家之前失败过的经济特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基础设施、管理和监管机制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④虽然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作为对非投资的一种新方法,但中非经贸合作区对于基础设施、管理和监管制度三个方面还是拥有相对的优势的,这也是中非经贸合作区能够蓬勃生长的原因之一:首先,中国援助非洲的工程项目本身就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占总投资的七成左右。而且中国国内的丰富经验也表明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次,中非经贸合作区在管理方面也有着比较大的优势。在利用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促进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建立经济特区的过程中,中国累积了大量的经验,培养了

^① 原博.中国—非洲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3.

^② 张菲.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13,(03):34-39.

^③ 崔淙莹.中非境外产业园区开发模式研究[D].湖南大学,2022.

^④ 逢增珺.中国对非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初探[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一大批规划、建设和运营经济特区的专家。尤其是上文中提到过的天津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在国内分别负责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和运营，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第三，如上所述，中非经贸合作区是由政府主导设立的，是国家级的战略选择。中国和所在国政府都很重视，建立双边委员会以便利沟通，这点非常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比如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而管理局董事会级别很高，由埃及政府总理直接负责，成员还包括首席工程师、埃及电力传输公司董事长、塞得州州长、两位海军上将、住房，公用事业和城市社区部长和一位总统顾问。^①埃及方面管理体系的高配加上泰达集团丰富的管理运营经验使得中埃双方诸多关于合作区运营和发展的政策框架和磋商机制得以更好地落实和跟进。

但是尽管中非经贸合作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和社会效益初现。但是，若对照经贸合作区设立的初始目的“鼓励中国企业和非洲本土企业和外国投资者赴非洲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此促进非洲工业发展和出口增长”和各园区建设进度，不难发现目前的中非经贸合作区虽然集群式发展模式雏形初现^②，但就像在国内一样，经贸园区的建设与发展仍面临诸多的问题和风险挑战：

首先，中非经贸合作区前期建设时间较长，资金需求量大，成本收回较慢，导致几个经贸合作区都出现了后期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基本的水电设施，道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不仅使得成本进一步增加、使建设进度落后于预期，还会降低该园区的招商吸引力。而且同一国家内不同的来自中国的园区往往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没有互通有无、共享资源的举措，反而相互争夺东道国的资源（比如乌干达的几个中非经贸合作区）。更成问题的是无论是投资园区的企业还是入驻园区的企业都存在愈发严重的同质竞争，具体表现在园区类型规划高度重合、招商产业雷同，在消耗资源的同时，不仅损害了自身利益，还影响了中国形象。^③

第二，有些中非经贸合作区规划不够合理、定位不够准确，不完全符合东道国的发展战略，需要重新规划。目前大部分的中非经贸合作区的规划都偏向于多功能、多行业、综合性、“大而全”^④的特点，没有体现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并且中非经贸合作区并没有充分与当地经济的发展相对接，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拉动当地的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用地问题必然牵涉到其所在的社区，土地补偿和人口安置问题都需要解决，同时需要向当地社区证明中非经贸合作区对其有利。^⑤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中资公司的劳动违规现象，需要更好的监管制度来避免。还有部分园区内的企业只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其经济行为对当地造成的环境问题，导致非洲当地居民对中国企业的不满，从而影响中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⑥不过，有些非洲国家不甚理想的社会经济条件也确实为中

^① 威洪波.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D].南京大学,2020.

^②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③ 崔淙莹.中非境外产业园区开发模式研究[D].湖南大学,2022.

^④ 张菲.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13,(03):34-39.

^⑤ 逢增琨.中国对非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初探[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⑥ 原博.中国—非洲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3.

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形成了阻碍。这就是另外一个风险与挑战，即当地的营商环境。

第三，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都存在问题。并非所有合作区的开发商对于如何管理、如何招商、尤其是如何与东道国协调等问题都有经验，始终处于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合作区的开发商如果由几家股东联合组成，尤其是股东中的本地公司存在一定协调难度。在外部协调方面，特别是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阻碍与承诺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等营商环境问题，为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由于非洲国家难以根除的腐败、行政效率低下、部门间的掣肘以及民间对中国的偏见等原因，导致协调难度较大，优惠政策难以落实。

第四，中非经贸合作区的盈利能力与投资风险的问题。目前的中非经贸合作区的盈利方式大概有三种：以赞比亚为例的资源开发模式、以苏伊士为例的土地租售模式、以及其他的工业园的工业发展的模式。事实上，这三种模式的盈利能力目前来说都不强。资源与土地的出售不具有可持续性，而目前非洲产的工业品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充分征服市场，形成大额的盈利。另外，非洲许多国家经济脆弱且结构单薄，整体缺乏对产业链的完整把控，导致易受国际市场影响和外国的打击。此外，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并不稳定，且仍存在宗教矛盾、族际冲突、地区间利益纠纷、民众对抗情绪等潜在危险因素，有引发不同程度的安全冲突事件，影响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生活。^①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对于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有很大影响。更何况，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传统西方援助国家也开始重视对非的援助与合作，纷纷召开与非洲领导人沟通交流的论坛会议，为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竞争。

前文分析了一些中非合作经贸区的成功经验与注意的问题，本节总结这些成功园区的经验、分析其他园区停滞或者利用率不高的原因，有以下的一些发展建议：

首先，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应努力实现更加公开和透明的运作，继续加强与所在非洲国家的交流。缺乏透明性一方面不利于吸引新投资，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外界（尤其是所在国当地社会）对中非经贸合作区的误解。通过与所在国政府的沟通，中非经贸合作区可以了解政策的变化走向，帮助初始承诺落实，便利自身的发展。加强与所在国企业的沟通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开发当地市场，通过合作实现技术和经验的转移，增加国际化经验，也可以促进所在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强与当地社区的沟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劳动力情况，确保企业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供应，另一方面可以协调好与社区的关系，为合作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作为一种新型的南南合作模式，中非经贸合作区的最大亮点并非中国的巨额投资，而是中国企业通过雇佣当地工人、与当地企业合作和吸引当地资本投资来实现技术与知识的转移，引导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使其最终能够实现产业本地化^②，而并非是像“殖民主义者”一样只是攫取利益。中国对非援助的立足

^① 张菲.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13,(03):34-39.

^② 逢增琨.中国对非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初探[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点向来是要顺应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如何真正地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项目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非洲国家社会经济规划中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重点开发的地区,尽量将企业发展的规划融入到东道国的发展规划中,这不仅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减少自我封闭运营所带来的风险。^①在经营上,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开发、运营、招商等各环节要积极与当地企业保持合作,任用本地化人才。只有当地企业参与建设后,合作区的发展才能与非洲国家的自身发展密切结合起来。本土化人才更加熟悉当地政策与运作规则,与当地各类部门和机构打交道时可以有效推进工作的开展。此外,经贸合作区要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当地的公益事业。企业责任无国界,经贸合作区在开发建设上也要保护好当地环境,这是保持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忽略的。^②

第二,中非经贸合作区要加强政府的管理与协调,争取到更丰富的合作形式与投资主体的参与。在区位的选择和产业的定位上,国家应该加强宏观规划、严格审批,避免开发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强化协调机制,鼓励国内的企业和省市的联手,共享“合作区”的平台,减少内部的无序竞争。^③中非经贸合作区还应切实加强中国与各产业园所在东道国政府的协商,确保优惠政策协议切实落地^④,获取当地的更多资源支撑,在融资遇到困境的时候可以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目前,央企和国企在中非投资合作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已经在加工领域、地产开发领域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国家和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在非洲发展的支持正当其时,应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民营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另外,负责中非经贸区建设的开发商多少都受到融资困难和园区管理经验不足的挑战:毛里求斯的晋非和尼日利亚的奥贡经贸合作区都已几度易手。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具有丰富的经贸区经营与管理经验,且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早就对尼日利亚莱基和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建设感兴趣。为此,政府和合作区开发商可以考虑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分享更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合作还可避免中非经贸合作区变为孤立“飞地”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⑤因此不妨在不损害中国与非洲的战略利益的情况下,加强与西方国家合作,甚至加强与日本、印度等国合作,减小风险,互利共赢,实现对非合作的共享发展和包容发展。^⑥

第三,中非经贸合作区还需要更加精确化自身的定位,努力提升盈利能力,并注意消除投资风险。经贸合作区的产业定位至关重要,合乎经济规律、清晰准确的定位才能突出合作区的优势,才能使经贸合作区聚集起核心资源和优势产业。中非经贸合作区在推进过程中,一定要结合企业的既定优势、合作区所在地资源及所能辐射的国际市场特征等,就园区产业

^①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② 舒剑超,黄大熹.从援助效应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04):21-25.

^③ 王燕妮.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初探[D].外交学院,2015.

^④ 崔淙莹.中非境外产业园区开发模式研究[D].湖南大学,2022.

^⑤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⑥ 王炳楠,张晓燕,廉杜尧.基于投资园区的中非贸易合作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18):29-30.

方向和商务功能做出具体定位。^①不能过杂过大，必须考虑当地的实际国情。我国投资主体在掌握投资主动权的同时要理性分析投资方案的可行性，以及东道国政府优惠的兑现可能性，以及投资所在地面临的多重现实及潜在风险，还要看目标地区是否符合园区产业定位与发展模式。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针对非洲国别市场、细分领域及具体项目进行市场调研、行业分析与可行性研究。理想状态下拥有一套完整的市场调研、投资分析、园区开发监控和反馈体系尤好。其间需要一批懂得投资、市场、国际法的专业人才，又要有一批熟悉业务流程与运作的业务人才，从投资管控角度形成涵盖规划到评价的全流程监控，加强企业层面的战略管控；从项目建设角度形成涵盖设计到转资的全流程管理。^②

第四是要努力培养适应国际化趋势的人才梯队，培养真正懂非洲的本土化人才。境外产业园区面临与国内迥然不同的政治环境、法律体系、风土人情等。中国援非的工作人员会出现缺乏国际工作经验，与当地社会脱节，自己形成“小圈子”等问题。这样既不利于企业真正的扎根非洲，更不利于园区的公关宣传。^③如果园区企业内频繁更换与流动亦不利于园区企业的长足发展。因此中长期来看，我国需要持续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积极开展中非留学互换项目，鼓励中国技术型人才走向非洲，鼓励非洲学生来中国交流学习。

如上所述，如果中非经贸合作区如果能增加透明度，尽量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非洲的质疑；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招商引资完成后，更加重视管理、协调和盈利，重视风险的预警与防范，持续做到利益多元化和国际化，重视人才培养的问题，就能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区的更加可持续发展。^④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建立以定位精确、运营成功的经贸区为核心，融合多种经贸模式，结合中国对外国际关系战略，引领中国企业进行“集群式发展”，带动相关行业、产业带的发展，促进一个甚至多个地区的发展，进而辐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的中非经贸合作区，在未来是极有潜力的合作模式。^⑤

5.4 本章小结

上述展示的三类案例并非是偶发现象，而是能够代表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非援助的典型特点，具有类型学的意义。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举国上下都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力图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使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⑥铁路的建设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全国进入执行“一五计划”时期，铁路的建设进入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周期。社会主义建

^① 舒剑超,黄大熹.从援助效应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04):21-25.

^② 崔淙莹.中非境外产业园区开发模式研究[D].湖南大学,2022.

^③ 王燕妮.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初探[D].外交学院,2015.

^④ 张菲.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13,(03):34-39.

^⑤ 王燕妮.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初探[D].外交学院,2015.

^⑥ 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05):13-24+125.

设时期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了铁路能够发挥国民经济“先行官”的引领作用，^①是发展中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除了应坦赞的请求援建坦赞铁路之外，中国还对其他非洲国家援建了如水坝、公路等主要的工业基础设施。这对于新独立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增进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加强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具有极大的意义。^②

当时间来到高度全球化的后冷战的世纪之交，刚刚融入世界经贸体系的中国意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和利用外资以解决国内资金困难，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利用国际投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的利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表明，只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取其长避其短，对引进国际投资采取正确的政策，避免消极作用，发挥积极作用，就能利用到国际资金产生最佳经济效益。^③因此，中国带着在改革开放中自身利用外资的经验，为在国际上求助无门的安哥拉提供了快速高效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还吸引了其他非洲国家参与其中，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活动空间和本地化的产业集群相辅相成。一方面，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快速推进，加速了生产要素、知识和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减少了其运营的单位成本，使社会财富蕴藏在流动的空间之中。另一方面，各地争相吸引投资，争夺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区域竞争加剧，集群已经成为区域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沿海一些经济增长快速、对外开放程度高、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已经成长起一批具有高度专业化分工、高度聚集特征的地方产业集群。^④这些产业集群对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现在，产业园区的建设在中国已经是相当普遍，形成了产业园区与新城开发运营、主体企业引导、产业地产开发、综合运作四大类模式。^⑤中国的园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已经日渐成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⑥如上所述，很多非洲国家对于学习和仿效中国的经济特区经验表示了特别强烈的兴趣，欢迎中国在他们国家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期望通过中国设立的经济特区，引入中国资本与园区开发和管理的成功经验。中国欣然应邀，已经在非洲建立了 25 个经贸合作园区，为非洲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回顾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模式的三种类型我们会发现：其一，这些合作模式都是顺应非洲国家实际需求，兼顾中国优势孕育而生，因此具有较大的生长空间。其二，这些合作模式都是以制度为依托，以国家权力为保障而形成的规范性契约类合作模式，未来的持续发展有机

^① 曹文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铁路政策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22.

^② 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40.

^③ 王秀芬.积极吸引外资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J].理论学刊,1988(04):42-45.

^④ 吴晓军.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建设[D].江西财经大学,2004.

^⑤ 崔淙莹.中非境外产业园区开发模式研究[D].湖南大学,2022.

^⑥ 马丽.要素聚集、产业聚集和园区经济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7.

制方面的保障。^①其三，这些合作模式都体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平等的友谊关系。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从未在非洲搞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而是努力构建中非间“政治上相互平等和信任、经济上双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健康关系^②。

^①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② 巴里·索特曼,严海蓉,张永蓬.友谊与利益:中非关系的独特性[J].西亚非洲,2007,(04):55-61.

六、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描述性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定性比较分析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等多种方法，就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额度、政策和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项目地理分布与投资项目方面，研究发现援助项目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尤其在东非国家和几内亚湾地区。这反映了中国在选择援助地点时可能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包括贫困水平、发展潜力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性。投资项目相对于援助项目更为分散化且广泛覆盖，东非国家和几内亚国家仍占据较多份额。投资和援助项目的分布受市场通达度的影响，靠近首都或地区经济中心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援助。在援助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尽管中国援助在回归模型中对非洲国家的 GDP 增长影响不显著，但 OECD 国家的援助呈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援助对于经济发展仍存在显著影响，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在援助与族群冲突的关系方面，通过地理分布关联性分析，援助项目与非洲地区的族群分布存在较多重合。然而，援助在回归模型中对非洲族群冲突的影响不显著。族群冲突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问题，援助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并且这一结果很大可能是因为研究数据的不准确，模型设定过于粗糙。案例比较研究部分发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模式经历了不同阶段，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发展和园区经济合作。这些合作模式都体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平等的友谊关系，以及中国努力构建中非间“政治上相互平等和信任、经济上双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健康关系。

受限于研究的时间与作者本人的研究水平，本研究目前的展示显然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形态。显而易见的是，本研究对于援助项目变量的选区和测量不够精确，缺乏对于中国援助金额、项目范围和实施细节的准确捕捉，并且援助项目的效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而回归模型的时间跨度可能不足以捕捉到这些效果。不同地区可能对援助的反应不同，而回归模型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地区差异。此外，在族群关系的分析部分，未能对于族群构成的情况进行详细分组研究。未来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将会通过扩大数据时间跨度，采用微观栅格数据，更深入地了解援助项目的类型、具体内容和实施过程，考虑地区差异性并且细化对政府因素的分析，以更准确地评估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的影响。

另外，在对于非洲合作模式的讨论方面，本研究都紧紧围绕一个问题：中国的对非援助是将建国以来每个时期的国内成功的发展经验总结后，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非洲的受援国参考与应用。每个时期不同的援非策略与手段是基于本国经验的扬弃总结而成并且无私传授给非洲国家的结果，是真心为了非洲发展的无私帮助，是中非合作的必然发展和有益创新，更是为南南合作注入的新的活力。即便我们除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的影响，西方学界也一直不理解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行为。即便是一些正直的、承认中国在非洲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学者，也一直没有提出合适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动机。从上世纪新中国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对非洲不计成本的援助以及到本世纪中国专注于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而不是发达的

西方国家发展商贸关系，的确无法用西方的扎根于西欧历史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去解释。要理解中国的对非援助，就一定要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叙事中去理解。^①当前世界经济失衡在于世界的两极分化，即南北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急需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积极发展经济走工业化发展道路，又需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中非之间的合作不仅是非洲国家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对于世界新经济的均衡发展，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总而言之，中国对非援助在帮助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置疑的，但援助效果的异质性、长期效应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当中非关系研究的视角从静态转向动态，更加长时段且微观化聚焦中国力量在非洲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许能够给中国对非影响的因果推断提供更加宽广的视野，对于政治进程的整体把握也将会更加的全面而准确。

^① 殷之光.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M].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13.

^② 原博.中国—非洲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3.

参考文献

- [1] Abreham Adera. Chinese aid and social ties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sub-national aid projects[J].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11(1):2196843.
- [2] Albert J Bergsen. The new surgical colonialism: China Africa and oil[J].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oston, 2008, 2(2).
- [3] Benjamin Crost, Joseph Felter and Patrick Johnston.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Civil Conflic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1833-1856.
- [4] Brazys, S., Elkind, J. A., & Kelly, G. Bad neighbors? How co-located Chinese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jects impact local corruption in Tanzania[J].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07, 12(2): 227-253.
- [5]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M]. Oxford: OUP, 2009.
- [6] Dreher A, Fuchs A, Parks B,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R]. AidData Working Paper No.46, 2017.
- [7] Indira Campos & Alex Vines, Angola & 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 [8] Monica D.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 Interests, 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errito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8.
- [9] Tewodaj M. Mengistu. Emerg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Mechanisms in Sub-Saharan Africa[M]. RAND, 2013: 32-34.
- [10] 巴里·索特曼, 严海蓉, 张永蓬. 友谊与利益: 中非关系的独特性[J]. 西亚非洲, 2007, (04): 55-61.
- [11] 曹文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铁路政策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22.
- [12] 陈默. 中国援助的非洲模式及其对非洲发展影响的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 [13] 陈天祥; 杨蕊.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测量--基于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1981—2015)[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1): 101-112+190-191.
- [14] 陈雪飞.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03): 68-72.
- [15] 陈雨露.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研究[D]. 吉林大学, 2023.
- [16] 崔淙莹. 中非境外产业园区开发模式研究[D]. 湖南大学, 2022.
- [17] 崔树霞. 坦赞铁路对沿线地区的影响[D]. 浙江师范大学, 2019.
- [18] 冯凯. 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D]. 南开大学, 2023.
- [19] 高馨宇. 新时代中非合作[D].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20] 龚财君. 中国公司在非洲建筑市场的发展: 赤道几内亚案例[J]. 价值工程, 2013, 32(07): 126-

127.

- [21] 韩冬临,黄臻尔.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6):134-154+159-160.
- [22]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J].党的文献,1993,4: 43.
- [23] 贺鬼鬼.历史援助与中国形象——以坦赞铁路为例[J].中国外资,2021,(19):44-47.
- [24] 胡美.论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民主援助——兼论非洲的民主化路径[J].非洲研究,2010,1(00):137-149+404-405.
- [25] 黄振乾.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基于坦赞铁路的实证考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08):29-59+164.
- [26] 姬德强,杜学志,Maxwell Chipaso.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调查:代际分化及其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启示[J].对外传播,2017,(10):44-47.
- [27] 蒋华杰.坦赞铁路修建的中国经验[J].炎黄春秋,2020,(05):76-82.
- [28] 解飞.中国同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J].西亚非洲,2006,(06):59-61+80.
- [29]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J].西亚非洲,2006,(08):11-20+79.
- [30] 李安山.中国的援非故事: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27(05):12-19.
- [31] 李军.中非合作论坛提速企业合作[J].中国中小企业,2009(12):44-46.
- [32] 李昭洁.浅析中国对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D].外交学院,2016.
- [33] 利库赞比卡-弗朗索.中非产能合作视角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模式及其风险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2.
- [34] 刘大卫.“安哥拉模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6.
- [35] 刘海方.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02):38-50.
- [36] 刘鸿武.非洲发展大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3(02):72-87.
- [37] 刘青海,刘鸿武.中非技术合作的回顾与反思[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01):1-6.
- [38] 刘莹.新马族群政策及其对族群关系影响的比较研究[D].云南大学,2011.
- [39] 刘志明.弘扬坦赞铁路精神做中非友好使者[J].非洲研究,2017,10(01):19-31.
- [40] 马丁·戴维斯,曹大松.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09):38-44+4.
- [41] 马丽.要素聚集、产业聚集和园区经济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7.
- [42] 逢增琚.中国对非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初探[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 [43] 戚洪波.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D].南京大学,2020.
- [44]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09.

- [45] 舒剑超,黄大熹.从援助效应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04):21-25.
- [46] 孙鲁瑶.坦赞铁路: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J].世界文化,2021,(10):50-53.
- [47]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J].西亚非洲,2020(05):3-20.
- [48] 唐晓阳.评析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新模式[J].西亚非洲,2010,(07):55-60.
- [49] 唐正平.前景广阔的中非农业合作[J].西亚非洲,2002,(06):13-17.
- [50] 王炳楠,张晓燕,廉杜尧.基于投资园区的中非贸易合作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18):29-30.
- [51] 王珩.开启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新征程[J].当代世界,2023(03):52-58.
- [52]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中)[M].北京出版社,1998:717.
- [53] 王秀芬.积极吸引外资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J].理论学刊,1988(04):42-45.
- [54] 王燕妮.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初探[D].外交学院,2015.
- [55] 王振.中国在东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D].南京大学,2019.
- [56] 吴晓军.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建设[D].江西财经大学,2004.
- [57] 吴哲能,罗钟泉,杨钟.工业园区模式助推非洲经济发展[J].中国国情国力,2018,(02):34-37.
- [58] 谢宜泽.中国工程“走出去”:从坦赞铁路到亚吉模式[J].非洲研究,2018,13(02):80-93+172.
- [59]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11):117-135+159.
- [60] 许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J].经济学(季刊),2021,21(05):1499-1520.
- [61] 薛琳.坦赞铁路的决策与建设历程研究——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J].非洲研究,2015,7(02):199-214+271-272.
- [62] 严兵,谢心荻,文博.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兼论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21,(02):3-18+134.
- [63]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3,(05):103-117.
- [64] 殷之光.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M].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13.
- [65] 于子桥,沈浦娜.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C].北大非洲研究丛书——中国与非洲,2000:28.
- [66] 余南平.一种新的国际援助混合模式?——以华刚公司在刚果金项目为分析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1):62-71+153.
- [67] 原博.中国—非洲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3.
- [68] 张春.新时期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J].当代世界,2018(10):4-8.
- [69] 张菲.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13,(03):34-39.

- [70] 张梅,齐晓彤.两国合作需要模式创新——专访安哥拉经济和计划部长塞尔吉奥·德索萨·桑托斯(Sérgio de Sousa dos Santos)[J].中国投资(中英文),2020,(Z7):88-93.
- [71] 张杨.美国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阻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19(03):65-71+126.
- [72] 张宇炎.中国对“安哥拉模式”管理政策变化分析[J].国际观察,2012,(01):58-64.
- [73] 张振霞.中非关系中的援非培训[D].外交学院,2014.
- [74] 张忠祥.试论当今非洲社会思潮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J].西亚非洲,2014,(06):33-49.
- [75] 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J].探索与争鸣,2008(12):83-85.
- [76] 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40-42.
- [77] 周玉渊.中非合作论坛 15 年:成就、挑战与展望[J].西亚非洲,2016,(01):4-21.
- [78] 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05):13-24+125.
- [79] 朱玮玮,徐康宁,王美昌.中国援助是否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 [J].国际贸易问题,2018(07):108-120.

致 谢

本研究报告《中国援助、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对中非合作的一项探索》得到了左才教授、殷之光教授、包刚升教授、邓涵之老师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启示，在此特别致谢。当然，文责自负。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Fudan NLP*）的李思贤同学在政策文本分析方面提供的关键性帮助。另外，黄振乾老师的《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许志成老师和张宇老师的《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两项研究也给予了我们重要启发。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尝试邮件联系许志成和张宇两位老师，咨询栅格面板数据的处理和计量问题，然而暂未收到回复，但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采用更加精确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来对我们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此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深度对话。

我们深知目前的研究报告是以一个非常粗糙、浅显的样态呈现出来的，尚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漏洞百出。不管怎样，我们认为走出第一步是重要的，至少这个过程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思考，锻炼了方法运用。最后，祝 701D 小分队友谊地久天长！

陈卓 魏海墨

2023.12.13